

学术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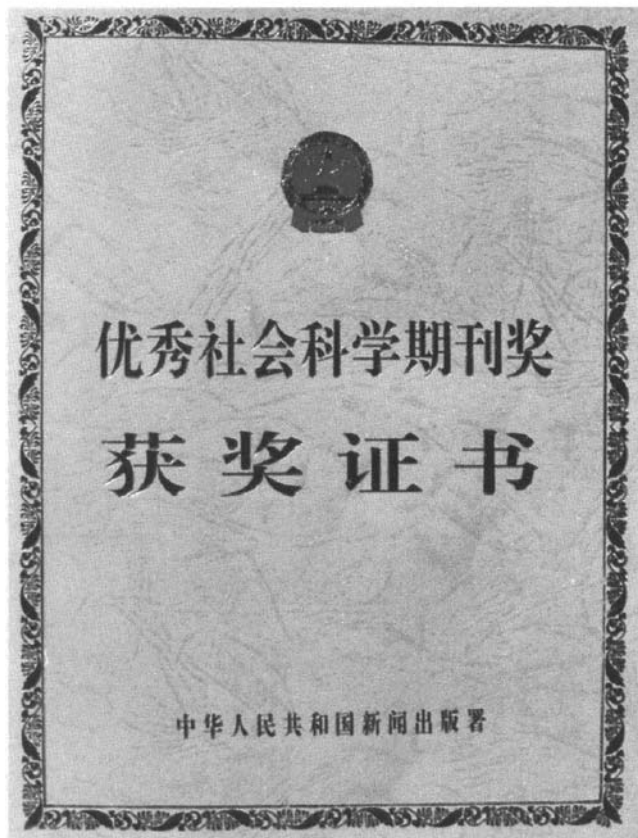
ACADEMIC
RESEARCH

- 首届全国优秀社会科学期刊评奖获奖刊物
- 全国中文核心期刊
- 社会科学类国际交流刊物

1996 · 1

首届全国优秀社会科学期刊评奖揭晓

本刊荣获学术理论类优秀期刊提名奖



在全国 3800 余家社科期刊角逐中，69 家优秀期刊脱颖而出，其中 21 家获优秀奖，本刊等 48 家获优秀提名奖。这是本刊继连续三届获得全国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优秀理论文章奖之后，又一次获国家级大奖。1995 年 12 月 22 日上午，颁奖大会在北京举行，中宣部副部长徐光春、国家新闻出版署署长于友先、副署长梁衡、中宣部新闻出版局局长高明光等领导同志和全国报刊出版界代表 200 余人出席了大会。

△本刊获奖证书



▷ 中宣部副部长徐光春亲自向我刊代表、主编张硕斌颁发奖状

扎扎实实创一流

本刊评论员

1995年过去了。对本刊来说，这一年过得不寻常。期刊市场竞争剧烈，纸张价格猛涨，各项费用大增，给办刊带来很大困难。但是，在省委、省政府的指导和关心下，在社会科学界的大力支持下，我刊编辑部上下一心，努力工作，辛勤耕耘，取得了令人欣慰的成果：继1992、1993年度之后，1994年度我刊文章连续第三次获得了全国“五个一工程”奖；在1995年12月揭晓的首届全国优秀社会科学期刊评奖中，我刊获得了全国优秀社科学术理论期刊提名奖；省委、省政府为本刊设立的出版专项基金正式启动，使经费供给体制开始从传统的财政拨款向基金制转变；经批准，我刊由双月刊改为月刊的筹备工作也已完成；同时，刊物总体质量有进一步提高，在年度审核中各项指标基本达到国家新闻出版署新颁的《社会科学类学术理论期刊质量管理标准》。

我们也清醒地看到存在的问题和不足，离全国一流刊物仍有不小的差距。我们深深感到，面临的发展、提高的任务仍十分艰巨，只有不断开拓、进取，才能适应时代的要求，不负于学术界的殷切厚望。在新的一年里到来之际，我刊将一如既往地坚持正确的办刊宗旨，以提高刊物质量和水平为中心，不断改进刊物工作，为创办一流刊物而努力奋斗。

创一流刊物，就是按当今全国和国际的优秀期刊标准，办期刊精品。它要求我们立足广东，面向全国，辐射海外，以优质的作品、鲜明的特色、精美的形式，跻身全国期刊队伍的前列，成为代表广东最高水平的、在全国和海外有较高知名度的、权威性的学术理论刊物。提出这一奋斗目标，既是广东改革开放先行一步，在全国具有特殊的重要的地位所提出的要求，也是激励我们励精图治，以全新的姿态迈向21世纪的需要。

创一流刊物，首先要站在时代发展的潮头，突出鲜明的导向和时代主旋律，以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学习、研究、宣传为重点，统揽办刊全局，促进学术理论研究与改革开放伟大实践的紧密结合，促进两个文明建设和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要加强学术理论刊物的时代使命感，增强对现实生活的参与与介入，充分发挥理论阵地和学术园地的独特功能，为落实中央关于“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的光荣任务而努力。

创一流刊物，要集中全力抓质量，出精品。反映最新最优秀的学术成果是学术理论刊物的基本任务，刊物办得好不好，学术质量和品味高不高，当然要看综合整体水平，但是能不能拿出反映时代精神的，有创造性、有份量、有影响的，内容和形式都达到较高水平的好文章，是一个刊物学术水平和学术品味的主要标志。从选题策划、组织到编辑、出版的全过程，始终都要强化精品意识，倾注主要精力，实行重点经营，去发现、培育更多的精品文章，走出一条以精品带动全面繁荣的创优质、创一流的办刊新路子、新机制，促进刊物学术质量不断上台阶。

创一流刊物，要努力创出风格与特色。作为地方学术理论刊物，要在时代风貌、地方特色、学术品味、文章风格、出版形式等方面的有机结合上下功夫，逐步形成独树一帜的南国气派和广东风格，以鲜明的风貌和独特的品味立足于刊物之林。

创一流刊物，是一个艰巨而诱人的目标，对编辑部自身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们不仅在办刊思路上要把握时代脉搏，更广更活；在作风上也要更务实、更深入、更细致。“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只要我们像农夫倾情土地，像园丁浇注汗水，扎扎实实，精耕细作，辛勤奉献，就一定能够迈上一个新台阶，以优质一流的精神产品，奉献给人们，无愧于时代。

目

学术研究

(郭沫若题)

社长 主编

梁渭雄 张硕城

常务副主编

刘斯翰

副主编

郑英隆 林有能

编辑部主任

林有能(兼)

资深编辑

陶原珂(主任)

冯达才(主任)

谭湛明

编务主任

黄荣显

扎扎实实创一流..... 本刊评论员 (1)

· 学术聚焦 ·

永恒的旋律

——广东学术界谈爱国主义与时代精神..... (6)

弘扬爱国主义是我们的崇高职责(张磊) 近代爱国主义的历史进程(李锦全) 开放与爱国(黄明同) 对外开放与爱国主义的历史演进(陈红) 爱国主义的基本内涵和当代特征(左双文) 史学有祖国(方志钦)

· 经济 ·

可持续发展——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概念... 孙大中 (14)

我国经济增长方式如何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

..... 马壮昌 靖建国 (18)

区域市场与全国统一市场..... 蒋清海 (23)

论特区“第二次创业”..... 郭灿 (27)

广东工业企业技术进步的问题与对策

..... 关则文 黄菊勋 谢鹏飞 (30)

· 哲学 ·

让哲学成为时代发展的先导

——答友人问..... 高齐云 (35)

理学的历史意义..... 张岱年 (37)

“文化”探义..... (美国) 陈勋武 (38)

· 关于新时期道德建设的讨论 ·

传统道德与现代文明..... 冯达文 (42)

1996 年第 1 期

录

- 儒家伦理思想的现代价值 张和增 (44)
克服贬低否定儒家伦理的思维定势 温克勤 (46)

· 历史 ·

- 史学的诗性与客观性 李洪岩 (50)
明代亚洲外国官生在华留学及科举考试状况探议
..... 黄明光 (55)
1903: 梁启超的国家学说和经济构想 李喜所 (59)

· 岭南文化研究 ·

- 论岭南文化的近代精神 陈胜旻 (63)
传统与现代交汇中的思考
——第三次岭南文化研讨会综述 丁希凌 (68)

· 文学·语言·

- 文学史: 延续与断裂的双重构造 张荣翼 (69)
《帝京景物略》与竟陵文风 吴承学 (73)
《红楼梦》宗教精神新探 梅新林 (77)
互构语言学中的三元结构模式 辜正坤 (80)

· 学者访谈录 ·

- 从中介论到以人为本的形式美学
——访劳承万教授 本刊记者 陶原珂 (85)

· 广东学术新著 ·

- 跨世纪一代人对中国经济的理论思考
——《追赶型经济增长理论与实践》一书读后
..... 李金亮 (87)

ACADEMIC RESEARCH

主办

广东省社会科学联合会

编辑

学术研究编辑部

广州市黄华路四号之二

电话: 3815300—246 .

3846307、3846177

邮码: 510050

出版

学术研究杂志社

排印

佳达电子公司

发行

广东省报刊发行局

邮发代号 46—64

订购处

全国各地邮局(所)

国外总发行

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

国外代号: BM268 北京 399 信箱

刊号

ISSN1000—7326

CN44—1070

广告经营许可证

粤工商广字 010349 号

CONTENTS

ACADEMIC

- Doing a Solid Work for the Best Quality* **Recommendor of the Journal** (1)
- Guangdong Famous Historians' Talk about Chinese Patriotic Tradition in Modern History* (6)
- Continutable Development: a conception with epoch-making significance* **Sun Dazhong** (14)
- The Method of Chinese Economic Increase How to Change from a Roughly Opening Type to an Intensive One* **Ma Zhuangchang and Jing Jianguo** (18)
- Regional Market and Nationally Unified Market* **Jiang Qinghai** (23)
- "Founding Another Undertaking" in Special Economic Zone* **Guo Can** (27)
- Problems in Enterprise Technical Progress in Guangdong's Industry and Countermeasures to Them*
..... **Guan Zewen, Huang Juxun, Xie Pengfei** (30)
- Philosophy: a Guide for Epoch Progress* **Gao Qiyun** (35)
- The Historic Significance of "Lixue", a Confucian Philosophic School of the Song and Ming Dynasties*
..... **Zhang Dainian** (37)
- An Approach to "Culture"* **(US) Chen Xunwu** (38)
- A Written Talk about Establishing New Morals*
..... **Feng Dawen, Zhang Hezeng and Wen Keqin** (42)
- The Poetry Nature and Objectivity of History* **Li Hongyan** (50)
- Foreign Official Students from Asian Countries Studied and Taken the Imperial Exam in China in the Ming Dynasty* **Huang Mingguang** (55)

<i>Liang Qichao's (1873—1929) Country Theory and Economic Conception Put Forward in 1903</i>	Li Xisuo (59)
<i>Modern Spirit of the Culture in the South of the Five Ridges</i>	Chen Shenglin (63)
<i>A Summary of the Points from "The 2nd Symposium on the Culture of the South of the Five Ridges"</i>	Ding Xiling (68)
<i>Literary History: a Dual Structure of Continuance and Break</i>	Zhang Rongyi (69)
<i>"A Brief Discription: Scenses and Things in the Imperial Capital" and the Literary Style of the Jingling School</i>	Wu Chengxue (73)
<i>A New Research on the Religious Spirit of "Dream of Red Mensions"</i>	Mei Xinlin (77)
<i>A Linguistics of Mutual Construction: Structural Pattern of Triplex</i>	Gu Zhengkun (80)
<i>From an Aesthetic Intermediary Theory to a Formal Aesthetics Based on Human — An Interview of Prof. Lao Chengwan</i>	(a correspondent of the Journal) Tao Yuanke (85)
<i>A Comment on a New Works "A Theory and Its Practice of Economic Increase in a Mode of Pursuing"</i>	Li Jinliang (87)

永恒的旋律

——广东学术界谈爱国主义与时代精神

编者按：“爱国主义与时代精神”研讨会的召开，给广东学术界吹入又一阵新风。搞人文科学的人，从本学科出发，自觉地关注、参与、回答时代提出的重大现实问题，把自己的研究与当前改革开放的实践紧密结合起来，这既是社会科学研究的方 向，也是一种值得大力倡导的务实学风。本刊与广东历史学会、《广东社会科学》杂志、肇庆市社科联联合举办了这次研讨活动，并选取其中部分文章作为“学术聚焦”栏目加以推介，本意亦在于倡导这种方 向和学风，并通过这一栏目陆续把学术研讨中的“重点”、“热点”、“焦点”及时反映出来，促使学术研究活动与时代实践的脉搏同步。



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核心，是各族人民的共同精神支柱，是动员广大群众奋起御侮的鲜明旗帜，是激励人民建设祖国的

的、深切的炽爱。当然，这种激情是弥足珍贵的。但是，深刻的、丰富的爱国主义不能局囿于此，它还必须包涵理性的内容——决不能坐视祖国备受侵袭和沦于贫弱，定要“上下而求索”地寻觅救亡和富强之路。激

强大动力。

弘扬爱国主义，无疑是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崇高职责。

爱国主义，确切地说是具有完全意义的爱国主义，应是激情和理性的结合，而不能有所偏废。人们总是为

祖国的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多娇的江山和优秀的同胞而自豪，长期积淀了朴素

情促成了理性。理性升华了激情。因之，对祖国的命运的 镂心刻骨的关怀，就不能不体现为把爱国主义与当代先进社会思潮和运动——救亡和富强的理论和实践——相融汇、相激扬。爱国主义由此蕴涵了拯救和发展

祖国的社会内容，洋溢着时代精神，既是对历史传统的承续，更是在新的条件下的发

弘扬爱国主义是我们的崇高职责

——兼谈近代中国的爱国主义的演化

□张 磊

(广东省社科联)

展。

源远流长的爱国主义在近代中国异常昂扬，获致了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它的主流与当代先进社会思潮和运动紧密结合，并成为一切先进社会思潮和运动必须具备的本质特征和主要标志。

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中国近代的发端，具有特殊的意义。从中世纪末叶入于近代，舞台帷幕的开启既非生产力的突飞猛进所促使，亦非波澜壮阔的革命运动所导致，而是为英国侵略者发动的鸦片战争所拉动。强烈的外烁作用迫使近代中国逸出了正常的、健康的发展道路，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于原有的封建主义枷锁之外，又增加了殖民主义的新桎梏。帝国主义同中华民族的矛盾由是成为这种畸变的社会形态的主要矛盾，并且往往居于最突出的地位。严酷的现实是：在长达一个世纪的岁月里，帝国主义采用了军事的、政治的、经济的和文化的手段肆无忌惮的欺凌中国，把它推向贫困落后的深渊。因之，避免瓜分、共管的厄运，争取民族的独立，摧毁侵略者在华统治的墙角——封建主义，以民主取代专制；要之，挣破双重镣铐，以拯救和发展中国，使中国臻于独立、民主和富强，必然成为迫待解决的根本任务。作为近代中国先进思潮的主旋律的爱国主义的理性内涵，就在于此。

近代中国的爱国主义具有十分丰富的内涵。

从鸦片战争以迄八国联军之役，中国的爱国反帝斗争的失败是难以避免的。在这个历史时期，国家的权力为清朝政府所控制。现存政权主要代表了封建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并随着帝国主义侵略触爪的深化而逐步与之结成联盟，充当“列强”的“鹰犬”，甘为奴隶总管的角色。他们的抵抗大抵是消极的，对侵略者表现出一副奴颜媚骨。当然，封建地主阶级与侵略者之间并非没有矛盾。统治阶级的部分成员及代表确在民族危机深重的时刻主张抗击侵略者，甚至积极投入了正义的战斗。但是，除掉少数的优秀人物外，他们的爱国主义并不蕴含着先进的社会思潮，难以完满地回答来自外部世界的双重

挑战。赢得胜利与进步，在那样的条件下几乎是是不可能的。

卷入抗击侵略者斗争的还有广泛的阶级和阶层，主要是农民阶级和新登上历史舞台的资产阶级。无产阶级虽已诞生，却未成为自为阶级。农民阶级是反侵略的主力，从三元里抗英斗争到义和团运动，表现了他们保家卫国的情感和英勇，阻止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阴谋。但是，落后的生产方式限制了他们的眼界，使得他们不能把爱国主义与先进的社会思潮与运动相结合，提出科学的民族解放纲领。资产阶级的政派之一——维新派也把这个课题作为社会政治活动的主要内容，他们正是在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形势下把维新运动推向高峰，使爱国主义与维新思潮和运动相融汇、相激扬；从爱国走向变革。然而，由于他们缺乏赖以凭藉的物质力量，又对帝国主义存在着轻信和幻想，所以他们的奋斗未能取得真正的重大成果。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的爱国主义跨出了新的步伐，与当代先进的民主主义思潮和革命运动相融汇、相激扬。他们竭力避免中国惨遭“瓜分”或者“共管”的厄运，为争取民族的独立而奔走呼号。严峻的事实是必须从爱国走向革命——以武装斗争为手段，粉碎反动腐败已极的清朝政府和后来的军阀统治，才能拯救中国。但是，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对帝国主义既缺乏深切的认识，又从未真正建立起全国范围的政权，以致在整个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始终未能提出鲜明的反帝口号和进行坚决的斗争。因之，近代中国民主革命的首要任务——反对帝国主义不能得到充分反映和取得重大成果。资产阶级曾把爱国主义提到新的历史高度，赋予它以时代精神和社会内涵，丰富了爱国主义传统，起了震聋发聩的启蒙作用。只是历史的局限使得资产阶级不能领导中国民主革命走向彻底胜利，自然也不能真正完成反侵略的大业。

近代中国总是处于“挨打”的境地，根本原因就在于此。民主革命新阶段的到来——新民主主义革命取代了旧民主主义革命，根本改变了这种屈辱的历史。所以如此，

主要是由于爱国主义与当代中国最先进的社会思潮和运动相融汇、相激荡，即附丽于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几经曲折与反复，终于完成了近代民主革命历程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找到通向胜利的途径——新民主主义道路。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正确解决了当前革命的性质、任务、对象、动力和前途诸问题，被概括为一个著名的公式，即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革命。因之，也就科学地解决了它所内涵的民族解放的课题。这种符合中国基本国情和历史趋势的社会思潮和运动，把爱国主义深化和拓展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致令人民能够赢得战争的胜利和社会的进步。高扬的爱国主义，结出了空前的硕果。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光辉结局，就是不容置辩的范例。

在论及中国近代爱国主义的反帝课题时，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必须予以科学的分析和实事求是的评论。与坚船利炮俱来的是西方资本主义文明，但侵略者决非是如他们自诩的“文明的使者”。他们“为自己”而不得不带来的某些新的社会因素（近代企业、教育和科技等），完全是服务于殖民主义掠夺的，而不是为了殖民地附属国人民的福祉。为殖民主义枷锁所桎梏的人民失去了旧世界，却未能也不可能获得一个新世界。只有在人民掌握了自己的命运之后，那些新的社会因素才能成为他们真正享有的果实。一部中国近代史，毋庸置疑地论证了这个真理。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目的，并非要把封建的中国变为资本主义的中国。恰恰相反，它们要把中国沦为殖民地附属国，以成为供“列强”贪婪榨取的附庸。而在帝国主义的压迫下，无论是洋务运动、清末新政、袁世凯政权，抑或蒋介石的 22 年统治，都没有使中国成为资本主义国家。对这些充当帝国主义代理人的专制统治者的“政绩”的渲染和夸大，只能是无视基本史实的无稽之谈。只有挣破了殖民主义和封建主义枷锁后，中国人民才能使自己的祖国臻于繁荣富强！



近代爱国主义的历史进程

□李锦全
(中山大学哲学系)

爱国主义既是历史范畴，即随着各时期社会的变化，其内涵也会有所改变。如在封建时代往往和忠君联系在一起，这就是屈原式的爱国思想，其中是带有爱乡土的感情。宋末的文天祥、明末的史可法也属于这一类，同时和民族气节相联系，如岳飞抗金就带有这类性质。

到了近代，爱国主义思想主要是对付帝国主义的外来侵略，鸦片战争的抗英斗争拉开了近代爱国主义行动的大幕。由于清朝政府推行宁赠友邦、不给家奴的卖国政策，实际上与帝国主义相勾结，因此反对封建专制政权的民主革命，如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政纲，提出“驱除鞑虏”、“建立民国”的主张，就带有爱国主义性质。反帝反封建是中国近代革命路线的主旋律，同时也表现为爱国主义思想的特点，这是由于中国当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一特殊国情所决定的。

现在有些青年由于不懂历史，如三元里抗英有人说是干了蠢事，理由是当时英国是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而清朝是个落后的封建王朝，认为先进可以帮助落后，所以不应该抵抗。还有割让香港给英国，我们认为是国耻；而有个小青年却说为什么当时不把广州也给英国？这样广州今天就像香港那样繁荣了。学术界中人，也有为当时清政府不搞改革开放而表示遗憾，认为使晚清时失去现代化的机会。还有鸦片战争后广州人反对英人入城问题，广州人是对还是错？过去多数历史书认为是爱国的思想行为，是反对外来

侵略的正义斗争。但也有说是不负责的意气用事,甚至把叶名琛的一误再误、大沽之失、天津之约,都归咎于粤民的一激再激。提高到理论上,就说这种狭隘的传统型的爱国主义往往弄致最屈辱的投降主义出现。由是爱国被说成是排外,是抗拒西学东渐的逆流,显示出岭南文化难以想象的封闭性,是妨碍中国走向现代化的阻力,给广东乃至全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以上分歧应该进行讨论。

这里需要探讨的问题:所谓传统型的爱国主义在近代中国是否过时?有一种观点,认为近代中国,唯一正确的救国道路是以开放的心态,学习西方的先进文化,改革宗法专制制度,发展经济,实现民富的目标,这是反抗外来侵略,捍卫国家独立的最有效途径,也是现代爱国主义的真谛及它与传统爱国思想的差别所在。这里牵涉到爱国主义的转型问题,即由传统型爱国主义转为现代爱国主义。提出这种观点的动机当然是好的,但是这种爱国主义思想行为,在晚清封建专制统治下能够实现吗?历史实践证明,康梁变法及后来有人提出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的主张,在旧中国只能以失败告终。我们现在推行爱国主义教育,要实现改革开放并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那是可能的;但在晚清时只能高扬反帝反封建的传统爱国主义,不可能超前实现所谓现代爱国主义,更不能用后者来否定前者,这样对年青一代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只能起误导作用。

就是在世界市场形成之后,在和平的时期里,这二者便是辩证的统一。不论在什么国度,人们爱国,也就是要振兴祖国、建设祖国,而国家的建设和振兴,只能打开国门进行;然而,当国门打开之后,则必须坚持主权独立原则,即坚持爱国主义原则。爱国则必须开放,而开放是为了爱国。

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表明,只有开放,才能振兴;闭关锁国,只能落后,落后必然挨打,最终也只能被动开放。同时,实行开放,必须坚持主权独立,丧失主权的“开放”必然沦为殖民地。

开放与爱国,是否可以兼得?答案应该是肯定的,关键是正确处理开放与保持主权的辩证关系,正确地吸取历史的经验,防止两种可能出现的错误倾向:如果实施开放而不以保持主权为前提,就可能重蹈清朝由被迫开放而丧权辱国的覆辙;如果实施开放而又不清除视借外债如饮鸩的思想障碍,“门户开放”将是一句空话。故孙中山曾经反复申述,开放以保持主权为前提,开放不会导致丧权,开放与爱国完全可以兼得。可见,开放与主权的辩证关系,也就是开放与爱国的辩证关系。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孙中山把能否保持“完全主权”作为两种开放的分水岭,作为爱国还是亡国的关键。

既要开放,又要爱国,近代仁人志士的共同立场。70年代以来,中国从痛苦的教训中再次懂得了国家的振兴,必须要开放,要打开国门利用外部力量进行“四化”建设;人们开始懂得爱国主义与开放主义相统一的道理。应该说,十多年来的对外开放的事实已经证明,开放是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是国家振兴的必由之路。开放政策的实施,给中国带来了勃勃生机,带来了经济的迅速发展。

当然,开放使人们眼界大开、国家振兴,带来了积极影响,同时开放中也曾出现种种糊涂观念,也产生过一些负面的影响,一些有悖于以爱国为宗旨的负作用,说到底是一些人还不能正确认识和处理开放与爱国的关系。

当开放之初,特区开放伊始,外商纷纷



爱国主义与对外开放,在近代以来,也

前来投资设厂之时,一些还不敢开眼看世界的人,便惊恐起来,似乎中国已临“亡国”的大祸,指责开放是“引狼入室”,以为“开放”=“卖国”。有人看到开放带来的变化,不以为喜而以为忧,他们痛哭“江山变色”,担忧“复辟”之将至。这些人头脑中传统的封闭观念,是那樣的根深蒂固,固不知商品经济为何物,也不知当今的时代是什么时代。

然而,改革开放的大潮,汹涌澎湃,席卷着神州大地,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铁一般的事实说明,中国必须开放。而当开放使人们看到西方的先进和中国的落后之时,真可谓“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这一“跳”本该是要“奋发图强”,但不然,一些人产生出来的却是“样样不如人”的自卑心理。甚至有人以为“月亮也是外国的圆”,主张全盘西化,声言必须把一切传统统统扔掉才可以实现现代化,要以“蓝色文化”取代“黄土文化”。近现代曾一度出现的“崇洋媚外”思想又死灰复燃。正是在这种“崇洋媚外”思想的支配下,一些人经不起外来的诱惑,在洋人面前丢了人格、损伤了国格。

而当开放给人们带来了硕果、带来了喜悦之时,学术界有一些人以为近代中国不应抵抗外敌,广东人更不应该“抗英”、不应该“不许外国商人进城经商”、不应该把洋人从珠江三角洲赶到长江三角洲,贻误了广东现代化的大好时机。总之,这些人把“爱国”=“排外”=“封闭”。同样,他们的词典里缺去“爱国”一词,或许他们的“爱国”一词是另作他解。

总之,爱国主义与开放主义,必须结合,前者为目的,后者为途径,前者离不开后者,而后者却服务于前者。

古代中国闭关锁国给传统爱国主义造成两种缺陷:一是对内将“忠君”与爱国等同起来,爱国必须忠君,忠君就是爱国;二是虚骄的心态盲目排外,“严夷夏之大防”拒绝了解世界潮流和学习外国的长处,终致落后挨打、误国、祸国。

近代列强以坚船利炮和商品、资本,强行打开中国的大门。中国被迫实行丧失主权、领土与民族尊严的对外开放。一代代先进的中国人在奋起反抗外来侵略的血与火的洗礼中,摒弃传统爱国主义的历史缺陷,冶炼出具有时代特色的近代爱国主义,作为唤起民众救亡图存的新的精神武器。

近代爱国主义在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运动中形成如下主要的特点:一是爱国与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争取国家和民族独立紧密联系在一起。这一特点促使民族主义思潮在中国各地持续高涨,并且成为近代爱国主义的表现形式之一。高涨的民族主义思潮部分起源于传统爱国主义中的抗拒异族入侵的观念,但其要求的各民族独立、平等、自治的目标早已超越后者的局限。

二是“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毛泽东)对于中国来说,入侵中国的西方列强既是敌人,也是先生。它们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先进文明,映衬出与之匹敌的东方封建主义没落文明的致命弊端。先进的中国人因此在抵御西方列强入侵的同时,不断向西方学习探求改造和振兴中华的革新之道。他们锲而不舍的探索和奋斗不



对外开放与爱国主义的历史演进

□陈红
(暨南大学出版社)

仅赋予近代爱国主义以全新的内涵和活力，而且使中国在从西方引进形形色色的主义作为一个个救国方案并付诸实施之后，终于得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结论。

三是近代爱国主义与传统忠君思想决裂，而与民主主义结合，从而担负起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思想任务。自从孙中山发动辛亥革命以后，近代爱国主义便超越了林则徐为首的地主阶级开明派忠君爱国的情感纠葛和康有为等资产阶级维新派保皇爱国的思想局限，向着民主共和的政治境界前进。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许多思想先驱开始将争取人民参政权与唤起人民爱国心联系在一起。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之后建立起来的人民民主专政，更是唤起翻身作主人之后的中国人民的巨大爱国热情。近代爱国主义的三大特点相继形成于一代代先进的中国人在国家被迫对外开放之后，努力进行的化被动为主动的探索奋斗之中。它们为爱国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发展、升华奠定了良好的思想基础。

当代中国在深刻总结中国长期停滞落后的历史教训之后，已经主动将对外开放作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项基本国策。经过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基本形成全国范围的对外开放格局。这是在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基础上谋求与世界各国平等互利的对外开放，与近代中国屈辱性的对外开放有着本质上的区别。与此同时，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在冷战结束后面临的两大问题，经济、文化上的交流与合作已成为中外关系的主调。在对外开放新格局和改革开放实践中，爱国主义无疑产生着新的内涵、形成新的特点。而另一方面，改革开放转型与国内外消极腐败因素在开放大潮中的沉渣泛起，都从不同的角度给爱国主义的传统教育带来新的问题和新的挑战。从理论上探寻、反省和总结这些新的内涵、特点，从操作上解答、回应这些新的问题和挑战，都将有助于丰富和发展当代爱国主义，充分发挥其在动员、鼓舞人民团结奋斗、共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中的作用。



爱国主义的基本内涵和当代特征

□左双文
(华南师大历史系)

爱国主义的基本涵义，是对祖国的热爱和忠诚。凡是对国家、民族有益的事情，就坚决拥护并积极参与；凡是对国家、民族有害的事情，就坚决阻止和反对；一切从国家、民族的根本利益出发。

爱国主义是一个动态、历史的范畴。由于一个国家所处的时代、所面临的国际国内环境、所面对的主要矛盾不同，国民热爱祖国、忠于祖国的具体表现形态也就各异，甚至在形式上极为对立；又由于在维护祖国利益的人们中存在着不同的阶级和利益集团，在其它方面甚至是重大政治原则问题上有着不同的主张和信仰，他们爱国的程度和层次也不一样，有的只在某

一部分内容上重合，在其它方面则是矛盾或对立的。

在外敌入侵，国家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爱国主义主要表现为奋起反抗外来侵略，捍卫国家的独立和民族的生存，不向侵略者妥协和屈服。在这个历史条件下，无论他属于哪个阶级、哪个集团，无论他有着何种政治信仰、宗教信仰，只要他坚持抵抗，站在反侵略的一边，他就是爱国者，就属于人民的阵营。这种情形在我国抗日战争中表现得十分突出。

而在国内阶级矛盾占据主导地位，阶级对立、阶级冲突十分尖锐，没落、腐朽的反动势力阻碍着国家和民族进一步发展的时候，爱国主义、对祖国的忠诚与热爱就表现为积极投身于社会变革，推翻旧的、不合理

的政治、经济制度，清除逆历史潮流而动的腐朽、没落的阶级和集团，使国家、民族恢复生机和活力。对国家民族命运和前途的深深关注，对社会进步、人民幸福的热切追求，这正是一种对国家、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是一种无比的忠诚和热爱，是爱国主义的伟大体现。

在外敌入侵被打退，国家处于相对稳定的国际和平环境，国内急风暴雨式阶级斗争已经结束，政治统治基本平稳、安定的时期，爱国主义主要就应当体现为积极致力于国家的经济建设，发展生产力，增强国家的综合国力，使国家日益强盛，人民日渐富裕，国防日益巩固。

在中国当代，爱国主义又包含哪些内容呢？

邓小平曾说过：“什么叫爱国者？爱国者的标准是，尊重自己民族，诚心诚意拥护祖国恢复行使对香港的主权，不损害香港的繁荣和稳定。只要具备这些条件，不管他们相信资本主义，还是相信封建主义，甚至相信奴隶主义，都是爱国者。我们不要求他们都赞成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只要求他们爱祖国，爱香港。”推而广之，只要有民族自尊心，拥护祖国的统一和稳定，无论他在意识形态上信仰什么主义，都可以称得上是爱国者。

1990年5月3日，江泽民在《爱国主义和我国知识分子的使命》一文中提出爱国者的三个层次：（1）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2）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3）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江泽民指出：“我们并不要求所有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都赞同大陆实行的社会主义制度，只要他们赞同‘一国两制’，我们就要同他们加强团结。”不同层次的爱国者，爱国主义的涵义有所不同，但最起码的要求，是要拥护祖国的统一。

由此看来，当代爱国主义应当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1. 拥护祖国统一，维护国家的独立和

安全，反对分裂国家，反对外国势力干涉中国内政，破坏中国统一。具体来说，就是维护我国领土主权的完整，赞成以“一国两制”的方式解决香港问题、澳门问题、台湾问题，维护我国在南海诸岛的主权，反对“两个中国”、“一中一台”或其它任何形式的台独。这是最起码、最基本的要求。

2. 国内各民族一律平等，维护民族团结，反对民族分裂，坚决反对任何把西藏、内蒙、新疆等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从祖国大陆分裂出去的企图。

3. 贡献全部力量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拥护改革开放，为把祖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努力拼搏。江泽民指出：“在当代中国，爱国主义与社会主义本质上是统一的”，因为社会主义“为我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进步提供了可靠的保证与光明的前景，集中体现着国家、民族、人民的根本利益。”从这个意义上说，赞成祖国统一的固然是爱国主义，拥护社会主义、为祖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勤奋工作是更高层次的爱国主义，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当代爱国主义的主题。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与改革开放是密不可分的，要使中华民族真正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要振兴中华，就必须坚持改革开放。改革开放的历史精神与爱国主义精神是贯通和统一的，它体现了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人民的现实追求和中华民族的深远前景得以实现的唯一可能性，因而改革开放是当代的爱国主义的重要特征。

4. 积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致力于建设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也是当代爱国主义的题中应有之意。江泽民指出：“在当代中国，爱国主义与人民民主即社会主义民主，本质上也是统一的。”它的基本精神是“在共产党领导下，人民当家作主，建设和管理自己的国家，这是社会主义民主的核心内容。”而“维护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是爱国主义的重要体现。”



史学有祖国

□方志钦

(广东省社科院历史所)

迄今为止,研究人类社会历史的空间,总离不开国界,因为自有文字以来的人类历史都与国家相依存。

人类的历史充满着错综复杂的斗争,最基本的是阶级斗争、生产斗争、民族和种族斗争。这些斗争无一不与国家有关。国家与国家的斗争往往是各种斗争的综合反映。

国家既是阶级统治的工具,也是地域管治的工具。国家对内的统治是以强力调整国内关系为依归的,而国家的对外制衡则在于最大限度地维护所辖地域利益,使之免受域外的侵害。有的国家不以维护其所辖地域为满足,不断向外扩张,而使别国蒙受侵害。于是有国与国之间的侵略与反侵略的斗争。这种斗争,数千年来史不绝书。

研究历史的人大抵公认侵略别国是非正义的,反侵略是正义的。但也有一些为侵略辩护的理论,即“侵略有理”论。后者违反历来国与国关系的多数公认的准则,强词夺理。

历来国家有疆界,史学工作者有国籍,所以毫无疑问,史学有祖国。自古以来,多数史学家都爱他们的祖国,并为其祖国而编写、研究历史。迄今以来,史籍或史学著作都是国别史或是在某些国别之内的区域史和专门史。众所周知,史学工作者在研究历史时都各有其立场、观点、方法。关于阶级的、集团的立场,有的时候,有的人,未必愿意公开宣示,但国家的立场则往往是非常鲜明的,这就是爱国主义起作用。

历史上的爱国主义有正当的和狭隘之分。前者在平时专心致志于己国的繁荣富强,在国家危难时起而卫国,反对外来侵略,但不侵略别国。后者平时自傲自负,唯我独尊,时机一到便侵略别国,为己国谋不义之利。我们当然要赞成前者,反对后者。

我们应当提倡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相结合的爱国主义,我们热爱自己的祖国,也热爱别国人民,同情和支持他们的正义、进步事业。世界是终要实现大同——无国家、无阶级、无剥削、无压迫的境界,但是现在还有国家、阶级、剥削、压迫,国家的性质也有区别,比如说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区别。我们社会主义中国人民应热爱社会主义的中国。对于历史上的中国,我们应怀着浓厚的感情、科学的态度去对待它。

有人认为,持爱国主义精神去研究历史是一种偏见,只有无爱无恨也对待历史才是客观的、公正的。这些人不懂得爱和恨本来就是一种客观存在。爱什么、恨什么源于人们的立场。立场就是立足点,除了“外星人”,人人都需要在地球上都有其立足点的。没有立足点的史学工作者是根本不存在的。立足于中国的史学工作者当然要热爱中国,憎恨给中国带来过无穷灾难的外来侵略势力。不然的话,他的立场就是站在中国之外了。近百年来,灾难深重的祖国就像煤渣的老婆子。她蓬首垢面、穷困潦倒。但是我们对她不能不爱,对制造这种社会环境的根源,我们不能不恨。我们更要为摆脱旧中国的窘境而献身的人们表示崇敬。我们提倡历史主义的爱国主义,并不是要“捡煤渣的老婆子万岁”,而是要老婆子的子孙们挺起脊梁骨,创造自己美好的未来。但是,我们绝不允许对这位“老婆子”横加指摘,诸如“愚昧”、“落后”、“短视”、“保守”之类。毫无疑问,这些指摘都有其事实根据,但却没有指出其内在的和外在的根源——统治“老婆子”的土洋两种恶势力,反而对洋大人的“文明精神”、“嘉言懿行”尤多称道,以衬托出“老婆子”的卑微低贱,因而得出“活该”的结论。更有甚者,连“老婆子”的子孙们的不平之鸣、攘臂而起也要批评一番,说是横竖成不了大气候,何必多此一举,招惹麻烦,打乱中国近代化,即洋化的进程。

“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这是文天祥《正气歌》中的名言。“正气”在“邪气”泛滥中方显得珍贵;爱国主义精神在国家危难中更展现光辉。没有国,就不必爱国。没有侵略主义、卖国主义,就不必有针锋相对的爱国主义。爱国主义是历史的产物。

可持续发展——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概念

□ 孙大中

可持续发展这一概念是 50 年代后西方国家工业化经济迅速增长,出现了世界性的人口膨胀、资源危机、环境恶化等严重影响社会发展的问題之后,人们经过反复思考和探索,于 80 年代开始探讨的人类发展的一种新思路。目前,这一概念正成为世界各国的共识,因为它不但涉及人类未来的前途和命运,而且对人们的思维方式、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都将产生十分深刻的转变和影响。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审议并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 2010 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指出,必须把社会全面发展放在重要的战略位置,实现经济与社会相互协调和可持续发展,并进一步明确这一重大方针对全面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各项目标具有长远的指导意义。

一、可持续发展概念的几种不同理解

“可持续发展”是 1987 年以挪威首相布伦特兰夫人为首的联合国世界环境和发展委员会在《我们共同的未来》一书首先明确提出来的。其内含是:“人类应既满足当前的需要,又不危害子孙后代生存利益”。实际上这只是哲理性的概念,类似于中国的成语“功在当代,利在千秋”。也可以说是一种主张,并不是一个严格的科学定义。由于这一概念涉及的领域、空间和时间十分广阔,所以对其理解也就有不同的角度和涵义。1991 年世界自然保护同盟(INCN)、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和世界野生动物基金会(WWF)共同发表《保护地球》一书中,对可持续发展的定义为:“人类生活在永续的良好的生态环境容量中,同时又要改善人

类生活的质量”。强调既要注意环境容量,又要改善生活质量,让人类世代过好日子。这实际上是在强调发展的目的。世界资源研究所在“1992—1993 年世界资源”一书中则提出:“可持续发展是不降低环境质量和不破坏世界自然资源基础的经济的发展”。这是强调不要以牺牲资源和环境为代价的经济发展,在不破坏自然和社会的基础条件下,完成经济发展这一最根本的任务。该书还从科学技术方法的角度,提出一些学者的观点:“可持续发展就是建立极少产生废料和污染的工艺或技术系统”,强调节约有效和清洁化的技术,认为这是合理利用资源和保护环境的重要措施。1991 年国际生态联合会(INTECOL)和国际生物联合会(IUBS)则共同提出可持续发展的概念为:“保护和加强环境系统的生产和更新能力”,提倡保持最佳的生态系统以使人类的生存环境得以持续下去。刘培哲认为:“可持续发展是能动地调控自然—经济—社会复合系统,使人类在不超越资源与环境承载能力的条件下,促进经济的发展,保持资源永续和提高生活质量”。这一定义相对说比较完整,但也还有待完善。

可持续发展概念最本质的创新,是改变过去人与自然的对立关系为谐合关系,以提高人类的生活质量为目标。这与传统的单纯以经济增长为发展目标的模式具有本质的不同。这一改变要求正确认识“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重新考虑和变革其资源观、价值观、科学观和道德观,大致或部分相当于我们日常所说的世界观、人生观。

可持续发展是自然、经济和社会可持续

发展三个子系统的相互协调和长期持续发展的综合,最终以提高人类的生活质量为目的,它的提出将影响着人类发展的进程。1992年的“世界环境与发展”大会是人类历史进入可持续发展的新阶段的开始。尽管以上认识还有待未来历史发展进程的证实,但是,面对西方工业革命以来人类所面临的人口、资源、环境等的严重挑战,“可持续发展”无疑是经过深刻反思后的全新的选择。

二、可持续发展概念的由来

人类发展历史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大约在一万年以前为自然发展阶段,人类虽然有自然拜物的思想,但为了生存,就有捕杀动物和采集植物等破坏生态的活动。总体的说,生态环境处于原始状态。从一万年前到18世纪初为农业阶段,人类开始放牧动物、栽培植物和开发矿藏。受天定胜人思想的统治,经济上属于自给型,维持低水平的生存需要。以上两个漫长的历史阶段,人类对生态环境没有十分严重的破坏。大约两个多世纪以前,德国人刻卜勒冲破神灵帝王主宰一切的思想束缚,提出了“地动说”,牛顿的力学定律等的发现使科学突飞猛进地发展。之后,英国人瓦特发明了蒸汽机,把人类几千年用火的方法改变为产生动力,从而引发了一场工业革命,人类历史从此进入中级发展阶段,出现了从商品经济到市场经济的发展。这一阶段以大量消耗不可再生资源为基础促进经济的快速增长和维持较高消费水平的需要,并以此带来财富和文明。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的“有了经济就有了一切”的理论促进下,西方国家竞相追求经济的高速增长。矿物能源使用量增加了30倍,工业生产增加了50倍以上。这种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出现了通货膨胀和失业危机,以及更为严重的人口增加,能源匮乏、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等矛盾,不仅阻碍了经济的发展,也威胁到人类的生存。60年代初,美国海洋生物学家卡里逊写了《寂静的春天》一书,引起了人们对环境保护的关注。60年代末英国经济学家鲍尔丁把地球形容为在茫茫太空中的一条宇宙飞船,人口和经济的不断增长,资源开

发殆尽,人类生产和消费所排放的废物将充斥地球的空间,那时整个人类社会将会崩溃。1970年罗马俱乐部梅都斯等人出版了《增长的极限》,指出由于工业的发展,不可再生资源的消耗和对环境的污染要比人口增长和工业增长还快。为了避免人类社会的瓦解,他们提出经济零增长模式。显然这种模式是不符合人们对发展的愿望的。人们已认识到单一目标地追求经济增长的危害性,一些科学家把过去的发展模式称之为“牧童经济”,即象牧童在草原上放牧,对资源和环境无所顾忌,只是以追求物质转化的数量作为社会经济发展的标志。并提出以后的模式应该是“宇宙飞船经济”,即要象在宇宙飞船上生活一样,以最少的资源消耗和废物排放来保持生态系统的良好状态和社会经济的系统正常发展。

联合国为了寻求解决全球环境与发展所面临的严重问题,1984年10月成立了以挪威首相布伦特兰夫人为主席的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并在她领导下,集中了世界上优秀的环境、发展方面的著名专家和官员,到世界各地进行了近三年的考察研究,编写了《我们共同的未来》一书,1987年在东京举行的委员会上通过,后又经第42届联大辩论通过。报告认为,人类生活在地球上,我们只有一个地球。从而提出:“从一个地球到一个世界”的观点。全书以“共同的问题”、“共同的挑战”和“共同的努力”三篇概括了当前人类发展所面临的严重危机,也指出了出路所在。书中认为,科学技术向我们提供了更深刻地认识自然系统的潜力,人们有力量使人类的事务同自然规律相协调,并在此过程中走向繁荣昌盛。人们可以期待一个经济发展的新时代的到来,这一新时代必须建立在使资源环境条件得以持续和发展的基础上,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这就是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及其由来。

《我们共同的未来》一书发表后,全球用可持续发展观点研究和探讨社会经济发展问题形成热潮。罗马俱乐部重新用计算机模型进行推算,并于1992年出版了《超越

极限》一书，结论是：1. 人类消耗资源和产生污染的速度已超过物理上可持续的速度，如不大力降低物质流和能量流的转化，几十年后，人们粮食产量、能源消费和工业生产将不可控制地衰退；2. 避免这种衰退的办法有两个：首先是改变现行的物质消费增长和人口增长的政策与行动，其次是尽快大幅度地提高原料和能源的利用率；3. 实现可持续的社会发展在技术上和经济上都是可能的，并应重视其充分性、公平性和人的生活质量等。可见，曾对人类社会发 展抱悲观态度的罗马俱乐部，经过 20 年的反思和探索也转而认同可持续发展的观点。

现在，人们开始将自然界普遍存在的物质不灭和能量守恒定律应用到人和地球作为有机整体的复杂系统。在尽量减少资源消耗的基础上，提高资源的利用率，促进可再生资源的增 长，使系统内部在相互协调的情况下物质和能量转化率达到最佳效果，并使其结构功能保持良好状态。这就是人与自然相协调的可持续发展的经济模式。这一模式以新科学观为基础，也反映了可持续发展模式的新型的 资源观、价值观和道德观。应该说，可持续发展概念的产生是以经济与科学相结合为基础，是经济学家、社会活动家和自然科学家集体智慧的结晶。

三、非可持续发展的经济理论的误导与科学技术发展的缺陷

传统经济学理论对于非持续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导向作用，其中自然资源和环境的价值和国民生产总值（GNP）这两方面的理论就是最明显的例证。在传统经济学理论中，认为没有劳动参与的东西就没有价值，市场经济中没有交易的东西就没有价值。因此，资源和环境，特别是自然资源常常是无价或低价的。长期以来，我国矿产资源勘探后无偿提供开采就是最典型的例子。这种产品高价，原料低价和资源无价的经济价值体系，给掠夺式开发自然资源、肆意破坏和污染环境，实行高能耗高物耗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大开方便之门，这就是粗放型生产方式。工业革命以来，以没有节制地消耗了地球上一大半不可再生资源为代价来换取经

济的高速增长。而资源开发过程中的大部分物质作为废物污染着地球，又直接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由此可见，与工业化有关的环境污染多与资源的开发和消耗有关。正确的资源观和价值观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此，资源开发利用中，除了适当的政策法规、科学的管理系统和先进的工艺技术以外，价格体系的调整也势在必行。

自从 30 年代凯恩斯提出经济管理中以 GNP 来度量经济增长以来，GNP 一直作为衡量经济福利的综合指标，受到各国的采纳和重视。GNP 是商品与劳务的总和，单一地用它来度量经济的发展有许多弊端。因为它并不反映代表经济效益的投入与产出比的关系，不反映所取得的数字中资源与环境的代价，不能全面反映生产力的发展程度，也反映不出生产的调配状况，是国防生产还是福利生产等，掩盖了国家内部的贫富差别等。显然，简单用 GNP 来衡量一个国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等是不够全面的。更深层次的问题还在于 GNP 本身的代表性不够，在于传统的经济模式是以追求 GNP 的增长为主要目标，忽略了社会的全面发展，从长远来说是欲速则不达。为了全面表达多目标发展的概念，除了 GNP 之外，一些国际组织，包括各银行都提出一些辅助或补充的经济指标，以符合于社会全面发展的要求。

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对促进经济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但就适应可持续发展与需要而言，科学技术本身也存在一些缺陷，主要表现在学科和专业分工过细，学科之间缺乏交叉综合，一些传统学科脱离国民经济建设。为此需要转变学科发展方向或设立新的学科以适应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

从科学发展史来看，学科的分化约始于三个世纪之前。其中培根的经验主义自然观、笛卡尔的分解方法和牛顿的机械论对学科分化和专业划分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对发展近代科学、促进人类文明发展无疑是十分重要的。但它们总体上是一种分解的思维模式，把本来是整体的世界和事物分解成孤立的单元，并导致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分

离、科学与技术分离以及科学和技术的学科分工过细,客观上促使掌握科学技术的人类产生与自然对立的观点,由此则企图要征服自然,结果是破坏了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而面对阻碍人类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如人口、资源、环境和灾害等时,单一的或少数学科又显得无力。因此,跨学科的发展不仅是科技创新的需要,自然科学、技术科学与社会科学的交叉、融合和综合是解决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的必经之路。况且,科技的理性发展与社会道德理想的差距更应不断缩小或达到平衡。因此,学科的交叉和综合是可持续发展的科学观的重要内容,也是科学技术发展的方向,是应该加以倡导的。

在技术方面,瓦特发明蒸汽机引发工业革命后,工业生产方式即为高资源消耗和高废物排放的线性生产方式。这是资源危机、环境恶化的重要根源。非可持续发展的概念中在对待热力学第二定律的熵增加,即废物的产生是不可避免的观点上,忽略了科学技术在降低熵增加值方面的能动作用。我国要实现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关键是要不断探索新的科学技术方法,依靠科技进步,最大限度地节约资源、降低能耗,同时加快资源再循环、再利用和三废资源化进程,最终实现资源、环境与经济的协调发展。因此,可持续发展要求科学技术的发展与人类的发展生产活动更大规模和更有效地结合,其实用性也更趋明显。当代科学发展的三大趋势,即科学的综合交叉性、实用性和对未来发展的预测和评估正是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对科学技术发展的要求。

四、科学技术是走可持续发展道路的推动力

科学技术对于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的推动作用是不言而喻的。邓小平同志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充分肯定了科学技术和科技人员在发展生产力中的重要作用。从生产力的三要素来看,首要的是具有科学知识、技能和生产经验的劳动者,其次是劳动工具和劳动对象。上述三者是需要科学技术来武装和开发的。特别是科

学技术发展到今天,劳动者要转向知识化的脑力劳动者,劳动工具从机械化走向自动化,进入模拟智能化阶段,劳动对象逐渐走向人工合成化等,这些无疑都离不开科学技术的支撑。值得注意的是,一些经济学教科书至今对生产力的定义仍然是:“人们征服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能力”,仍然将人与自然对立起来,其结果是:不控制人口,不珍惜资源,不保护环境,不保持生态平衡,最终也不能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需要把人和自然的关系由征服改为协调,由对立改为共处,这是可持续发展概念中科学观的核心。正由于这样,对劳动者、劳动工具和劳动对象都需要赋予新的含义和内容,要求劳动者应向科技、道德和艺术素质化方向发展,劳动工具应向低耗、高效和智能化方向发展,劳动对象应向循环、清洁、无公害化等方面发展。这就涉及到发展生产力的各个方面都需要用新科技观来改造。因此,未来人类社会的发展,科学技术是最重要的推动力。

前不久,国家《关于加强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中,要求到本世纪末初步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科技自身发展规律的新型科技体制。可持续发展的科技体系既符合科技自身发展的规律,又与社会全面发展的目标相一致。关键是如何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更好地解决科技对经济的“面向”和经济对科技“依靠”的问题,从战略目标、政策、体制、规划和计划等方面体现科技与经济的有机结合。广东省珠江三角洲经济区规划工作,在科技与经济结合方面,采取了决策层、科技专家和群众三结合以及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技术科学三结合,并且采纳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和战略,使规划取得了良好的效果。若能在实现广东省的现代化目标过程中,在深入解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机制和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过程中进一步发挥经济和科技结合的作用,将是争创广东发展新优势的根本途径。

作者单位: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
责任编辑:郑英隆

我国经济增长方式

如何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

一、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势在必行

我们所要进行的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就是从粗放型经济增长向集约型经济增长转变。粗放型经济增长的主要特点是追求数量和速度、高投入、高消耗、低质量、低产出、低效益，人们主要着眼于扩大生产规模来求得经济增长，或者说外延扩大再生产是实现经济增长的主要途径。一般说，这是经济发展较低阶段的经济增长状态。集约型经济增长则与之相反，其主要特点是低投入、高产出、高效益，人们着眼于提高经济效益来实现经济增长，或者说，内含扩大再生产是实现经济增长的主要途径。相应的，经济发展也处在较高的阶段上。

经济增长方式是由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经济运行机制和体制决定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在经济发展的—定阶段有其客观必然性，是不可逾越的。建国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就是采取了优先发展重工业、高积累、高速度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这对于改变落后的生产力面貌，合理布局生产力、增强国家实力、缓解供给严重不足是非常必要的，而且已取得预期的效果。但是，当经济达到较大规模和总量水平后，仍实行这种增长方式就会带来一系列问题，比如：高投入、低产出必然造成过量的货币发行，导致通货膨胀；工业粗放经营势必挤压农业，影响国民经济基础的巩固；热衷于铺新摊子，忽视老企业改造，造成大批国有企业活力不足；大量国有企业经营状况不好，投入产出率低，许多新建项目长期不能投入生产使用，甚至成为无效投资，造成财政困难、赤字和债务超常增长；产业的技术含量低和质量不高，必然影响我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很难在开放中抵挡住来自国际市场的冲击和压力。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在我国走到了尽头，要解决经济生活中存在的一系列问题就非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不可。

当前我们提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不仅是遵循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更重要的是实现我们今后的任务和所面临的形势的需要。

首先，实现今后5年和15年的奋斗目标 and 主要任务要求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今5

年和后 15 年,要使我国经济在快速增长的基础上,继续保持较快速度,按照目前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无论是资金还是能源、原材料都会出现较大的供需矛盾。据测算,“九五”要实现经济增长 8% 左右。按目前的能源弹性系数,能源供需差率达 20% 左右。能源和原材料已经成为制约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目前在我国经济生活中存在一种矛盾现象:一方面,我国耕地、水和重要矿产资源的人均拥有量不足。资料表明,我国不少资源的人均量大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耕地为世界人均拥有量的 1/4,石油为 1/8,天然气为 1/20。另一方面,产品傻大笨劣,原材料、能源浪费严重达到了惊人的地步。缓解资金、资源供给制约的矛盾,出路只能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其次,为了适应国际经济和科技发展的大趋势,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也必须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据分析,今后一段时期内世界经济和科技发展趋势将呈现以下一些重要特点:一是全球经济在加速结构调整和起伏中进一步增长,亚太地区经济更加活跃;二是科技发展迅猛异常,特别是电子、信息、生物工程、新材料、新能源等高新技术领域已经出现或正在孕育重大突破,将给人类社会经济各个方面以极为广泛和深刻的影响;三是世界范围经济贸易和资金、技术流动加快,各国经济和市场将进一步相互开放、依存和融合。可以预见,国际间经济、科技竞争将更加激烈,商战将空前尖锐。市场竞争的法则,不仅是数量的较量,更是科技、质量、效率和效益的较量。在这种世界大趋势下,对我们来说,不改变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一个企业乃至整个国家就很难在越来越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站稳脚跟。

我国的经济发展现在已到了一个新转折点,一方面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和面临的任务、形势迫切要求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另一方面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条件也已初步形成并正在成熟。

经过 40 多年的建设,我国已建成庞大的国民经济体系和工业体系。国有资产已达到 5 万亿元,建成投产大中型项目 5097 个,

小型项目超过 100 万个,到 1994 年底,我国国有企业已达到 215.2 万户。经济总规模相当可观,主要农产品、水泥等产量居世界第一位,钢产量居世界第二位,能源生产总量居世界第三位,发电量居世界第四位。我国已有一支宏大的科技队伍,改革开放以来又引进了几万项先进技术。这些都为加快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提供了雄厚的物质技术基础。同时,由于改革不断推进,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取得了重大进展,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创造了必要的体制环境和条件。

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关键

长期以来,我国一直实行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除因我国经济处在较低的发展阶段外,更重要的原因是我国实行的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投资决策在政府,投资主体实质上是各级政府,企业缺乏投资自主权和风险约束机制,加之在干部考核制度上偏重于看经济增长速度,忽视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在这样的机制下,经济增长必然走高投入、高速度、低效益、高膨胀的路子。

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与传统经济体制的必然联系还可以从原苏联找到佐证。早在 60 年代,原苏联的许多经济学家就提出要实行集约化增长方式,政府也曾提出要向集约化增长方式转变,但是,由于缺乏市场机制,转变没有成为现实。到 80 年代末原苏联解体前夕,虽然钢产量已达到 1.6 亿吨、石油 5.2 亿吨,并且拥有庞大的国防工业和发达的航天技术,但是,经济效益低下,市场商品匮乏,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缺乏竞争能力。

早在 80 年代初,我国经济学界在总结前 30 年经济建设经验教训时,就提出了扩大再生产要从以外延扩大再生产为主转向以内含扩大再生产为主,实现经济发展战略的转变。党的十二大、十三大和十四大都强调要以经济效益为中心,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然而,总的来看,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并没有实质性进展,甚至在某些行业或领域,粗放经营的发展势头还相当突出,说到

底,问题的关键是经济体制没有转换,政企没有科学、合理地分开。比如现在投资的主要推动者和责任方,依然是政府而不是企业。政府只管投资,实际上很少问津回报率和回收率,以致不少项目投产之日即亏损之时。可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关键是转变经济体制,我们必须围绕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加快改革的步伐。

1. 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要靠企业来实施,我国经济增长方式长期不能转换的重要原因是国有企业的效益太差。国家每年把固定资产投资和流动资金贷款的70%以上投到国有企业,而国有企业实现的GNP的增量在全部GNP的增量中不足20%。所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首先要抓住国有企业这个牛鼻子。我们要围绕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目标,通过建立产权清晰、权责明确的企业财产组织制度,彻底转换经营机制,实现经济的高效运转。国有企业应按自身特点和公司法要求,改建成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股份合作公司等现代企业的组织形式,或采取租赁经营形式,从产权关系上解决企业经营机制不活、责任不明的问题。

2. 加快投资管理体制改革。要尽快实现固定资产投资按不同性质产业分类管理的办法,即公益性企事业的投资,继续实行由财政拨款,由各级政府根据财力大小进行投资;基础性产业的投资,实行企业自筹与国家政策性贷款相结合的办法,国家可以采取控股、参股的形式;竞争性产业,企业是投资主体,企业根据自筹资金的能力和银行商业性贷款的可能自主决策。要建立投资的激励和风险约束机制,实行“谁投资,谁决策,谁受益,谁承担风险”的原则。通过建立科学投资决策制度,坚决改变领导个人决定投资项目,违背科学决策程序的现象。对于国家支持的重点建设项目和重大科研项目,要采取透明的、公开招标的形式确定项目投资者。政府财政资金和政策性贷款的运用,应采取计划合同的形式,规定企业应承担的义务和责任,并进行严格考核。总之,要按市场经济规律办事,提高投资效益。

3. 加快金融体制改革。力争利率市场化的改革目标尽快到位,使利率正确反映市场供需状况,成为资源优化配置的指示器。积极培育金融市场,开辟渠道使居民储蓄存款的一部分转化为对企业的直接投资,以减轻银行承担的贷款风险。赋予更多的企业在国内外市场直接融资的权力,创造资本在国内跨地区、跨行业流动的条件,使先进企业能够得到充分发展所需要的足够资金。

4. 改革干部考核制度。改变以产值多少,以经济增长速度快慢作为评判干部政绩优劣的标准,应当把经济效益、经济增长的质量、国民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发展,作为考核干部的标准。

三、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途径

造成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的直接原因是经济效益低下,因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就要从提高经济效益入手。提高经济效益的方式很多,当前的重点就是《建议》中提出的四个“向”,即向结构要效益,向规模要效益,向科学技术要效益,向科学管理要效益。

1. 向结构要效益。世界工业化、现代化的历史,就是产业结构随着技术革命不断优化、升级的历史。随着科技进步,必然不断推出新产品、新行业、新产业,这是经济增长的强大推动力。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必然带来整体经济效益的提高。我国正处在工业化、现代化的重要历史阶段,调整产业结构面临繁重的任务;既要在现有基础使产业趋向合理,又要适应世界上新的技术革命和发达国家产业重组、升级的形势,使我国产业结构朝着现代化、高级化的方向发展。目前,使我国经济效益低下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经济结构尤其是产业结构扭曲。产业结构的同构化,地区间经济结构的趋同化,导致了企业结构小型化、生产劳动密集化、技术集约的低度化。结果造成资源严重浪费,难以实现成本最低、产出效用最优和价值最大。为了提高经济运行效益,首先要扩大对基础产业投资,尽快消除基础产业对经济快速增长的瓶颈制约。在大力发展基础产业的同时,优先发展重化工业,通过这些产业推动相关产业的技术结构、产品结构、设备结

构、劳动力结构的全面调整与优化。特别要注意的是,下一世纪的经济竞争在于科技产业的竞争,高等教育作为科技产业的基础部门应超前发展,这样做的目的在于,在下一个世纪教育不致成为经济发展的新瓶颈。

2. 向规模要效益。规模经济是现代市场经济中获得经济效益的基本手段之一。因为有了相当的规模,才便于利用先进技术,才能有名气,才能有较高的市场占有率。而我国目前有65%左右的企业没有达到规模经济水平。最典型的例子是我国拥有汽车企业数量超过发达国家汽车企业总和,却不到日本国一家企业的汽车的年产量。到目前为止我国仍没有一家轿车企业达到国际公认为规模生产标准和要求。要改变这种状况,就要建立一批技工贸一体化的企业集团,实施大企业集团战略。当代国际资本和技术的流动,主要是在跨国公司之间进行。我国要更好地利用外资,搞好同跨国公司的合作,必须建立自己的大型企业集团。通过他们与国外的跨国公司进行合资、合作生产、合作设计、合作进行技术开发等,提高我国企业的技术和管理水平。目前,在国际上排名前100位的工业企业中,中国还没有一个。要把培育企业集团作为一项重大发展战略来付诸实施。近期内国家要重点扶持在电子、机械、汽车、石油化工、造船等方面具有经济规模的骨干企业的发展。

3. 向科学技术要效益。“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是邓小平同志针对我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作出的英明论断。依靠科学技术促进国民经济增长是历史的必然选择。但是,由于我国科技与经济结合还没有达到相当的紧密度,科技成果转化率低,科技在经济增长中的含量不大,即使是科技与经济结合比较好的上海,根据最新统计,其科技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率虽然达到33%,但同发达国家的50%以上的贡献率相比,还有不小的差距。我国一些企业效益差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技术落后。根据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对2102家亏损企业的调查,由于设备老化,工艺落后,造成产品滞销而造成企业亏损的企业有1307家,占

被调查总数的62.17%。我国工农业生产的技术水平,在两个方面都存在着较大差距:一是从总体上同经济发达国家的水平存在着较大差距;二是在国内同一行业中,先进企业和落后企业在技术水平上存在较大差距。由此可见,通过技术进步推动经济增长的潜力巨大。首先,要通过市场竞争机制的作用和政府的组织和推广,使国内已有的先进技术在生产中得到普遍应用,淘汰落后技术。其次,继续大规模地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同时加强对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和创新,形成独立自主的技术开发能力。在硬件和软件的引进上,要更重视对软件的引进。在引进和消化上,要更重视消化。第三,努力使企业成为技术进步和科技投入的主体,加快建立市场、科研、试验和生产结合的企业技术进步机制。鼓励科研机构进入大型企业集团,改变计划体制下所形成的科研与生产“两张皮”的传统体制。在科研资金和科技力量的分布上,逐步加大企业的比重,做到象发达国家那样,把2/3以上的科研资金和科研人才配置到企业。第四,国家集中财力、人力,重点解决工农业生产中的共性技术和关键技术,特别是能够带动产业素质提高和结构升级的重大技术。

4. 向管理要效益。管理落后无论是在微观经济中还是在宏观经济中都是一个十分突出的问题,提高管理水平对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在这方面,不需要增加多少资金和物质的投入就能取得可观的效益。我们的许多企业就是由于经营管理不善而亏损的。据国家计委技术经济研究所对2102家亏损企业的调查,属于企业经营管理不善致亏的企业就达697家,占33.1%。在这些企业中,劳动无定额,物耗无核算,质量无检验,资金、设备、人力资源利用率极低,浪费严重。为了从管理要效益,就微观管理来说,不仅要有严格的制度、标准和核算,科学的定额,更重要的是要建立对企业管理者的激励和约束机制。方法之一是,对经理层人员,可借鉴西方市场经济发达国家的惯例,实行年薪制。经理人员的工薪,不是同职工的工薪相联系,而是同他

们的经营业绩挂钩。年薪包括底薪和风险收入。如果公司由于经营管理不善,工作失误造成亏损,则经理人员不仅不能获得风险收入,而且还要对底薪按一定比例扣减。这种约束实际上是一种财产约束。只有触动个人收入和财产,才会发挥约束的效力。就宏观管理来说,重点是要保持经济稳定、优化产业结构,尽快解决某些产业对经济发展的瓶颈制约。对长线部门要通过资产存量结构的调整,加快生产要素向短线部门的转移。同时,要为强化微观经济的管理提供完善的法律法规和宏观经济环境。积极培育全要素的市场体系,促进资本、劳动力的合理流动,真正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

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标志

经济增长是社会物质财富的增长,它不仅包括数量的增加,而且包括质量的提高。我们认为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增长的标志,就是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可以从不同的角度界定:如果引入时间的因素,就是持久的、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如果引入劳动与资本等投入因素,就是用最少投放、最小代价取得最多的商品与劳务的经济增长;如果引入结构因素,就是在结构优化、经济规模合理条件下实现的经济增长;要是引入目的因素,就是能给社会成员带来更优的商品与服务,带来生活质量的提高和生活环境改善的经济增长。

因此,作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标志的经济增长质量提高应包括五个方面的内容:

1. 低通货膨胀的经济增长,即在保持社会总需求与社会总供给基本平衡条件下实现经济增长。这样既充分发挥资源和生产潜力,又不造成需求过度扩张。1983~1994年,我国GDP年均增长率为10.22%,零售物价上涨率年均均为8.2%,两者之比为1:0.8;日本1957~1970年GDP增长率年均均为9.9%,消费物价上涨率仅为4.6%,两者之比为1:0.46。日本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之所以能保持较低的通胀率,就是因为其经济增长方式是集约型的。只有实现低通货膨胀的经济增长,才能避免经济增长的大起大落,实现持续的快速增长。

22 / 学术研究 1996 年第一期

2. 投入结构优化的经济增长,即生产同量产品(国民生产总值)的总投入中,劳动、资本等要素投入的贡献率缩小,技术进步的贡献率提高。我国改革开放以来,资本要素投入增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61.6%,比发达国家高得多,如日本为23.8%(1953~1971年),美国为19.7%(1948~1969年),西德为22.5%(1950~1962年)。科学技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是30%左右,比发达国家却低得多,如日本为55%,西德为55.6%。我们认为只有科技的贡献率达到50%以上,才算是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只有实现投入结构优化的经济增长,才能用最小的代价实现经济增长,才是适合我国国情的经济增长。

3. 结构趋向合理、优化和升级的经济增长。一个国家产业结构在世界产业结构进化的等级系列中所处的阶段及其调整、升级的步伐,是其经济增长质量高低的重要标志。只有结构趋向合理、优化的经济增长,才能加快工业化、现代化的步伐,才能适应国内消费结构的需要,也才能在国际市场激烈竞争中占有较大的份额。

4. 商品和服务质量不断提高的经济增长。经济增长不仅要生产出数量多、品种新的产品,而且要提供更新更好的商品和服务,改善和丰富人民生活,只有这样的增长才是合乎目的的、有社会效益的增长,也只有这样才能反过来促进增长,形成良性循环。

5. 保护资源和环境的经济增长。许多资源不能再生,自然环境一旦破坏就很难恢复。破坏资源和环境的经济增长是不可能持久的。

6. 生产效率提高的经济增长,即在经济增长中,生产同量产品(国民生产总值)的投入(劳动、资本和各种物质)不断减少。只有这样,在经济增长中才能不断降低成本,提高企业和整个社会的效益。

作者单位:广东省体改委宏观处
广州社科院软科学所
责任编辑:谭湛明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和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市场作为联结宏观政策与微观活动的媒介有着重大的作用。理论与实践已经表明,市场的发育具有很强的区域特征,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和完善不可能跨越区域市场这一阶段,区域市场作为社会化大生产的客观要求,始终是全国统一市场的基础和组成部分。在全国统一市场短时期内不可能形成的情况下,发育区域市场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关于区域市场的概念,目前存在着许多分歧,不同的分歧也就产生不同的概念。由于分歧的不同点,便产生了不同的概念内涵和概念提法。目前,至少有如下几种提法:“区域共同市场”、“区域市场”、“地区市场”、“地方市场”和“地域市场”等。

为了正确界定区域市场的内涵,有必要首先从理论高度来阐明区域市场产生的历史背景和深刻原因。

市场总是与分工联系在一起。正如列宁所说,市场不过是商品经济中社会分工的表现,因而它也象分工一样能够无止境地发展。然而,区域市场并不是同市场同时产生的,它是同区域分工的发展相联系的。市场在资本主义以前即封建社会已

经存在,但此时还谈不上区域分工,因而也就没有区域市场。如马克思所说:资本主义以前的交换是有限的,市场是狭小的,生产方式是稳定的,地方和外界是隔绝的。列宁也说:“资本主义以前的农村是(从经济方面看)地方小市场的网,地方小市场把各类极少的小生产者联结起来,……”(《列宁

全集》第3卷第340页)正是因为这些地方小市场是当地内部“有无相通”、“长短互补”的市场,处于与外界隔绝的状态,所以还谈不上地区内部分工,更谈不上地区间的

分工。在这种情况下,“各个经济单位能存在好几世纪,无论在性质上或者在数量上都没有变化,而且也不超出……小集市的界限。”(《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列宁全集》第3卷第45页)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农业与手工业、商业的分工,一些集市发展为专业的工商市镇,成为围绕乡村的交换中心。这就突破了地方小集市而在农业与手工业、商业分工的基础上,把当地的经济融合在一起,从而开始了区域市场形成的进程。这个阶段市场的发育比之过去显然明显加快了,但仍然是渐进的。“这种转变之所以是一步一步加强的,还因为产品的销售市场最初十分狭窄,致使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距离增长得很慢,产品仍象以前一样直接从生产者手中转入消费者手中,而且在出售产品以前,有时候先把产品与农产品进行交换。”(《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列宁全集》第3卷第296页)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使商品生产的规模大大扩大了。商品生产规模的扩大,突破了当地市场的局限,同时生

产要素的取得,也不能从当地市场上完全解决,市场的空间就冲破了当地市场的局限而扩及毗邻地区,进而是远方市场。因而马克思认为,商品生产规模越小,“它的销售市场就越带有地方性质。”(《资本论》第2卷第145页)由于生产力的发展,社会分工的深入,商品生产规模的扩大,“就产生了同

区域市场与全国统一市场

○蒋清海

附近地区以外的地区建立贸易联系的可能”，由近而远，并且远方市场在商品销售和采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越占优势，以至于能够以远方的市场代替当地的市场。这就有了地区分工，使不同空间范围内的不同部门的生产彼此建立一种相互依赖、相互依存的关系，从而出现了区域贸易和区域市场。

随着区域分工的深化，区域市场也不断发展。区域市场的发展必然形成全国统一市场。全国统一市场是建立在国内各地区生产社会化的基础上，即社会分工使国内各地区、各区域的经济彼此互相依赖，商品联系密切以致能够融合成全国性的社会化大生产所需要的市场。列宁说：全国统一市场是国内一切区域“在事实上融合成一个整体”的市场。这个市场是由各个区域间日益频繁的交流，由逐渐增长的商品流通，由各个不大的地方市场集中成一个全国的统一的市场。

生产力的发展是无止境的。随着产业革命和新技术革命的蓬勃发展，生产规模越来越大，社会分工越来越深化，这就要求有无比宽广的销路和巨大的生产要素供给。这远不是区域市场所能满足的。正如马克思所说：“生产越多样化，劳动具体形式越多样地表现在各种商品上，**交换领域**，从而实际上商品的市场也就越宽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9卷第310页）于是，市场的空间就大大扩大，首先是发展成为本国统一市场，进而是世界市场。

上述的历史分析表明，区域市场是商品经济发展到资本主义阶段的必然结果，具体地说，是社会化大生产内在矛盾的结果。社会化大生产是规模大、范围广、节奏快、效益高的现代生产方式，它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分工专业化趋向日益增强。分工专业化表现为相互关系的两种形式：一是部门分工专业化；二是区域分工专业化。这里我们仅讨论与本主题有关的区域分工专业化。区域分工专业化一方面推动了专业化区域的不断产生、分化和发展，大大提高社会劳动生产率；另一方面又促进了社会化大生产内在矛盾

的不断加深，导致了相互依赖的双重后果。一方面，区域分工专业化意味着每一个区域的产品越加具有单一化趋向，即它们只提供某种系列、某种类别甚至某种局部性产品，正如列宁所说：“各个地区专门生产某种产品，有时是某一类产品甚至是产品的某一部分。”（《列宁全集》第3卷第389页）另一方面，每一个区域为生产单一化产品，必须从越来越多的其他区域获取它们所需要的各种生产要素，即需求呈多样化趋向。生产单一化越是加强，需求多样化也就越明显。单一化与多样化的共生关系构成了社会化大生产中的一种内在矛盾。无论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性质和形式如何，只要是社会化大生产，各区域经济的发展便不能不受到这一矛盾的制约。同时，也正是基于这一内在矛盾，使社会化大生产同自然经济状态下的小生产存在着根本的区别，导致了区域间流通过程的产生和发展。由于在商品经济条件下社会化大生产采取商品生产的形式，因此区域间的流通过程就表现为区域市场。区域市场的形成使专业化区域间的相互依赖关系表现为对区域市场的依赖。因而区域市场就是专业化区域之间相互依赖关系的总和。专业化区域要分别向区域市场投入单一化的产品以供社会吸收，也要分别从区域市场中取得多样化的产品，以获取社会的供给。由于这种作用，区域市场便成为社会产品重新组合和聚散的经济循环系统和资源配置系统，成为区域间相互依赖关系的动态性载体。借助这一载体，社会化大生产和现代经济生活的内在矛盾得以相对解决。反之，如果区域市场遭受破坏，或者由于外力的阻碍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则相互依赖的链条便会中断，从而引起社会经济秩序的极度混乱，并最终影响到国民经济运行的全局。这就是区域市场产生和发展的深刻原因和重大意义。

从上述区域市场产生的历史背景和深刻原因的分析可以看出，区域市场应有如下几点明确的内涵：首先，在其性质上，区域市场不仅仅是商品交换的场所，而且是与区域分工相联系的市场空间组织形式，是市场

的空间表现形式,正如马克思所说,“**市场所包含的空间规定**”是“**流通领域在其现实中所固有的规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9卷第310页)

其次,分工决定市场,市场来源于分工。市场有一个外部的地理界限,市场的地理界限是指以一定的地理空间的范围作为供应和需求所形成的流通领域的界限。从区域市场的产生和发展来看,区域市场的动力来源是区域分工,区域市场是区域分工按照自身的规律不断发展和深化的结果。由于区域是一个相对的、具有层次性的概念,因此,只要一个区域内部更低层次的区域间存在着分工和正常、频繁、稳定的流通关系,那么就可以认为它是一个区域市场。因而区域市场界限的划定,既可以按经济区划来划分,也可以按行政区划来划分,只要其内部区域间存在着稳定的分工和交换关系。但无论是行政区域抑或是经济区域,空间范围大的市场都是包含空间范围小的市场,小市场总是隶属于大市场。从广义上说,世界市场、毗邻国家间市场、国家市场都是特殊的区域市场,但通常意义上的区域市场是指国内区域市场。

再次,区域市场具有要素完整性,它不仅仅是一个商品市场,而且是包括一切交换关系在内的市场体系。

最后,关于“区域共同市场”、“区域市场”、“地区市场”、“地方市场”和“地域市场”这些提法间的差别,我认为,只要在承认它们都是在区域分工的基础上产生的,那么这些提法之间就没有本质的区别,也正如区域分工有“地区分工”、“地域分工”、“区际分工”、“地理分工”等提法,但没有实质差别一样。一般来说,“地方市场”、“地域市场”的范围在人们的印象中似乎较小,而且与行政区相联系。“区域共同市场”、“区域市场”、“地区市场”间差别不大,但“区域市场”更为被人所接受,因而更通用。

据此,我们认为,区域市场是建立在区域分工基础上的以一定的区域单元为依托、以区域内中心城市为核心的市场空间组织形式。这里我们之所以强调以中心城市为核

心,是因为中心城市是区域经济发展的核心,是商品流通的焦点,其市场条件、市场环境 and 市场发育程度是最为发达的,在区域市场运行中起着导向作用。

区域市场与全国统一市场的关系问题,是区域市场理论中争议较多的问题之一。正如对区域市场的内涵有不同的看法一样,对全国统一市场的内涵也有不同的观点。事实上,对全国统一市场的内涵的不同理解也正是对区域市场与全国统一市场的关系的不同看法。具体地说,有如下几种观点:

(1) 排斥论。这种观点认为,我国的市场已是统一市场,没有必要发展区域市场。这种观点实质上是把全国统一市场与统一的全国市场两个概念混为一谈。全国统一市场是经济的范畴,是指国内市场的发育达到全国社会化大生产即全国各地经济在社会大分工的基础上能融为一体而统一的市场。而统一的全国市场是从政治出发来看待市场的。只要有统一的国家,有中央集权的政府,能够从政治上对全国市场进行统一的领导和管理,能够保证国家的统一和各地之间自由的贸易,就是统一的全国市场。历史上,全国统一市场只是到了资本主义工业化完成时才形成,而统一的全国市场则在国家产生时就已经出现。虽然统一的全国市场是全国统一市场形成的必要的外部条件,但两者之间有着截然不同的内涵。

(2) 对立论。这种观点把区域市场与全国统一市场对立起来,认为“建立地区市场、区域市场必然会伴随产生一定程度的地区商品封锁和垄断,从而也将激化区域之间的矛盾和贸易摩擦。”(《开发研究》1989年第1期)因而“市场的地方性分割已经成为形成社会主义统一市场的巨大障碍。”(《新短缺经济学》,求实出版社1989年版,第196页)

(3) 结构论。这种观点认为“区域市场是国内(统一)市场的基本组成部分”,“国内(统一)市场是各个区域市场的总合。”(《市场论》,大地出版社1989年版,第304页)“全国统一市场作为一个大系统,由各区域市场的子系统组合而成。”(《江西师范

大学学报》1989年第4期)“社会主义统一市场还可以从空间结构的角进行考察,而划分为全国市场、区域市场、地方市场与国外市场。”“全国市场、区域市场、地方市场是社会主义国内市场的三个不同层次。”(《新短缺经济学》,求实出版社1989年版,第206页)

(4) 并列论。这种观点把区域市场与全国统一市场并列起来,试图通过建立全国统一市场确保整体利益,通过区域市场协调区域利益。“在一定时期内设置两种市场,一种是全国性大市场,绝大多数商品在全国自由流通,不准搞地区封锁;一种是区域性的共同市场,由地区之间采取合同的形式进行互利互补的联合和交流,使地区之间通过商品等价交换来维护各自的合法利益。”(《经济改革新思考》,改革出版社1988年版,第46页)

(5) 递进论。这种观点认为地方市场、区域市场、全国统一市场是一个逐次发展的过程。“目前学术界流行一种观点即通过首先建立地区市场、区域市场,进而逐步建立全国统一市场。”(《开发研究》1989年第1期)“由单一的商品市场发展为多元的生产要素市场,由区域市场发展为统一市场等,又可称之为国民经济的市场化进程。”(《经济改革新思考》,改革出版社1988年版,第272页)“随着社会分工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则有地方小市场、地区市场、区域市场、国内统一市场乃至世界市场。”(《北京商学院学报》1994年第1期)

我们认为,从市场空间发展的历史看,区域市场与全国统一市场的确是一种递进关系,区域市场的发育和发展最后必将融合成为全国统一市场。从这个意义上说,区域市场与全国统一市场也就是一种结构关系,区域市场是全国统一市场的有机组成部分,但并非区域市场的简单加总就构成全国统

一市场,而且只有区域市场发育到覆盖全部国土时,区域市场的有机耦合才能形成全国统一市场。所以,排斥论、对立论和并列论都是错误的。

但必须指出,我们不能因为区域市场与全国统一市场的递进和结构关系,把区域市场看成仅仅是全国统一市场的过渡,从而忽视发育区域市场的重要性。由于区域市场是建立在区域分工的基础上的,因此,即使在全国统一市场形成后,区域市场也仍然存在。具体说来,这是因为:A. 全国统一市场形成后并没有因此而消灭区域分工,反而是区域分工更为发达,因而区域市场也就更为发育;B. 不同商品的流通都有其自身特有的规律,商品本身的特性、经济合理性原则、交换相对成本以及社会、民族、自然的特殊要求等因素决定着商品的流转边界和区域营销半径;C. 全国市场体系在空间上存在市场节点和市场域面,节点分布的疏密程度不同、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形成具有不同发育水平的市场区域,因而全国统一市场并不否定区域市场发育程度差异的存在;D. 全国统一市场本身正是区域市场有机耦合的表现和结果,区域市场体现出全国统一市场的空间结构特征,从而实现市场运行的空间有序化,因此,统一市场形成之后,区域市场依然存在。

总之,区域市场是区域分工规律作用的结果,它和全国统一市场的关系不是相互对立和相互排斥的关系,而是一种层次关系和相容关系。统一市场要以发达的区域市场为基础,区域市场体系的发育程度和形成状况在某种意义上决定着全国统一市场的发育程度和形成状况。虽然区域市场的功能远不如统一市场健全,但在统一市场尚不完全具备形成条件的情况下,它有着特殊的意义。

作者单位: 中国人民建设银行投资研究所
责任编辑: 郑英隆

论特区「第二次创业」

□ 郭 灿

一、深圳特区第二次创业的战略调整

“再用 15 年或者更长一点时间进行第二次创业，把深圳建设成为富裕、文明、民主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国际性城市，向全世界展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无限光明的前景。”这是深圳最近提出的新阶段奋斗目标。

“第二次创业”的提出，是对第一次创业成功的肯定。深圳的第一次创业从 1980 年建立特区到现在的短短 15 年，从一个边陲小镇发展为一个初步现代化并居全国前列的新兴城市，在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各方面具有比全国其他地区先行一步的明显优势。这主要表现在：经济保持快速、有效发展，具有较为雄厚的经济实力，1994 年国内生产总值达到 560 亿元，创下了年均递增

45.8% 的深圳速度，城市综合实力居全国第七位；城市功能日趋完善，它拥有较其他地区发达的海陆空立体交通网络、通讯网络；比全国先行一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框架，较好地发挥了中国改革“试验场”作用；形成了全方位开放新格局，与国际市场的联系日益紧密；还拥有毗邻港澳的区位优势 and 拥有全国唯一的海陆空口岸的地缘优势以及良好的华侨背景的人缘优势，此外还拥有吐纳各地移民的人才优势和地方立法权优势等等。“第一次创业”的成功为“第二次创业”提供了坚实基础和现实可能性。

“第二次创业”对“第一次创业”既是继承和延续，更是拓展和超越，在充分看到我们“第一次创业”已经形成的已有优势的前提下，也要充分认识特区所处的严峻的形势。这主要表现在：从外部环境看，在国际上，随着西方经济的复苏，国际资金投向开始向发达国家回流，加之周边国家和地区实行更加开放、更加优惠的政策，外资流向深圳的势头有趋弱的趋势，国内环境主要是前面分析的中国改革开放新格局对特区政策提出了新的挑战。从深圳内部情况看，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有待提高，国有企业的亏损面没有得到根本扭转；产业结构还不尽合理，产业规模小，档次偏低，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转型提高受到多层制约；城市规划、建设和管理水平离建设国际性城市的目标还有较大差距，几起严重事故，给国家和人民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社会治安形势严峻和某些政府部门工作腐败现象的滋生，正在恶化深圳的投资软环境和硬环境，从而导致外资内迁，招商吸引力下降；深圳的“第二次创业”面临任务是艰巨的。

针对深圳所处的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和自身发展中出现的问题，第一次创业时期要靠特殊政策推进发展的客观基础已不明显，因此要完全保持原有优势、原有特色不变，实际上已不可能。“第二次创业”应该根据现在形势的变化相应地发展出特区的新特色、新优势，这样，特区才能继续“特”下去。因此，“第二次创业”必须实施战略上调整。

深圳市政府提出了今后 5 年的基本任务是增创 10 大优势，这就是：增创产业新优势，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增创改革开放新优势，率先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增创基础设施建设新优势，实现城

市功能现代化；增创人才新优势，努力建设教育强市；增创依法治市新优势，营造良好的法制环境；增创横向经济联合新优势，强化辐射和服务内地功能；增创深港衔接新优势，为保持香港繁荣稳定发挥积极作用；增创管理新优势，全面提高城市管理水平；增创社会发展新优势，不断提高人民生活质量；增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新优势，全面提高人的综合素质。这10大新优势概括起来谈，实际上是要完成两大转变：一是要从过去的政策优势向增创整体素质优势转变；二是要从过去的经济优势向综合优势转变。

二、从政策优势向整体素质优势转变

完整表达应该是把特区发展从主要依靠优势政策转到在必要的特殊政策基础上依靠自身的创造和整体素质提高上来。

这一转变包含着这样三层思想。

第一，从政策优势向整体素质优势转变，特区的发展要从外在的政策依靠转变为内在的自身潜力发掘和创造。前10年深圳的发展主要是借助于中央所赋予的税收、土地使用、外汇管理、银行信贷、劳动用工、人员出入境管理等一系列优惠政策，得以超前于全国其他地区。刚出生的婴儿必须有“母乳”的喂养，待到一定时期必须“断乳”，使其自立。优惠政策逐步普惠化、政策优势逐步淡化，也就是一个逐步“断乳”的过程。特区必须在“断乳”之后靠发掘自身内在潜力、增强自身创造意识来获得“健康成长”，完成一个“抱着的孩子”自己站起来的过程，这就是提高整体素质的意义所在。

第二，从外在的政策依靠转变为内在素质追求，这是深圳成熟的标志。什么叫“整体素质”？主要是指经济素质和人的素质。

从经济素质看，首先是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水平，其中合理的产业结构、产品结构、企业结构是经济素质的因素，由此而决定经济发展水平；其次是经济体制，建立一个健全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框架和配套体系是经济素质的制度性因素；第三是经济运行机制，建立一个开放的、充满活力而又有序化的生产与流通、供给与需求等良性的经济运行机制是经济素质的重要因素。一句话，良好的整体经济素质是深圳经济真正成熟成熟的标志。

为了提高深圳经济的整体素质，应解决如下几方面问题：第一，在开放方面，要提高经济国际化的层次和水平。以“三来一

补”为典型的对外引资模式，虽然发展出了“两头在外”的外向型经济，但是这使我们在参与国际分工中处于垂直分工的劣势，档次低、规模小、外资来源单一（主要是港资），技术含量低，成为这种低层次的外向型经济的主要特点。同样，从跨国经营和出口商品结构看，跨国经营刚刚起步，缺少那种“船大好冲浪”的大型跨国企业集团和综合商社，出口商品中那种覆盖全球或地区性国际市场的名牌产品深圳也是凤毛麟角；转口贸易由于没有形成按国际惯例运作的口岸管理机制和发展滞后，实际上对香港的“分流”作用还未得到发挥。因此，深圳经济素质的提高，首先就体现为对外开放的层次和质量上，如何从低层次的外向型经济向高层次的经济国际化迈进，这是提高经济素质，建设国际性城市的关键一环。第二，在围绕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问题上的体制改革，面临的根本问题是从形式上的“改制”向实质性的“转制”转变，为全国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建立市场经济新体制提供经验，改制而不转制，实质上只是换了一块招牌，股份公司、有限责任公司都有了，但是国有企业是不是真正做到了产权明晰、政企分开、责权明确、管理科学？现代企业制度的试点由于各个利益集团的利益分割而使这些目标并未真正到位、流于形式？这是我们提出的体制改革中的“素质”要求。第三，在经济发展方面，面临着优化产业结构，提高产品质量和效益和加强现代化管理的艰巨任务。当前深圳的产业结构、产品结构离国际性城市标准还有相当距离，劳动密集产业依然是深圳经济的一支主力军，但在优化和转型过程中实际上存在两难：赶走“麻雀”，“凤凰”进不来；留住“麻雀”，档次上不去；同时，低层次的管理也导致资源的浪费和损失，因此，向管理要速度、要效益、要秩序，成为提高经济整体素质的题中应有之义。

第三，增创整体素质优势与必要的特殊政策的结合。我们提出“第二次创业”要转变到增创整体素质优势上来，并不意味着特区已没有或不再需要政策的优势，而是不仅要充分用足用好已有的优惠政策，同时还要根据特区改革开放进程发展的需要而向中央请求支持的新增的必要的特殊政策。我们认为，已经赋予特区的特殊政策，凡是在实践中证明是利于生产力发展而对全国没有负面影响的，应该允许特区继续执行；凡是

经过人大立法的,在法律未改变前,应允许特区继续保留。特区既然肩负特殊历史使命,必然要保留必要的特殊政策,以利于更好地提高整体素质,增创新优势。

三、从经济优势向增创综合优势转变

从建立特区开始,中央就明确建立的是“经济特区”,这一明确定位要求特区优先发展经济,与此同时,中央赋予特区的灵活的特殊优惠政策也基本限定在经济领域,因此,15年来深圳特区最大的成就仍然首先是经济成就,尽管在政府体制改革、精神文明建设等方面也取得了一定成就,但是压倒的优势仍然是经济优势,无论是年均增长40%以上的深圳速度,还是市场取向改革的超前试验,抑或初具规模的外向型经济,都显示着深圳在全国先行一步的经济优势。

但是在深圳走过了15年从初创奠基到基本成型、完善成型的几个时期进入新的历史阶段时,经济本身的发展已很难靠单向突进而再上新台阶,经济与社会、文化的结合,经济、社会、文化的协调“发展”将更有利于经济本身的“增长”,单向的经济优势将面临着向综合优势转变,经济的整体素质的提高将有赖于人的综合素质的提高。

从增创经济优势到增创综合优势的转变,既是对世界经济发展大趋势的积极回应,也是在对深圳特区经济发展的积极反省基础上提出来的。

二次世界大战后,一批国家政治上独立后,相继走上以工业化和城市化为主要内容的现代化发展道路。在此过程中,由于对现代化的误解,一些国家和地区片面追求经济增长速度 and 经济效益,结果伴随经济的增长,出现了诸如环境遭到严重污染、资源被滥用浪费、贫富两极分化、社会道德沦落、社会治安恶化等一系列经济和社会问题。这一切促使有识之士认识到经济增长并不是发展的全部意蕴,也不是现代化的全部目标所在,发展应是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并进,而不是经济增长的孤军独进,发展与现代化的目标应为人全面发展提供条件和环境,而不应是片面追求经济速度,因此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的发展学成为显学。与此同时,经济本身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课题,那就是经济结构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向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转变时,高附加值的产品取代低附加值产品,而产品的附加值高低,将取决于它的

科技、文化含量,包括产品设计、包装和商标等等,都蕴含着文化含量,因此,有专家预测,20世纪后的经济竞争,将是科技与文化的竞争。这就提出了经济本身的发展将取决于经济与科技和文化的结合问题。

事实上,深圳经济的发展正面临着从第一次创业的外延式发展向内涵式发展转变,面临着从劳动密集型向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转变,支撑深圳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两百万打工者恰恰是文化技术素质低下的外来民工,人的素质问题日益凸现出来,与此同时,经济发展过程中,由于配套的社会系统和管理滞后,导致社会治安、各种严重事故以及精神领域中的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以及腐败现象等等,都恶化着深圳经济社会环境,同时使深圳经济本身的发展也举步维艰。

因此,增创综合优势要改变过去那种片面追求投资规模的扩大和经济增长速度的加快,要从如下几个方面增创综合优势:

第一,经济的发展、经济素质的提高要把人的全面发展结合起来,要全面开发人力资源,提高对百万临工的道德素质训练和技术素质训练,以高素质、高技术人才推进经济素质的提高。

第二,经济与社会的良性互动与协调发展,现代化建设不仅要有经济的指标,而且要有社会全面发展的指标,并从根本上保证这些指标的实现。

第三,经济要与科技和文化结合,科技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第一生产力,文化将为经济提供精神动力和价值系统,是经济健康发展的精神保证。因此,一手抓物质文明建设,一手抓精神文明的“两手硬”政策是我们增创综合优势的根本内容。

第四,要把经济发展和资源环境和生态保护结合起来。深圳是一个资源匮乏的城市,水电资源就成为制约发展的瓶颈,大量的加工工业排出的废水、有毒气体侵蚀和污染着我们的环境,因此,我们要充分认识到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协调配合是实现社会经济持续稳定的必要前提,认识到只有保持和维护生态系统的平衡,才能使经济发展进入良性循环并取得持久的效益。否则,将会遭到大自然的严厉惩罚。

作者单位:深圳市社会科学研究中心
责任编辑:谭湛明

广东工业企业技术进步的问题与对策

□关则文 黄菊勋 谢鹏飞

工业在国民经济中占主导地位。工业企业的技术装备和生产工艺标志着工业自身的发展水平。工业企业技术进步状况如何,不仅直接关系到企业的生死存亡,而且影响着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广东的工业企业经过改革开放十多年来的连续建设和改造,综合实力和整体技术工艺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是,随着国际上新一轮技术革命浪潮汹涌澎湃地推进,国内“九五”计划的实施,经济增长方式由速度型向效益型转变,广东工业企业的技术进步正面临严峻的挑战,处于十分关键的发展关头。客观而理智地分析广东工业企业技术进步面临的问题和困难,进而提出并实施切合实际而又富于创见的发展思路和对策,对于实现广东国民经济发展战略、发展模式的转变,推动全省经济、技术上新的水平,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当前广东省企业技术进步存在的主要问题

1. 企业缺乏技术进步的内在动力,追求技术进步的积极性不高

一是承包制的缺陷所形成的短期利益驱动机制对企业技术进步缺乏足够的推动力。经营者在有限的任期内,其目标取值和行为动力主要是完成上缴利税指标,使职工的收入水平和福利待遇得到保证。企业技术进步,是一个比较长时期才能体现效益的过程,当其投资需要与企业追求当前急功近利的生产经营活动相矛盾时,就必然被冷置。在承包制条件下,企业大多不愿为追求长期

利益而冒风险,因而缺乏追求技术进步的内在动力。

二是企业普遍留利不足使其难以成为技术进步的投资真实主体,企业缺乏技术进步的行为能力。企业没有钱,即使有强烈的投资冲动和欲望也不能实现投资。企业主要以留利形式积累,可是最终留利仅约占实现利税的10%左右。近两年来,由于宏观环境偏紧及各种因素影响,经济发展速度减慢,企业经济效益滑坡,税改后大多税负有所加重,企业亏损现象日益严重,企业留利状况日渐恶化。据统计,1994年全省国有独立核算工业企业亏损额比上年增长54.7%,利润总额比上年下降27.8%。这种状况,使企业在应付发放职工工资、奖金之余,实在无力自筹资金搞技术改造和新产品开发。即使能筹到资金,还贷能力也有限,甚至可能变成新的包袱。

三是技术进步本身成本高、风险大,使企业望而却步。企业技术进步的资金来源,除国家及省专项贷款外,就是靠自筹资金。如1994年全省技改资金企业自筹占53.2%。这些资金真正从企业自有资金中拿出来的并不多,实际上是企业靠集资或通过金融机构拆借来的,利率很高,一般年息为20%左右,高的至30%。另外,相当部分企业税负增加,特别是税前还贷被取消;新产品减免税削减;汇率并轨,关税税基增大,进口减免税减少,据有关部门测算,与前几年比,引进同一部设备,支出需增加80%至一倍。加上原材料、运输、电力等费用升价等,技术进步本身的成本变得甚高,企业难

以承受。企业追求技术进步的全部风险都要自己承担,成功了,在利益分配上是先国家后企业;失败了,则包袱全部由企业背。因而,企业不愿去冒风险。

四是缺乏勇于创新的现代企业家,使企业技术进步缺乏主体开拓力。现代著名经济学家熊彼特认为,技术创新是由企业家来实现的。技术创新是企业家精神的集中体现。企业技术进步的主体推进力、开拓力往往来源于敢于创新、开拓进取的现代企业家。由于体制的制约,当前工业企业的管理者,相当部分创新意识不强,缺乏长远打算,这也是企业技术进步缺乏内在核心动力的原因之一。

2. 技术资源不足,转化机制不灵

广东省原本科技力量薄弱,科技人才不足,近年来,科研机构从事科技活动人员又逐年下降,且减幅增大。1994年科技活动人员及其中的科学家、工程师分别比上年减少2665人和1192人。其中承担主要为经济发展提供技术储备的基础研究人员及其中的科学家、工程师分别减少2093人和1183人,分别占减少总数的78.5%和99.2%。这种状况严重制约着全省的科技发展,对企业的技术进步也影响甚大。

广东省科技基础设施水平不高,企业的科技基础设施又处于全省的低水平,与全国相比差距更大。如微电子控制的生产设备原值在全国29个省市中仅排第18位。全省的科技成果尤其是高水平的可供转化的成果不多,企业在其中占的份额就更少。1994年全省大中型工业企业获奖成果数比上年减少15%,其中获国家级奖励的减少37%。全省的专利申请中,发明专利仅占11.9%,比全国平均水平低5.3个百分点。企业的平均专利申请数在全国排第17位。而国有大中型企业的专利申请数又最少,有些企业十多年未申请过1件专利。

科研成果的转化机制不灵,转化率较低。广东的技术市场发育较早,但作为一个市场体系尚处于起步阶段。常设技术市场效果不理想,技术成果评估还没有一套可行、规范的法规。技术中介机构不少,但规模小,

功能单一,信息网络不健全,中介作用有限。据对近年来技术交易数据分析,超过2/3的成果转化是由技术拥有者和受让者双方直接自行联系洽谈,在“无形市场”中交易的,常设的“有形市场”难以在成果转化中充分发挥作用。同时,技术交易中利益分配机制不健全,技术交易和技术合同纠纷时有发生,阻碍成果的转化。专利保护的法规和执法机制不健全。此外,成果转化中的风险分担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很好解决。如中试阶段的技术开发一直十分薄弱,需要大量的资金、人才投入和配套设施,科研单位和企业都不愿积极投入,政府支持又有限,未能建立起有效的风险担保机制,因而不仅使一些风险大、产业化前景良好的科技成果难以转化,而且相当一部分小试成果也由于缺乏中试开发和工业性试验而未能迅速应用到生产上。

3. 技术依托不牢,创新能力薄弱

近年来,广东省大多数大中型工业企业没有技术开发机构,有技术开发机构的仅占大中型工业企业总数的31%—42%,大大低于全国51%的平均水平,在全国29个省、区、直辖市中排在24位以后。1994年,全省1586家大中型工业企业中,没有建立技术开发机构的达1017家,占64.1%,分别比上海、辽宁、四川、河北高出12.8、8.5、22.9、29.5个百分点;没有开展技术开发活动的992家,占62.5%。目前,全省仍有48.5%的工业企业没有技术开发人员,50.8%的企业全年没有支出任何技术开发经费,6.1%的开发机构全年未开发任何项目。技术开发机构发展滞后,使企业技术进步缺乏强有力的技术支撑。

企业自身的技术支撑弱化,与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的合作也不尽人意。由于传统的科技运行机制还没有完成转换,科研单位与生产企业分离,科技开发活动与企业生产经营活动脱节,科技开发机构与生产企业间的协作、联合障碍甚多,困难重重。产学研合作起步晚,拓展缓慢,1994年全省计划实施产学研联合开发工程项目仅10项。

技术创新能力薄弱。广东工业企业技术

开发的专业技术力量严重不足。多年来全省大中型工业企业技术开发人员占职工总数的比例一直在2%左右徘徊,占全国大中型工业企业技术开发人员总数不到4%,仅相当于辽宁的1/4,四川省的1/3。技术开发人员的素质也不高。技术开发机构中的工程师仅占企业技术开发人员的20.6%。实际投入技术开发的人力又很少,全省大中型工业企业技术开发机构平均投入技术开发人员不到50人,比全国平均水平少一半,平均每个课题投入人力仅7人。开发的成果不仅数量少,水平也较低,每100万元技术开发经费内部支出额平均完成达到国际80、90年代水平的项数仅0.39项,居于全国的17位以后。另一方面,多年来广东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创新工作的组织、协调、协作、攻关无力。全省没有一个权威的组织协调机构,没有从技术引进到消化吸收创新的总体规划,基本没有组织过有明确针对性的大型重大关键技术协作攻关,对引进技术与自主开发的衔接也缺乏指导,有些虽然立项了,也少有部门去具体抓落实。因此技术创新基本上处于放任自流的状态。能形成属于自己知识产权的创新成果几乎是空白。如技术引进密集的佛山市,255个引进项目通过消化、创新实现国产化的仅6个,占2.4%。

4. 政府支持力度弱,投资安排不合理

企业技术进步应以企业为主体,但政府必须给予必要的引导和支持。近年来广东地方财政对企业技术进步投入的支持甚弱。1994年全省大中型工业企业技术开发经费内部支出额20.1亿元,其中政府拨款额0.41亿元,仅占2%。过去,广东曾为技改投入大而自豪,政府大力支持促成了大批项目上马,但是随着“三热”(股票、房地产、开发区)升温,全省技改投资急剧下跌。1994年全省完成技改投资233.21亿元,增长18.81%,为“八五”以来最低点,比1992年增幅下跌52.9个百分点,比全国的平均增幅低11个百分点。比上海(34.7%)低15.9个百分点,比山东(27.3%)低8.5个百分点,比江苏(45.6%)低26.8个百分点,仅高于海南、西藏、青海、新疆,全国

倒数第五。如果剔除中央项目,地方项目增长更小,只增14.4%,新开工项目、在建项目、建成投产项目分别比上年同期减少25%、52%和34.88%。

更值得注意的是,投资结构不合理,真正能够用于工业的资金更少。1993年技改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比重仅18.99%,1994年15%。1993年技改增长分别比基建、房地产低16和44.2个百分点,1994年分别低17.6和41个百分点。而在技改投资内部,真正用于改造拳头产品和支柱行业的比重又明显偏低,杯水车薪。

5. 金融支持弱化,财税扶持不足

总的来说,金融界为科技用财、生财的新观念尚未牢固树立起来,银行信贷还未切实纳入统一的科技投入渠道。对于企业技术进步,近年来金融支持强度不够,银行贷款的比重下降,且资金到位甚低。1994年全省技改投资中银行贷款55.17亿元,仅占总额的26%,而同期基本建设和房地产的银行贷款则为技改贷款的2.1和1.25倍。列入国家重点技改专项贷款10亿元,资金到位率仅65%。有些市资金到位率仅30%。而江苏省列入国家重点技改专项贷款为36.5亿元,是广东的三倍多,资金到位率达94%。在全省大中型工业企业1994年的本年筹集资金总额中,银行专项贷款3.4亿元,比上年减少26.6%,占总额的比重仅15.8%。近年来银行用于企业技术开发的新增专项贷款指标仅1000万元,1994年全省重点企业技术开发计划贷款总额3.59亿元,总量比上年下降21.8%,资金到位率仅16.5%。此外,财政税收对企业技术进步的扶持也逐渐减弱。1994年,全省大中型工业企业新产品利税23.9亿元,比上年增加3.1亿元,增加14.3%,新产品减免税额1.04亿元,比上年减少1.09亿元,减少51.1%。对企业应退税款不少未按政策兑现,对应该重点支持的技术开发、技术改造项目财政给予税后返还甚少。

二、加速企业技术进步的对策

企业技术进步存在的问题,既有表层的问题,又有深层的原因;既有长期积累下来的问题,又有宏观环境变化、新的改革发展引发的新矛盾。因此,必须继续深化改革,及时调整发展思路,抓住关键环节,实施重点突破。

1. 重点抓好企业的技术改造,把扩大再生产的重点转到技术改造和技术创新上来

技术改造是依托现有企业的基础,利用技术开发和技术引进两个技术资源,对企业的技术、工艺、材料及装备进行改造。它以较少的增量资本促使企业存量资本的优化,合理地应用新技术,创造出高质量的新产品,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它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企业技术进步的成果,是内涵扩大再生产的主要方式。多年来,广东企业的扩大再生产主要靠铺新摊子,扩大建设规模,靠拼能源、原材料和劳动力消耗,追求产值、速度,结果是高投入、高消耗、低质量、低效益。我们不能再走这种只重速度、规模而轻质量、效益的路子了。必须坚决把扩大再生产的重点转到技术改造和技术创新上来,把经济发展建立在以提高质量效益和投资回报效益为主,同时适当注意速度效益和规模效益的基础上。

首先,要提高技术改造和新技术装备投资在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中的比重。广东基础设施欠帐太多,努力还帐和适当超前建设无疑是正确的,也是必要的,但工业技术改造和技术创新是新生产力的主要生长点,不能稍有忽视,顾此失彼。工业是国民经济的主要支柱,发展主要靠它,积累也主要靠它,不能因“筑巢引凤”而不“养鸡生蛋”,特别不应过多搞房地产开发挤占大量资金而影响工业投资。因此,要迅速扭转工业技术改造投资急剧下跌的趋势,加大技改投资规模,适当扩大技改投资在固定资产投资中的比重。从国际国内的经验和广东“六五”以来的实践看,每年技术改造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比重应保持在30%以上。

其次,要采取多种融资手段,支持企业技术改造。对于我国来说,在相当长的时间

内资金都是一种稀缺资源。必须动员多方力量,多渠道、多层次、多形式筹集资金,支持企业技术改造。省市地方财政要积极筹集、扩大技改专项资金,银行金融部门要加大技改专项贷款,企业在充分利用折旧、留利等自有资金的同时,要积极通过资产重组和产权多元化等多种渠道筹集资金。要积极引进外资,特别是争取外国政府、国际金融机构优惠贷款用于企业的技术改造。

再次,要按照“择优扶强”的原则,抓好重点企业的技术改造。要改变技术改造投资分散、重复的现象,把技术改造的主要对象转移到优势产业的重点企业上来。要选择一批大中型骨干企业(集团),运用我们所掌握的扶持措施和手段,对其进行持续跟踪改造,使之在全国同行中居于领先地位,并逐步接近当代世界先进水平,从而带动本行业技术水平的提高,形成产业优势和行业优势。

此外,要采取各种措施,尽可能减轻企业技术改造的负担和风险。如组建技改投资担保公司,为重点技改项目提供担保;对企业的技改投资实行适当财政补贴或贴息、税收减免或税收返还等。

2. 坚持高起点引进技术,强化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和创新

技术引进是国际技术转移(技术输出、技术引进)双向运动的一支,是推进技术进步的重要一环。积极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博采众长,为我所用,是促进企业技术升级的有效途径。这已为实践所证明,应作为企业技术进步的基本原则继续坚持。

技术引进必须坚持高起点。一是引进技术的水平档次要高,要坚决防止和克服低水平重复引进而造成的浪费。二是要重视优势产业主体技术的引进。三是要以引进专利、软件和必要的关键设备为主,实行有组织有计划的技工贸联合引进和骨干企业重点引进。引进重大成套设备硬件应同时引进许可证贸易等软件;引进专利、设备的同时要更加注重智力和专门人才的引进,这是更高层次的“引进”。这不仅可以保证已引进技术的顺利实施,而且有利于引进技术的消化创

新和未来更高层次的引进。要着眼于国际化生产需要,与国际的生产、工艺、质量标准接轨。五是重大项目及专利技术引进要坚持权威专家咨询论证,实施国际专利信息检索。

要采取各种形式,运用各种经济手段,推进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和创新。引进的技术一般都是成熟技术。这对于缩小与先进水平的差距,发挥后发优势,是十分必要的。但引进的技术不可能是最先进的技术。如果一味单靠技术引进,没有创新能力,就难以摆脱“等距离追赶”的被动落后局面,更难以在全国和在世界上先进的技术园地中占有一席之地。因此,要运用政府的调控手段,做好引进技术消化吸收创新的组织工作。建议由省、市经委牵头,会同科委、有关高校和科研院所,并协调各行业公司及企业集团,组织强有力的技术力量,进行消化吸收创新的联合攻关。要协调好各方的利益关系,反对引进单位对项目进行封锁,自己无能力消化引进技术又不许其他企业或研究机构参与联合利用消化创新。要允许承担重点创新项目的企业,按该项目销售额的一定比例提取资金,专项用于消化吸收。要推动消化吸收创新的技术成果扩散、转移,并实行有偿转让。

3. 围绕支柱产业、龙头企业和拳头产品,开展重大关键技术会战攻关

推进企业技术进步,必须改变以往那种产业方向不够明确,技术目标过于分散,四面出击、各自为战的状况,实施由粗放经营向集约经营的战略转移。在现代市场经济的激烈竞争大环境中,只有突出相对优势,才能真正形成自己的优势。因此,必须结合广东产业结构、产品结构和企业组织结构调整的需要,根据自身的实际和可能,按照“有所抓、有所不抓”的原则,实行有限目标,突出相对优势,集中重点突破。重点发展应以“优先和加速”为指导方针。没有重点就

没有政策,有重点才能有优势。

要根据20年基本实现现代化和“九五”期间工业发展的目标,围绕重点发展的支柱产业,如电子、计算机、信息等产业,汽车、机械(机电光一体化),重化、精细化工、轻纺、建筑、医药、环保等产业领域,选择若干重大建设项目和重点关键性、共性技术,组织全省技术攻关会战,推进支柱产业主体技术的升级换代。选择一批已具有一定规模、技术条件较好的优势行业的骨干企业或企业集团,优先装备,重点改造,形成行业龙头,把行业的技术水平提高到一个新的档次。实施名牌战略,集中力量培植和开发一批国内外知名度高、市场覆盖面广、技术含量高、质量效益好的名牌产品,取得产品的最佳品质、性能、价格优势,形成“广货”拳头,提高生产新产品的能力,带动产品结构的高级化。

4. 坚持以企业为主体,增强企业技术进步的内在能力

技术进步是企业的内功。推进企业技术进步,关键要增强企业的主体意识和内在能力。要把技术进步与企业转换机制有机结合起来,通过企业体制改革,把企业真正推向市场,增强企业在市场竞争中依靠技术进步的压力和动力。技术改造、技术开发与应用、新产品研制及其投资,都要以企业为责任主体。要建立正常的技术进步投入机制,每年从销售收入中提取一定比例资金用于技术开发。要建立相对稳定的技术依托,建立健全技术开发机构,大中型企业和企业集团应建立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并实行对外开放,多方吸纳人才,进行自主开发。要积极拓展与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的联合和合作,建立中试基地,实行产学研联合开发,增强自身的开发能力。

作者单位: 广东省委政策研究室
责任编辑: 谭湛明

让哲学成为时代发展的先导

——答友人问

□高齐云

同样清晰地看到这种规律性表现。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新唯物主义哲学的过程中，不仅一般地揭示了社会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更具体地认识了他们所处时代的社会物质生产方式的本质矛盾及其运动规律，把握了在它们制约下形成的历史发展的基本趋势和无产阶级变革社会的历史使命与根本条件，从而使新唯物主

义哲学既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又是自己时代发展的先导，开辟了实行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的新时代。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也清楚地显示，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哲学脱离了自己的时代，落后于自己的时代。

日前，与哲学界友人小聚，谈起哲学研究现状。众人所言，多虑目前研究工作深化艰难。就广东而言，原来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社会主义辩证法，以及近年来的邓小平哲学思想等研究领域，曾有所建树，亦面临着如何深化的问题。后来，《学术研究》杂志社冯达才先生热诚相约，请我就此写点文字。考虑再三，便将当时与大家所谈的一些东西，围绕如何使哲学成为时代发展的先导，整理成问答录形式，抛砖引玉，以期引来学术界同仁的进一步探讨。

问：哲学和时代的关系问题是你多年来研究、思考的问题，也是一个被人们广泛关注的问题，请问你近来是否有新的心得？

答：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也是如何发展哲学研究的带根本路向的问题。历来，很多哲学家以不同的方式思考过这个问题。马克思说过，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马克思的名言从根本的方面揭示了二者的关系，说明了真正的哲学是自己时代的产物，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和结晶。我对二者关系思考的重点主要是哲学在自己时代中的作用问题，确切地说是哲学对自己时代的能动作用的问题。哲学与时代的关系的这两个方面是紧密联系的，如果哲学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它必定成为自己时代发展的先导，前者是必要的前提，后者是必然的结果。

大家知道，在马克思、恩格斯之后，以列宁为代表的俄国布尔什维克和人民群众把社会主义由理论变为现实，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开辟了在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时代，列宁主义哲学在这里也发挥了先导作用。但是，在列宁逝世以后，成为苏联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斯大林，虽然领导完成了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基本实现国家的工业化与农业集体化，可是在哲学上未能真正掌握、推进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唯物主义辩证法，反而在思想、理论上陷于主观主义与形而上学。例如，在关于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矛盾，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特殊性，社会主义社会经济运行方式与机制，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上层建筑、思想意识形态之间的客观矛盾，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内部动力等一系列带根本性的新问题上，或者没有深入的思考，或者作出主观主义、形而上学的回答。直到斯大林逝世，这种状况并没有根本改变，而这一切又左右着苏联哲学。这样条件下形成的哲学观念，不仅不能成为自己时代发展的先导，而且给时代发展带来阻碍。从长远看来，这种哲学观念是苏联剧变与解体的历史原因之一。中

问：您所说的真正的哲学不仅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而且必须成为自己时代发展的先导，我理解，是否意在强调哲学对时代的能动作用？

答：其实，马克思、恩格斯也重视、论述了哲学对自己时代的能动作用的问题。如恩格斯阐述过，正像18世纪的法国一样，在19世纪的德国，哲学革命也作了政治革命的前导。马克思、恩格斯与此有关的全部论述，明确地阐述了哲学史上哲学与时代这种规律性关系。我们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史，

问：此话怎讲？

答：哲学脱离、落后于自己时代，也就是说哲学不能反映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其中关键的原因在于制约哲学命运的代表人物没有真正认识自己时代具体的社会基本矛盾，没有深刻了解自己时代历史发展的基本趋势和人民群众的根本要求，因而也就不能使哲学成为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和自己时代发展的先导。

问：您所说的真正的哲学不仅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而且必须成为自己时代发展的先导，我理解，是否意在强调哲学对时代的能动作用？

答：其实，马克思、恩格斯也重视、论述了哲学对自己时代的能动作用的问题。如恩格斯阐述过，正像18世纪的法国一样，在19世纪的德国，哲学革命也作了政治革命的前导。马克思、恩格斯与此有关的全部论述，明确地阐述了哲学史上哲学与时代这种规律性关系。我们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史，

国从1957年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在建设社会主义中的种种错误、挫折,也是与哲学理论上的失误有关的。

问:那么,怎样才能根本改变哲学脱离、落后自己时代的状况呢?

答:根本改变这种状况,取决于全社会的认识与努力,主要取决于制约哲学命运的代表人物的认识与努力。作为专业哲学工作者,应该努力从理论上探寻形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与改变的途径。从认识论的角度看来,我认为有两个重要的问题必须澄清。一是必须明确哲学是时代的产物,各个时代都应有自己的哲学,甚至同一时代的不同国家都有自己的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也是这样。可是,在相当长的时期里,主流的观念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始终在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两大块和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唯物史观四小块的框架中变化,忽视了不同时代、不同国家的特殊性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发展的作用。我通过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形态多样化的观点,就是为了正确地反映、说明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上述规律性特点。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各种具体形态,其本质(无产阶级解放和人类解放的精神武器)与根本原则(唯物辩证的原则)是一致的,而它们探讨的基本课题、阐述的中心内容、提炼的主要观点以及构成的逻辑框架都具有自己时代、民族、国家的特色。正确地了解、承认这种事实,就必须引导、鼓励人们冲破旧观念,致力建设作为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的哲学,真正地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

问:你的阐述或许使人进一步理解了你为什么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形态多样化的观点。那么,你认为必须澄清的第二个重要问题是什么呢?

答:就是必须明确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要功能,是对时代发展、社会前进发挥先导作用。长期以来形成的主流观念认为哲学的主要任务与作用在于,为领导人的著作做解说和为现行的路线、方针、政策作论证,完全忽视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时代发展的先导的功能。而忽视、取消这个主要功能,既束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的发展,也给时代发展造成消极影响。资本主义国家的学者能够拿出《第三次浪潮》、《大趋势》、《权力的转移》这类回答世界发展重大问题的著作(尽管其中的回答不一定都正确),而社会主义国家中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学者既未能拿出回答世界发展重大问题的著作,也未能拿出解答国际社会主义发展前途、命运的著作,这能看作是正常的吗?这不值得人们深

思吗?

问:看来,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长久的多方面的。你认为怎样才能有效地发挥马克思主义哲学对时代发展的先导作用?

答:我想首先要提倡、帮助哲学研究工作主要致力于探讨、解答关系时代发展、社会前进带根本性的重大课题,特别是鼓励、要求他们按照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革命的批判的精神去探讨、解答这些重大问题。我们开展社会主义辩证法的研究,就是设想较为系统地深入地去探讨、回答现实社会主义发展中的一些带规律性的问题。可是,由于主观条件和客观条件的制约,这方面的研究距设想还比较远。如中国的“文革”、东欧的剧变、苏联的解体,其复杂的经济、政治、思想等原因,应该允许、支持人们进行深入的探讨与系统的总结,用“阴谋论”、“外因论”等简单的道理去解释,不仅不能真正说明问题,而且对现实社会主义的发展有害。

问:哲学界近几年来加强了对邓小平哲学思想的研究,你是否认为,这将有助于进一步使哲学研究与时代现实更紧密的结合?

答:通过研究邓小平哲学理论,我获得了多方面的启示。从哲学方面看,邓小平理论有一个哲学思想基础,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具体说,贯穿的主线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结合邓小平理论深入探讨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实践所提出的深层次的哲学命题,无疑有助于我们从认识论和方法论的高度上把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邓小平理论的产生和形成正是顺应了现时代的需要和呼唤。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中国现时代精神的精华。邓小平理论所要回答、探讨、解决的基本问题是什么是社会主义即重新认识社会主义,以及落后国家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而这些基本的时代课题的回答首先需要科学的哲学思想的映照与引导,所以才产生了我国思想领域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提出与贯彻,从思想、理论上开辟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使哲学再一次发挥了时代发展的先导作用,也使邓小平的理论体系有了深厚的正确的哲学灵魂和基础。从另一方面看,也促进了哲学与时代现实的紧密结合,成为引导时代前进的理论指导和精神动力。

我认为深入总结历史经验教训,让哲学发挥时代发展的先导作用,一定有助于面临21世纪的中国哲学实现自己的历史任务。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哲学系
责任编辑:冯生

· 理 · 学 · 的 · 历 · 史 · 意 · 义 ·

□张岱年

理学亦称道学，是宋元明清时代占统治地位的哲学思想，创始于周敦颐、张载、程颢及程颐。北宋中期，张载讲学于关中，二程讲学于洛阳，都提出了自己的理论体系，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二程早年曾受学于周敦颐，后人追溯程学的来源，于是推崇周敦颐为理学的开创者。周、张、二程都以继承孔孟学说为己任。周敦颐论学云：“圣人之道，入乎耳，存乎心，蕴之为德行，行之为事业”。“道德高厚，教化无穷，实与天地参而四时同，其惟孔子乎！”张载自述为学要旨在于：“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程颢述其兄程颐的学术云：“知尽性至命必本于孝悌，穷神知化由通于礼乐；辨异端似是之非，开百代未明之惑”。这些论学之语，都揭示了理学的宗旨。理学一方面批判了释（佛教）老（道家）学说，一方面也反对汉唐训诂之学，而以《论语》、《周易》、《中庸》、《孟子》等古代儒家经典为依据，回答了释老所提出的问题，使儒学达到了更高的理论水平。

理学家吸取了佛学和道家的一些思想资料，但其基本精神是回到孔孟，为孔孟的伦理学说提供了本体论的基础。理学虽受到佛老的影响，而其根本宗旨与佛老不同。一些佞佛之士认为理学家是“阳儒阴释”，是不符合实际的。理学是以对于佛老的批判为基础的儒学，形成儒学的新形态。

《宋史》立“道学传”，但道学一词易与“道家之学”相混，仍以理学的名称为宜。理学受到尊崇之后，于是出现了一些言行不一致的假道学，于是理学为一些人所诟病。其实真正的理学家都是特重道德践履的，虽然未免迂阔而决非诈伪。宋元明清时代，有些理学家出任地方官吏，也都是清官，这是明显的历史事实。

理学被明清最高统治者所利用，作为维

护专制制度的工具，其实多数理学家并不赞同绝对王权。理学确实起了维护社会秩序的作用，于是有人认为理学是反动思潮，事实上理学是与当时社会的生产关系相适应的，当时并未产生新的生产关系，所以不能说理学是反动的。只有明代后期产生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理学才逐渐转为过时。

也有些论者认为理学是唯心主义的理论形态。这也不符合历史事实。理学之中，程（颐）朱（熹）学派宣扬唯理论，可以说是一种客观唯心主义；陆（九渊）、王（守仁）学派宣扬唯心论，可以说是一种主观唯心主义；但张载及其继承者王廷相、王夫之以“气”说明世界，乃是唯物主义哲学。应该承认，理学包括三派，其中唯物主义一派构成了近古时代的具有一定科学性的进步思想的传统。

理学在历史上曾起过重要作用，并且广泛流传到东亚地区，成为近古时代东亚地区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体系，所以是值得着重研究的。理学的许多概念范畴更需要正确理解。董玉整同志联合十几位青年学者编写《中国理学大辞典》，对于理学的学派、人物、命题、概念、著作、典故、遗址等门类的词目都予以诠释，这是一项有重要意义的工作，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继承将有重大的帮助。董玉整同志征求我的意见，于是略述理学的历史意义作为序言。

（按：本文系张岱年先生为《中国理学大辞典》所作的序言，《中国理学大辞典》共100万字，由广东省清远市社科联副主席、副教授董玉整先生担任主编，即将由广东暨南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是迄今为止研究中国理学的第一部大型工具书。）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哲学系
责任编辑：冯生

“文化”一词在西方的起源至少可以追溯到公元前4、5世纪的希腊。当时，希腊人已把文化世界(Nomos)与自然世界(Physis)、文化定律(Nomoi)与自然定律(Logos)区别开来。①在这一区别中，自然指的是“不经过人类加工过的客观世界或自然宇宙。”②而文化则是人造的现象世界，它是习惯、风俗、制度等等的总和。例如，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苏格拉底把文化与习俗等同。与此相适应，自然定律(Logos)是必然的，人们必须听从的。而文化定律则是或然的，人们可以评判与修改的。按照苏格拉底的观点，哲学智慧的功用之一就是引导人们去听从自然以及批评与改造文化：在古罗马与中世纪前期，讨论文化甚少，讲伦理化的自然很多。谈得最多的是宗教意义上的人的教化。到了中世纪后期，文化一词的拉丁文“Cultura”开始出现。但它既没有古希腊人讲的Nomos的含义，也没有中世纪宗教教化的内容与色彩。它的意思简单地指人对自然物的加工、耕耘与养育。如对土地的耕耘和对动物的饲养。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与现在的“农业”一词有许多相通之处。把文化与人的修养与提高联系在一起是从17世纪开始的。17世纪末，德国人开始谈论“Kultur”。虽然在字意上“Kultur”是“Cultura”的德文翻译。但德国人所讲的“Kultur”指的是与人的道德修养、智力提高以及美感发展密不可分的过程(本文下面对此将有专门讨论)。这与拉丁文的“Cultura”显然有本质的区别。到了18世纪，“Bildung”作为文化的另一名词也开始被使用。与此同时，“Civilized”一词也开始在德、法流行。19世纪中后期，英国人泰勒把文化一词带给英语世界。他当时给文化下的定义今天仍为人们广泛使用。泰勒以后，文化一词成为西方社会科学的一个重

要范畴。

在今天的西方学术界主流中，对文化的定义不只是一个，而是多个。正如约翰·汤姆森所指出，虽然文化是西方社会科学的中心议题之一，然而参与对文化的讨论者们对于什么是文化却没有一个共识。③这里，我将着重讨论五种较有代表性的观点：古典定义，历史文化定义，人类学定义，象征派定义和叙述派定义。

古典定义盛行于17世纪末到19世纪末的德、法。后来也流行于英、美。今天，它仍然是许多人所认同的文化定义。当年伊舍林(Issac Iselin)，冯·欧文(K·F·Von Irving)，阿德隆(John Christophy Adelung)，冯·赫德(J·G·Von Herder)，以及梅内斯(C·Meiners)等都是此一定义的倡导者。当今解释哲学的大师伽达姆(Hans-Georg Gadamer)的文化观基本上是古典的文化观。

根据古典定义，文化是一个培育与教养高层次的道德价值、美感以及智力品质的过程。它与学术成就以及那些创造进步的人的性格的艺术密不可分。④从一定的意义上说，后者是文化的条件与内容基础。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冯·柯德宣称：文化与人文同义；人类应该通过文化而达到人文主义。⑤

值得注意的是古典定义把文化与时代精神联系起来。时代精神是文化的总原则。这一点在18、19世纪的德国尤为突出。当时德国人讲Kultur和Bildung。Kultur常指一个社会在精神教化——即道德水平的提高、美感的进步及智力的发展——所取得的成就与现状。Bildung则指个人在这方面的成就与现状。当一个社会拥有较高的道德水准、美感与智力水平、而且这些都体现出一个时代的精神时，这个社会是一个有文化的社会。当一个人在学术、文学、艺术的熏陶下达到新的精神境界，他或她被“gebildet”。

「文化」探义

○(美国)陈勋武

值得注意的

古典定义的特点不仅仅在于它把文化与养育高层次的道德价值、美感与智力联系起来,还在于它把文化与一个民族的文明遗产联系起来。也就是说,它所讲的道德修养、美感培育及智力发展是有特殊所指的。这就是修养、培育与发展道德、美感与智力是与受传统遗产的陶冶联系在一起,即前者要通过受后者的陶冶来实现。因此,古典定义的文化是具有民族性的东西,也是一个有传统的东西。比如说中国文化,指的是以传统的中国哲学、艺术、美学、宗教、文学等为核心的、养育中国人的道德价值、美学感受以及智慧能力的过程。

古典定义虽然把文化看做是一个过程,但它并没有把文化等同于文明(Civilization)。康德对此曾做如此的区别:“我们通过艺术与科学被‘文化’化。而我们通过不同的社会约定成俗的美(grace)以及锻炼(refinement)被‘文明’化。”^⑥比如,有文化教养使我们在区别人的谈话与讨论中能说出有见解、有实质内容(而不是空洞)的东西来。有文明使我们能有优美的言谈举止等等。因此,虽然文化与文明都是教化的过程,且互有联系,但它们有显著的区别。

而现在在美国较为流行的历史文化定义的观点正好相反。这一定义把文化看做是以宗教为核心的文明过程与现状。以“文明的冲突”^⑦一文引起诸多争议的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Samuel H. Huntington),以“文化中国”的理念引人注目的哈佛大学教授杜维明、以《文化战争:为给美国定义而斗争》^⑧一书引起美国人深思的汉特(Jame D. Hunter)等人的文化观基本上是历史文化定义的观点。当然其他许多宗教比较学的学者在谈论“基督教文化”、“儒家文化”、“伊斯兰文化”时,他们的文化定义基本上也是历史文化定义。历史文化定义与古典文化定义有相吻合的地方。两者都把文化看做是养育道德价值与美学感性的过程。但历史文化定义进一步把文化过程与宗教化结合起来,进一步把文化与文明史联系起来。因而,它使文化披上了一种超然的色彩。它把文化与终极的善与美联系在一起(“宗教”一词的拉丁文的原意是“与终极的善联系在一起”),且把文化看做是按照一定的目的而进行的教化过程。

至于文化的人类学定义。第一个从人类学的角度上给文化下定义的人,正如前面所提到的,是英国人泰勒(E. B. Tylor)。他说,“文化是一个由知识、信念、艺术、道德、法律、风俗及其他人类能力与习惯组成的综合系统”。^⑨今天,泰勒定义仍被许多学者认为是对文化的最好与最有权威的定義之一。与前面所谈到的二个文化定义——古典定义与历史文化定义——比较起来,泰勒定义显然从外延内涵上都不同于前二者。从外延上讲,泰勒定义显然把文化的界限扩大了许多。从内涵上讲,它没有前二者那种道德主义与美学主义。尤为重要的是,以泰勒定义为典范的人类学定义突出了文化的认识与实践功能、即文化作为人类认识自然与改造自然的中介。文化不仅为人类认识自然与改造自然提供了条件与手段,而且使自然界在人类面前变成有意义了。另外,正如前面所提到的,古典定义与历史文化定义都落脚于强调文化的民族或区域性。因为道德、美感、宗教等都是具有鲜明的民族性或区域性的东西。人类学定义也讲文化的民族性。但它同时认为不同文化可以分享许多共同的东西:如知识、科学,甚至制度(Institutions)如市场、婚姻等。因此,人类学定义又明指人类文化具有共同性。

象征派定义,顾名思义,把文化看做是由象征符号——如语言——组成的意义系统与网络。如汤姆森所注意到的,对于怀特(L. A. White)与格雷治(Clifford Greetz)来说,文化是象征符号与模式的总和;而“一个社会中的成员借助象征等为中介以相互交流和分享经验、思想的信念。”^⑩汤姆森本人的文化观也基本上是象征派的文化观。对于象征派定义的倡导者来说,运用象征符号来调节行为与思想是人类所特有的能力。而符号的功用不仅仅在于表述(represent)一个客观事物或存在。符号使事物与存在变得有意义。比如说,自然界本身是一个没有意义的世界。当我们叫它“自然母亲”(mother nature)或客观宇宙(objective universe)时,它变成了有意义的存在。同样,当我们给特定的人类行为冠以“对”、“错”、“道德的”、“非道德的”、“正义的”、“非正义的”等等名词时,这些行为变得有伦理意义了。所以,怀特认为:“文化指的

是一个鲜明层次的现象；其中事物与事件赖以我们称之为‘符号’的东西变得有意义。”

⑪

象征派定义有它的独到之处。其中最显著的是：把文化看做是一个由象征符号所组成的意义系统，它使人们看到文化是我们理解与解释事物的条件与背景。即是说，语言等文化物是我们理解与解释自然事物与人类实践的条件与工具，而文化所代表的意义世界是我们理解与解释自然事物与人类实践的背景。因此，理解与解释本身作为“可知的、可理解”的人类行为是与它所处的文化背景联系在一起、甚至是密不可分的。值得注意的是，强调文化的中调角色，它作为解释与理解背景的存在几乎是现代西方哲学少有的一个共识。不仅以伽达姆为代表的解释哲学是如此，以哈博马斯（*Jürgen Habermas*）为代表的批判哲学是如此，以罗帝（*Richard Roty*）与柏特曼（*Hilary Putnam*）分别为代表的实用主义哲学的各派也是如此。因此，象征派定义在现代西方学术界的影响，尤其对现代西方哲学的影响是深刻的。

最后一个文化定义是从象征派定义中分离出来的叙述派定义（*narrative concept*），叙述派定义实质上是象征派定义的一种变型。它仍然把文化看做是一个意义系统。然而，它有它的特殊点。即是，它把文化看做是一本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续写的关于一群人（*a people*）的书。因此，一个文化是一个人群的故事。如中国文化是一部关于中国人的书。叙述派定义不仅流行于当今美国的一些社会学家中，如《社会是一部书》⑫的作者理查·布朗（*Richard · H · Brown*），也流行于当今美国一些哲学家中，如美国当今著名的哲学家之一阿拉斯代·麦肯台尔（*Alasdair MacIntyre*）。

与前面所讲到的象征派定义比较，叙述派定义突出了二个重点。第一，把文化比做是一本书，它强调文化本身具有“语法”（*grammar*），即行为与思维的各种规范，它强调文化既是一个社会与人群阅读自己的课本，又是这一社会与人群书写自己的“语法”的总和。与此相适应，它既是其他人理解一个特定社会与人群的书，又是其他人阅读这本关于特定社会与人群的书时必须理

解的“语法”。第二，它强调了文化与文化的实践者的那种互为依存、互为界定的内在的、不可分割的关系。文化是文化实践者的文化。当我们打开一幅文化画卷时，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幅叙述与记录文化实践者的性格、发展与使命的图画。

这里所讨论的五种文化定义是当今西方学术界主流中对文化的五种最有代表性的观点。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当今西方学术界主流对文化的性质与界限的看法存在着严重的分歧。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西方学术界对于文化的讨论有一个活跃、不拘于某一观点、某一方法的局面。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看待与对待西方学术界中五种文化定义的分歧呢？它们彼此之间内涵外延各不相同，视角方法相互有异。很难说那一种（个）定义更为贴切。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说上述五个定义各有各的道理呢？我觉得我们可以、也应该这么说。对文化性质与范围的不同层次、不同侧面的规定的可能性是存在的。正如哈佛大学教授、哲学大师柏特曼（*Hilary Putnam*）所强调，对于同一事物与现实可以做不同的描述与表述；那种认为对事物与现实只能有一种真实的描述与叙述的思想是属于应当被克服的形而上学的现实主义⑬的错误思想。

与此同时，我们也可以，而且也应当积极地吸取上述定义各自的精华，对文化的性质与范围作出新的规定。在这里，我提出辩证的定义。

辩证的文化定义认为：文化是由社会制度（*Institutions*）、知识、信念、价值、象征符号系统与实践组成的多层次的体系；它既是发展人的道德价值、美感、智慧以及性格的条件，又是人们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条件。辩证文化定义的第一部分强调文化有三个组成部分：制度部分、观念部分与实践部分。每个文化都有自己的制度。“制度”一词指的是英文的“*Institutions*”。它包括二种。一种是组织性制度，如大学、公司、政府机构、党派、家庭等。另一种是模型与结构性的制度，如市场、语言、婚姻、文学、科学、技术、法律、艺术等等。第一种制度给文化实践以实践组织。第二种制度给文化实践以实践模型与结构。制度是使文化的生产与再生产成为可能的必要形式。因此，它

既是文化的一部分,又是文化存在与延续的必要条件。文化的另一组成部分是由知识、信念、价值观、象征符号(如语言)等组成的观念体系。观念体系是文化的灵与肉。它是文化的“软件”。(与制度作为文化的“硬件”相对而言。)它是文化的内容条件。文化的再一个组成部分是实践。实践是文化生产与再生产的活动。它也是文化功能的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

辩证文化定义的第二部分强调文化具有“化”人的功能与目的。它的“化”人至少包含着四个方面:道德的升华、美感的升华、智慧的文展以及性格的陶冶。很显然这个观点吸收了古典定义与历史文化定义的重要见解,意在强调文化修养人的功用。同时,辩证文化定义的第二部分也强调文化是人类“化”自然的条件与中介。即它是人类认识自然、改造自己的中介,是人与自然之间的中间层次。显然,这个规定旨在吸收人类定义与象征派定义的重要见解。

总之,提出辩证的文化定义,我旨在强调文化是一个综合的、多功能的体系。它既是一个民族铸造自己的源泉,又是一个民族认识与改造自己所处的自然世界与其他外部条件的中介。更重要的是,辩证地看待文化,我们才能对文化冲突——这一最显著的社会现象之一以及我们生活中不可避免的东西——有一个科学与客观的认识。即辩证的文化观使我们看到,文化冲突是一个有历史必然性的现象。这就是,文化既然是一个由多方面组成的多功能的综合体,那么其各个方面与功能在一定的条件上统一构成一个文化总体,同时彼此之间又不断地发生矛盾与冲突,如制度与观念、制度与实践的冲突,或者是不同的功能的冲突。这种内在的矛盾冲突是文化发展的内在动力。今天,随着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接触不断增多,不同文化间的冲突也日益增多。因此,一个文化内部的矛盾冲突又常常与一个文化与其文化的外在矛盾联系起来。后者反过来又深深地影响前者。以中国文化为例,中西文化在改革开放中的中国的交流同时引起中西文化的新的矛盾。这些矛盾又进一步地影响中国文化内部的矛盾如制度与观念的矛盾、

不同观念之间的矛盾,实践与观念的矛盾等等。既然文化是在冲突中存在,那么文化建设必须把如何正确地认识与疏导文化冲突考虑进去。这一点,对于我们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过程中重建中国文化尤为重要,任何一个重建中华文化的蓝图都必须带有解决或疏导冲突的方针与策略。

①见“Nature”, Volume III, Dictionary of History of Ideas. W. K. C. Guthrie, “IV: The ‘Nomos’ — ‘Physis’ Antithesis in Moral and Politics”, “Part One: The World of Sophists”, Volume III, A History of Greek Philosophy, (Cambridge: Cambridge UP, 1969), PP. 55-134.

②见 The Dictionary of History of Idea. Volume III, p. 347.

③见 John B. Thompson, Ideology and Modern Culture, (Standford: Standford University, 1990), P. 122.

④见 Thompson, Ideology and Modern Culture, P. 126.

⑤见 Hans — Georg Gadamer, Truth and Method, (New York: Crossroad, 1991), P. 10.

⑥见 Thompson, Ideology and Modern Culture, P. 125.

⑦Samuel Huntington,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 included in Foreign Affairs, Summer 1993, Vol. 72, No. 3.

⑧James Davison Hunter, Culture Wars: The Struggle to Define America, (New York: Basic-Books, 1991).

⑨见 E. B. Tylor, Primitive Culture, (New York: Henry Holt, 1888), P. 1.

⑩见 Thompson, Ideology and Modern Culture, P. 131.

⑪Ibid.

⑫Richard Garvey Brown, Society as Text,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7).

⑬形而上学的现实主义指的是那种认为我们对世界只能有一种固定的、先验的分析与描述的哲学思想。

作者单位: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系
责任编辑:冯生

编者按：去年，我们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主体道德价值”为题作了一个系列研讨。今年，我们开辟本栏，其实是它的继续和扩展。采用“新时期道德建设”这个命题，无非为着包容更广些，目标更鲜明些。在本栏开设之初，我们先就儒学与新时期道德建设的关系，进行研讨。儒学是中国传统道德的主要学派，它对于中国人的道德观念影响至深且广。进行新时期道德建设，有必要认真下一番功夫去清理这一笔民族文化遗产，批判扬弃，转化融通，加以吸收。近一个世纪以来，尤其“五四”以来对儒学所采取的基本否定，其偏颇今天已为不少人所认识。如何重新评价儒学，使之为今所用，学界争议正酣。这一期发表的三篇文章，各抒己见，绝不雷同，人们读后，当可从中感到问题的复杂性和挑战性。

传统道德与现代文明

□冯达文

(中山大学哲学系)

(一)

不能不承认，传统道德，特别是儒学倡导的道德，在许多方面是与现代文明相抵牾的。

传统道德发源于农业文明。农业文明，使人进入一种群体关系，给群体以一种秩序，让每个个体在群体有序的活动中得到驯

化，从而得以摆脱野蛮与蒙昧，变得文化、理性化，这无疑是一种进步。

但是，农业文明给出的群体关系，基本上是一种氏族—宗族关系。在这种社会结构中，个人对氏族—宗族群体的绝对依赖性，固然培育了对所在群体的亲亲之情，然而，群体外的关系是冷漠的。我们日常办事，在亲戚朋友范围内畅通无阻，非亲戚朋友则需通过表姑娘等数代关系的多重追溯，把外在冷漠关系转换为内在亲情关系才得以成行，所表现的即是这种情况。显然，这种社会结构是排斥社会公正，无视社会公德心的。这是其一。

其二，在这种社会结构中培育的亲亲之情，固然有利于维系所在群体的生存与发展，然而，事实上，群体内部的凝聚力越强，个人意向透过群体的过滤到达社会所受到的扭曲便越利害。在这里，个体是不能只身面对社会，自主地作出选择并直接接受社会保护的。显然，这种社会结构同时又是否弃个体自我及其自由的。

其三，在这种社会结构中，人的横向关系还是氏族—宗族纵向发展及产物。上一代人为下一代活着，这固然承担了义务，但同时也可以被转化为上一代人理所当然地支

配下一代人的权利。这种依自然历史状况而形成的权力结构关系，就是宗法等级制。《红楼梦》是人们所熟知的。《红楼梦》中贾母的地位最高，就不是因为她最有本事，而是因为她辈份最高。显然，在这种社会里，那种依自然历史状况形成的权力活动，还是排斥理性、才智与胆识的。

农业文明所形成的社会结构及相关的道德意识不能容载社会公正、社会公德、个人自由与理性，这怎能不与现代文明相脱节呢？

(二)

也许不能把现代文明简单地称之为商业文明，但现代文明作为一种工业文明，确实表现在商品生产与商品交换中。以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为基础的现代社会，一方面是显著地突出了个人权益，包括个人对自己通过正当的劳动与经营从而获得的财产的占有权和出让权，和与之相关的进入市场从事买卖活动不受非经济因素干扰的自主权与自由权。另一方面则是显著地突出了契约与法律，以确保每个独立个体在进入交换关系时得以有序地进行。突出个人在财产占有和交换活动的自主与自由，此为农业文明所不能有；强调个体与个体交往关系的法律准则，使每个个体直接面对社会，既受社会的制约也受社会的保护，享受他们作为社会公民所应有的平等权利，这同样为农业文明所不能有。

问题再显浅不过，既然以商品生产与交换的充分发展为特征的现代社会与传统农业社会有着根本不同的人群结构关系，依照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观念，现代社会的道德观念，特别是涉及人与人之间利益关系的道德观念，应该主要地从现代社会结构，特别是从商品生产与交换关系中去寻绎与厘定。

在我国当前的情况下，在我看来，道德建设的首要任务，既不在于颂扬历史传统，也不在于高歌若干高、大、全的英雄人物。过分颂扬历史传统只会远离现时现实，专注

英雄人物则会远离俗世社会。因此都不具可操作性。当今社会文明建设的主要着力点，就在于环绕法律给出的权利与义务，开展切实的公民教育，和平实的，以“人人为我，我为人人”为基调的公德心的培育。这种教育或培育之所以被判定为主要着力点，从必要性方面看，是因为：法律给出的其实是一个文明社会应该给予公民的最低权利，依靠这些权利，人们的利益交往才有可能得以在公平、自由、民主的轨道上运作。一个社会对其公民如果连最低权利都不予保障，就没有现代文明可言；同时，法律规定的义务又是每个公民对社会的基本责任，每个公民做人的最低准则。一个公民如果连最低准则都不能守持，向他提出更高要求不是悬空就是做假。就像一个商店老板连该纳的税尚且偷漏，就去要求他毫不利己、专门利人，那是决不会奏效的。

这种教育或培育之所以被判定为主要着力点，从可行性看，则是因为法律规定的行为、准则涉及到每个人的切身利益，最容易为人们所广泛地接受。譬如，大家都不愿意自己所处的生活环境变成垃圾堆，故“不准随地吐痰”，“不准随地倒垃圾”作为一种公共道德应该最容易为人们所确认。可惜当今连中山大学这样的高等学府，仍不乏随地扔东西、随地吐痰者，我们很难想象社会大众会很快接受与切身利益无关的更高层次道德信条。故就近期而言，如何把外在的、强制性的法令转化为内在的、自觉的道德律令，实最为公民社会所关切。

(三)

我这样说，决不是否定人们应有更高层次的道德信仰与精神追求。

应当看到，现代社会是一个平面化的社会。现代社会中，不问商品生产付出的不同的具体劳动而只以社会必要劳动之平均值为交换的价值准则，不问职位高低贡献大小而只以法律为尺度予以裁夺的平等原则，以及不分才智学养一人一票的选举制度，都把不同的人一体化、平均化了。只有顾及到不

同投入不同产出,才有空间的宽广度;只有顾及到不同来源不同积累,才有时间的纵深度。现代社会如仅以市场中的当下交易或会谈中的机械多数为设准,便把时间与空间的维度给摧毁了。

在这种情况下,当然地需要有更高层次的道德理念与精神追求,以便与平庸的现实拉开距离。但是,我认为:

第一,高层次的道德理念与精神追求,仍然是可以从人们日常的道德行为中引伸出来的。事实上,在日常交往中,一个人一旦顾及到他人的利益,即已走出自我;他顾及他人的这一念心,即是良知。只要把这一点良知扩充开去提升起来,他就可以成为一个高尚的人。这正好表明,强调着力于日常公民的教育与公德心的培育,并不排斥高层次的道德追求,恰恰相反,唯有加强日常道德行为的教育与培植,才可以为高层次的道德建构提供前提与奠定基础。

第二,高层次的道德理念与精神追求,因为并不直接涉及个人利益与他人或社会利益的关系,社会固可以倡导,但决不可以干涉,更不应该强加。人们选择什么样的理念安顿自己的心灵,完全是每个个人的事,别人无权横加干涉。事实上,如果剔除其所涉及的外在社会结构与运作乃至被意识形态化了的一面,就其所含蕴的人文精神一面而言,则人们笃信或儒或释或道或基督并无不可。儒、基督等教有感于人心的坠落而以入世苦行为份内事,道、释二学有见于社会的污浊而以出离世间求清静心,它们各自不同的生命情调与价值取向都有其成立的理由,而且都可以有助于社会精神文明的发展。在环绕法律所确立的道德律令的层面上,由于直接涉及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社会的利益关系,即是必需人人遵从,必须强加于每个社会成员的。而在这种高层次的道德理念与精神追求上,既然人们可以自由地作出选择,当然地,儒、释、道、基督等教与学说作为一种人文精神,就都是可以为现代社会所容纳的。在这一意义上说,传统文化、传统的道德理念,于当代精神文明的建设上,无疑地可以发挥积极的作用。

44 / 学术研究 1996 年第一期

儒家伦理思想的现代价值

□张和增

(无锡轻大社科部)

在改革开放中走向 21 世纪的中国面临的 最大困难不仅仅在于发展经济的问题,而且在于道德的建设问题。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传统道德面临着新的挑战,如精神的失落、信仰的危机、道德的沉沦等等。于是,有人把目光转向中国的传统文化,企图得助于中国的儒家伦理思想,把儒家伦理思想作为重建道德的依据或源泉。儒家伦理思想真有那么大的魅力吗?究竟应该如何看待和评价儒家伦理思想?

儒家文化的核心,体现为它的伦理思想,儒家就是以伦理为中心的文化。儒家伦理思想,大致包括了四个方面的主要内容。

第一个方面的内容是原始儒学伦理思想。它是以孔子和孟子的思想为代表而构成的。原始儒学伦理思想提出的伦理观念具有较浓厚的人文色彩,表现出强烈的道德理想主义的价值取向和自强刚健的传统。它既没有“三纲五常”的内容,也不主张禁欲主义。

儒家伦理思想的第二个方面的内容是政治儒学。它是由西汉董仲舒首先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由汉武帝予以肯定而形成的汉代儒学伦理思想。其核心内容便是“三纲五常”。它体现了政治与伦理、伦理中心与权威主义的高度统一,它规定了封建社会基本的社会规范。

儒家伦理思想的第三个方面的内容是宋明理学伦理思想。它主要是以二程和朱熹的思想为代表,提出天理与人欲的对立论,主张存天理、灭人欲的禁欲主义。

儒家伦理思想的第四个方面的内容是世俗化的儒家伦理。它指经历了数千年的文化传统而积淀在人民大众之中的一些习俗、心态、心理及行为规范等等。

对于儒家伦理思想的这四个方面应该如何评价呢?以孔孟为代表的原始儒学伦理思想代表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超越理念,提出了天人合一的宇宙伦理模式,仁礼统一的政治伦理模式,以及性善为本的人性论,重义轻利的义利观。它所追求的是完满的道德人格和天人合一的形上境界。总体来说,这种原始的儒学伦理思想,基本上不会对现代化进程产生阻碍作用。它对于因现代化而产生的一些问题的反省和批评,可以提醒人们注意现代化进程中的非人性化趋向并由此产生的各种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在孔孟的伦理命题中,往往是同一种命题中既有积极意义又有消极因素。例如,孔孟提倡的“和为贵”,其中有推动人际关系和谐的积极意义,但亦有轻视竞争意识的消极因素。孔孟提倡的君民关系,其中有民为本的积极意义,但亦有忠君的消极因素。孔孟提倡的“忠、恕”,既有主张献身、宽容的积极意义,亦有压抑个性的消极因素。所以原始儒学伦理思想既是继承的源泉又是批判的对象。它的现代意义并不在于从正面促进现代化,而在于从人文价值的层面对于现代化大潮冲击下可能出现的各种弊端与趋向,如功利主义的恶性膨胀、精神危机、人际关系的疏离等等进行纠正、限制和批评。

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由汉代儒学伦理思想构成的政治儒学在今天没有丝毫的进步意义,无论其纲常体系或者是其义利观,都是如此。它是制度化的儒家伦理,是在封建专制统治前提下的产物,随着封建专制的彻底解体,它在实际上已失去往昔在现实生活中的控制力和约束力。它已被新的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所彻底否定,在今天的现实生活中已成为历史的陈迹,没有任何积极作用。

宋明理学伦理思想自始至终存在着理论脱离实际,理论超越现实的弊病,存在着

道德理性真切,而科学知性贫乏的教条化和僵化。它已受到了历史的批判,其中“存天理,灭人欲”之类的道德说教已经被历史淘汰。但是,在宋明伦理思想中,它的执着地追求人生精神价值,提倡人们树立正确的义利观,反对见利忘义的不道德行为等等,如加以现代的诠释和理论转化工作,在现代社会中亦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宋明理学提倡的“修己”、“慎独”、“致良知”等思想主张,对于引导人们成为真正有德之士及培养高尚道德情操能起一定的影响和作用。

世俗化的儒家伦理思想往往体现在广大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中,人们无意识地代代相传,潜移默化。其影响之深,可说是根深蒂固。“文化大革命”中轰轰烈烈的“破四旧”实际上亦无法触及其实体。世俗的儒家伦理思想中有很多积极的因素,如勤劳、节俭、守信、遵纪守法、奉献精神、重视家庭等等。但世俗的儒家伦理思想中亦有消极成分,如畏天知命、自我压抑、安于现状等等。世俗化的儒家伦理思想总的来说,就其基本倾向而言是入世的,实际的,义利交重,并且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兼顾利益、效率的追求与人际关系的和谐。

二

当代中国文化中占主导地位的是马克思主义文化,而不是传统文化,更不是儒家伦理思想。这是当今文化研究的基本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在中国的确立使中国文化得到飞跃与升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实践使中国迅速赶上世界历史发展的潮流。

不可否认,在当今的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中,我们可以并应该继承儒家伦理思想中积极的成分,吸收其合理的民主性的精华。文化不仅具有阶级性,而且还有历史的连续性。社会主义的文化、社会主义的道德,绝不是离开人类文明的发展而孤立地单独地产生的,它是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文化成果的继承和发展。

毛泽东也曾说过:“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毛泽东选

集》第二版，第2卷，第534页）的确，历史是割不断的，道德的继承是割不断的。要想割断历史，割断道德继承的做法只能如抽刀断水。

另外，在今天的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中，继承儒家伦理思想中的积极合理的部分，亦是弘扬民族文化中的优秀传统。这可以振奋民族精神，提高我们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并可以调动一切积极因素。

但是，在现代化科学理性的光照下，自由、平等、博爱、民主、法制和科学这类具有现实感召力的理想观念已成为新时代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理想中轴。所以，不必也不应对儒家伦理顶礼膜拜、奉若神明，不必把它人为地拔得很高。

有人以东亚工业文明为例来证明儒家伦理应享有至高的地位，新儒家甚至提出

“内圣开出新外王”的说法，似乎是儒家伦理思想产生了现代化。他们企求通过儒家伦理思想的现代转型来谋求中国的现代化。这实在是一种误解。

以个人高尚的道德情操来感染民众，并以此而治理社会的幻想，已被以往的历史所否定，更为工业文明的发展中产生的崭新道德理想所逐步替代。儒家伦理思想已不可能恢复到封建时代曾有过的辉煌。东亚的一些国家和地区推崇儒家伦理思想是在他们已经实现或基本实现现代化之后产生的，是对它们西化之后所出现的道德危机的补救。民主政体和自由主义经济制度、法规的引入才是导致东亚经济腾飞的决定性因素。这才是因。而提倡儒家伦理思想，崇尚儒家文化是果。两者的因果关系不能颠倒。“内圣开出新外王”不过是一种美好但无法实现的幻想而已。

儒家伦理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东方文明的代表。自汉代以后作为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学说在封建社会里长期存

克服贬低否定儒家伦理的思维定势

□温克勤

(天津社科院伦理学所)

起和强化着一种否定儒家伦理的思维定势。这种思维定势不利于全面、科学地评价儒家伦理，不利于继承和发扬以儒

在和发展着。以新的视角对其进行批判，是从近代开始的。自鸦片战争以来，早期启蒙主义、戊戌变法巨子、辛亥革命家，“五四”新文化运动、直至“文化大革命”、“批林批孔”、“评法批儒”，儒家伦理遭到一次又一次扫荡性的批判。综观上述各个时期对儒家伦理的批判，其动机、需要、批判程度和达到的后果不尽相同，或根本不同，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即笼统的否定性的批判多，具体分析和肯定性的评价少。其后果是发展

家为核心的民族传统美德。

其一，大而化之的定性式的批判和否定。如讲儒家伦理是封建专制主义的意识形态，残害人、压抑个性；儒家伦理是宗法等级伦理，同现代社会生活格格不入；儒家伦理只适用于农业文明，是中国发展商品经济、实行富民政策的重大思想障碍，等等。如前所述，这类大而化之的否定性的批判，在社会转型时期是可以理解的，有时也是必要的。但不能认为是全面的、科学的。儒家

伦理博大精深,它诚然包括一些消极的、糟粕性的东西,但它倡导的道德规范准则、道德理想信念、道德修养方法、道德理论学说,有不少是人类社会生活实践经验的结晶,其中包括着人类公共生活美德和民族的传统美德,具有很强的民族凝聚力和文化认同性,对社会经济发展和整合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否认这一点,显然是不符合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实际的。

笼统地讲儒家伦理压抑个性不符合历史实际。孔、孟都讲人的主体性。孔子讲“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讲“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孟子讲“儒夫有立志”,“说大人则藐之”,他强调人应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精神。荀子也强调人应有“权利不能倾也,群众不能移也,天下不能荡也”的“德操”。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只是反对个人脱离社会而孤立地发展自己,或者只顾发展自己不顾发展别人。他们讲“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将个人完善与社会完善统一起来。他们强调礼义的规范约束,更强调仁的内心觉醒。罗素在《西方哲学史》中讲,“哲学家们可以分成希望加强社会约束的人和不希望社会约束的人”,而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则居于二者之间,他们讲“中庸”,不走极端。可见一谈起儒家伦理就大讲其压抑人的个性是不妥当的。

笼统地讲儒家伦理阻碍经济发展和现代生活格格不入也是不符合客观实际的。高度现代化的日本、新加坡、南韩和中国香港地区,它们在现代化过程中,并没有抛掉儒学影响,相反的,却非常重视发挥它的作用。日本把提倡儒学作为三大国策之一,新加坡把儒家思想写进教育纲领,韩国也强调以儒学治国,从国家到乡镇设有民众性的教育机构“成均馆”,以儒家的传统礼仪教化民众。儒家伦理不仅在亚洲受到重视,认为它在发展经济、稳定家庭和社会方面起了积极的作用,而且在世界范围内也受到青睐。西方国家许多有识之士认为,在当代社会,也需要“孔子学说提示全世界人类丰富的做人处世

原则”。1988年11月,75位诺贝尔奖金获得者于巴黎集会,在所发表的宣言中声称:“如果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头二千五百年去汲取孔子的智慧。”国际社会对儒家伦理精华越来越重视决不是偶然的。这是由于儒家伦理中的许多思想观念仍然适用于现代社会生活,适应于商品市场经济的发展。儒家伦理可用来建设现代企业文化,用于现代管理。如儒家的“仁、义、礼、智、信”即为国内外企业家在企业管理中所创造性地运用。儒家伦理倡导的“和”、“敬”、“群”等道德观念经过创造性的转化不仅可用来调整现代人际关系而且也可用于企业经营管理。尤其是儒家伦理重理想、情操和精神生活,其浓重的人文道德精神,对现代社会生活,对现代社会的全面进步和发展更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

其二,盲目反传统。如认为历史上批判、反对孔子儒学传统的就是进步的、革命的,继续发挥孔子儒学传统的就是保守的、反动的。近代史上一些先进人物继承了孔子儒家的某些思想,被评判为资产阶级软弱性、妥协性。建国后,在思想史研究中,在讲授思想史的教材中、课堂上,很突出这一方面。例如,孔、孟讲“德治”、“仁政”,就批判德治、仁政;儒学讲“仁者爱人”,就批判其为地主阶级人性论;儒学讲“中庸”、“和为贵”便斥其为宣扬阶级调和论;儒学讲个人道德修养,就批判其为唯心主义修养经,等等。沿着这一思维定势,不仅全面否定“孔孟之道”,而且全面否定董仲舒、二程、朱熹、陆象山、王阳明等继续发挥孔、孟的伦理思想。

中肯地讲,反传统在历史上确实起过巨大的积极作用。只有冲破束缚社会发展的旧传统才有利于新事物的成长和社会的进步。这是毫无疑问的。但问题是必须区分传统中的精华与糟粕,不能盲目地反传统。历史上西汉开国君臣刘邦等,总结秦二世而亡的教训,制定了改行儒家“行仁义、法先圣”(新刊《新语》序)根本政策;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崇儒术”;唐代李世民君臣也尊崇儒学,他们在全国广设

孔庙，尊孔子为“先圣”、“宣父”。汉高祖、汉武帝、唐太宗都是历史上有大作为的杰出人物，他们并不反对孔子儒学，相反却尊崇它，可见以是否反孔子儒学传统作为划分进步保守、革命反动的标准是极不妥当的。

诚然，在近现代史上，特别是民国以来，搞封建复辟的，想当皇帝的，搞法西斯独裁统治的也曾经提倡尊崇孔子儒学。他们祭孔，要国民“尊孔读经”，甚至提出要明定“孔教”为“国教”。这应该是一种很复杂也很奇特的政治现象。有人以此评定孔子儒学的反动本质，判定反动保守势力与孔子儒学的内在必然联系，显然是过于简单化了。因为，儒家思想中虽然有一些消极的、糟粕性的东西，往往为反动势力所利用，但是孔子儒学中有更多的东西是与反动势力、反动统治相对立的。同时，我们还看到，近现代史上许多爱国知识分子、科学家、学者和革命者是并不反孔的，他们推崇儒学中的精华，并用之与反动势力作斗争。

其三，以西方伦理文化为评价的参照系。在近现代，向西方学习是中国社会历史发展中具有决定意义的大事情。人们在向西方寻求富民强国之道的同时，很自然的会拿西方文化同中国传统文化作对比，这其间伦理道德的对比占居突出的地位。早期启蒙主义时期、戊戌变法时期、辛亥革命时期，特别是“五四”运动时期，都有不少人探讨中西伦理比较问题。开始多认为西方的伦理道德不如中国，影响颇大的“中体西用”论就是由此或主要是由此得出的。后来认为西方重视物质文明，中国重视精神文明；西方是动的文明，中国是静的文明；西方重功利，中国重道义；西方重公德，中国重私德，等等。应该说，这样的比较，在当时对于人们了解西方和认识自己都是必要的、有益的，但也有令人感到表面和肤浅的欠缺。由于中国近现代在经济文化方面发展落后，加之旧中国和西方国家处在两个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于是在一些国人心中，不仅科学技术中国不如外国，而且伦理道德中国也不如外国。更多一些的国人在思考和研究伦理道德问题时，则往往以西方的伦理道德作标准

尺度或参照系。这种思维定势是与近代以来西方国家的“西方中心论”的影响分不开的。

人类历史的发展，使人类越来越认识到这样一点，即各个民族的文化都有自己的优点和长处，都有自己存在和发展的必然性。文化霸权主义同政治霸权主义一样是违背历史发展潮流的。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它的现代化必须与民族特点、民族文化相结合，否则将给民族的生存和发展造成灾难性的后果。而民族的伦理道德乃是构成民族特点、民族文化的基本内核。事实证明，受西方中心论影响，以西方文化作参照系的思维定势，必然造成轻视和贬损民族文化的倾向。例如，我们看到这样的中西文化比较：中国文化重感情，不重理性；重实用价值，不重理论价值和科学价值；是封闭意识，非开放意识；是保守意识，非进取意识；是线性思维，非立体思维，等等。而西方文化则与此相反。这些讲法，有的是毫无根据的臆想，有的是从一个时期、一个方面的文化现象作出的以偏概全的结论，所以既不全面，也不深刻，不仅不可能揭示出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的特质，而且会有意无意地把西方文化看成是积极的、优越的，而中国文化是消极的、劣等的。这种“比较”很容易导致民族虚无主义，为全盘西化论者所利用。

比较研究似乎更需要在大致相同的社会历史发展阶段内进行。比如，古希腊罗马与中国的先秦；西方中世纪与中国封建社会；西方近代与中国明清时期。这样会有更多的可比性，可以从中看到更多的共同性的东西、规律性的东西。李约瑟讲：“在相互隔绝的各种文化中有不少并行相似的发展，特别在较早的阶段。”（《中国科技史》第1卷，第515页）这一讲法是有道理的。我们如果着力于这样的比较研究，可能会获得更多和更深入的认识成果。

其四，伦理道德决定一切的评价方式。道德决定一切、道德至高无上，可以说是历时几千年之久的一种思维定势。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伦理认为，在社会生活中，伦理道德始终应居于首要的和决定性的地位。重视道德的社会功能作用，要求作为道德主体的

个人和群体(社会、国家)都重视道德修养,应该说是儒家伦理的特色和优长。但是真理再前进一步就往往变成谬误。儒家的道德决定论、道德至上论,否认了道德是在一定社会经济及其决定的政治和文化条件的基础上发挥作用的,因此本质上是唯心主义历史观的一种表现。反传统、否定儒家伦理的思维定势,却恰恰在这方面又承袭了儒家伦理的传统。其主要表现是把中国近现代落后的根本原因,归结于儒家伦理的积淀太深,包袱过重。诸如科学技术落后,商品经济不发展,国民性格中的劣根性,等等,莫不出于此。这显然是不符合中国历史发展的客观实际的。历史上的两汉唐宋时期,我国科学技术就有很多发明,造纸术、印刷术、指南针和火药“四大发明”,是我国成为世界文明古国的重要标志,对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重大贡献。汉唐以来,我国的国内商业和国际贸易也颇为发达,闻名世界的“丝绸之路”就是连通古代东方和西方的一条重要商路。而这些发明成就恰恰就是在儒学定为一尊、儒家伦理普及的文化背景下取得的。此间,如何科学分析儒家伦理的复杂社会功能,其对国家统一、民族融合、社会安定和生产发展的积极作用。究竟应该怎样估计?虽然有待于进一步研究,但至少儒家伦理没有成为这个时期发展的思想障碍。近现代中国经济落后,科学技术不发达也不是儒家伦理造成的,而是由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主义、买办

主义统治造成的。当然,在近现代以来,中国的传统文化思想没有得到符合时代发展的提升,封建统治者又利用并发展了它的消极的、糟粕性的方面,从而对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产生一定不良影响。

儒家伦理自春秋战国时期形成以来,经过汉唐、宋明时期的充实、丰富、发展,在吸收国内各学派思想(主要是道家、法家、墨家思想)和融合外来文化(主要是佛教文化)的基础上,发展成为中国历史上最有影响的博大精深的伦理道德体系,在古代社会乃至近现代社会对每个炎黄子孙产生着巨大的影响。自从明清以来资本主义在中国萌芽发展后,儒家伦理在各个历史发展时期,一再受到挑战和批判,乃是时代发展的客观要求。这些批判,特别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后,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批判,为儒家伦理的改造和提升莫立了思想理论基础。在今天,我国进入改革开放、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时期,儒家伦理应该在新的历史背景下得到改造和提升,以便在现代社会生活中继续发挥作用,这同样是时代发展所提出的要求。如果说过去为改造、提升莫立基础的时代需要大刀阔斧的批判、清理,那么现在则需要深入细致的挖掘、整理,特别是需要全面、科学的评价,以便充分认识它的历史价值、现代价值以及世界意义。

本专栏责任编辑:冯生

史学的诗性与客观性

□ 李洪岩

一、诗的转变

中国的历史学家大都瞧不起文学家。文学家对史学家呢，当然也有不满，甚至鄙夷。但他们在表示这种不满和鄙夷时，总使人感到有些两腿发软，不那么理直气壮。这或许不失为学术界中的一个有趣现象。

西方的历史学家是否有如此“好运气”，我不敢妄测。不过，据我所知，西方有不少人文学者经常对历史学“造反”。例如，1969年，美国历史学会主席 C·Vann·Woodward 作过一个演讲，题为《历史的未来》，就向我们描绘了一幅绝妙的现当代西方文人对史学的造反图。

其实，这种“造反”并不使人奇怪，它不过是西方整个“文化造反”的一小部分而

已。这种文化造反的驱动力就是“文艺”。而且，造反也确实取得很大“胜利”。于是，我们看西方文化，就发现他们的哲学与神学中的许多重要流派都在纷纷涉及诗学，有的甚至把诗学问题提到首位。可见，文人们不只是一要对史学造反，而是要对整个文化造反，不只是想以“文学”来代替史学，而且想用文学来代替科学、哲学等所有学科。总之，他们想以“文学”来作人类文化的中心。这种造反的思潮和结果，就是“诗的转向”。

对“诗的转向”描绘得最清楚明白的著作，是美国哲学家理查·罗蒂的《哲学和自然之镜》。在该书中，他把西方哲学划分为两种样式，或者说两派。一派是系统的哲学，特征是以认识论为中心，是建设性的，追求客观性与合理性。在哲学史上，他们是主流的、正常的哲学家。他们提供论证，着眼于千秋万代的营建，力求通过科学研究，发现真理。基础主义认识论、实证主义、经验主义，都可划入此派。另一派是教化 (edification) 的哲学，以怀疑认识论为出发点，在哲学史上是反动性的，怀疑进步和最新论断，怀疑系统哲学和普遍公度性，专门提供讽语、谐语、警句。作为外围哲学家，他们重实效，带有革命性和反常性。他们不是为千秋万代营建，而是为自身时代摧毁，注重艺术和谈话，认为哲学是谈话中的一种声音，而且还认为“全部真理”这个概念本身就荒谬。这派哲学家是“诗化哲学家”。

“诗化哲学家”以“诗”为中心，就是说，以艺术、文艺为中心。在这里，“诗”不仅代表着一种有韵可吟诵的文体，而且以艺术第一符号的身份出现。从趋向看，这些哲学家与“文人造反”一致。换言之，在“文化造反”的潮流中，他们与作家们合流了。所不同的，他们更多地是向系统的哲学家们造反。尼采对康德和黑格尔发起猛攻，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以文艺取代科学作为文化的中心。他们宣称，只有诗人代表人类的超越和重新创造自身，而不是教士、科学家、哲学家或政治家；不消说，也不是历史学家。诗人和文艺创造开始在“哲学”中得到本体论证，传统的对艺术的看法得到纠正，哲学本身的面貌也得到改观。哲学和科学、文学之间的界限日益模糊，出现了“诸样式间分界含混”的倾向。因而，全部西方文化，开始远离本身的希腊源头。有的诗化哲学家甚

至认为，对某一哲学作品最真实的哲学解读，就是将其当作文学，当作一种虚构的修辞学构造物，其成分和秩序由种种本文的强制要求所决定。当然，这里的“哲学作品”可以有条件地变成“历史著作”。

文人和哲学家共同进行的以文艺为驱动力的“文化造反”，对坚硬厚实的史学界不会毫无影响。在史学界内部，出现了松动迹象，开始有人含蓄或明确地呼应。他们不禁向文艺献起媚来，攻击“科学的史学”，呼唤史学的艺术。这种经不住诱惑、自家造自家反的现象，可谓内外交困的必然结果，也是学术史上稀松平常的普通现象。1962年，另一位美国历史学会主席 Cari Bridenbaugh 在题为《历史的大变异》的演讲中，就愤愤地说：“优秀的历史学家，不会屈从于社会科学家那一套不讲人情味的方法，也不会去崇拜那位混帐女神：计量方法。”他提醒同行关注“神圣的美”，这使人想起屈维廉和罗素。而米歇尔·福科则根本不想革新西方史学传统，因为他要彻底破坏它，所以被称为“反历史家”。

“诗的转向”、“人文化”的呼声以及对“美”的追寻，在现当代中国史学界，也有一定程度的表现。有人就曾经对洪煊莲开玩笑：“历史这两个字，读来有点像‘立死’，乃是要死的学术。”这反映了部分人对“科学史家”的“造反”意向，使人想起80年代中国史学界掀起的那场“史学危机”讨论。在这场讨论中，“科学史学”受到猛烈抨击，其神圣性和权威性受到挑战。而“科学理性”原是近代以来中国人孜孜以求的无上法宝。讨论过后，一股人文化的倾向在中国史学理论界悄然兴起。

本来，我国史学界开展过关于艺术的真实与表现以及史学的事实与再现的关系的讨论，开展过关于历史戏剧如何处理历史题材问题的讨论。但是，这些讨论，尽管跨越史学和美学，却没有导致“跨学科研究”以及“历史学也是一门艺术”的主张的出现。因为，讨论是在科学理性的原则下进行的，学科虽多，学统则一。所以，像周谷城《史学与美学》那样的稍欲决心之作，一般要受到批判。科学理性，早已成为中国史家的集体潜意识，尽管科学理性的表现形式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各种各样。

但是，现在不同了。中国当代史学家已经开始热切地关注起史学与美的问题。而且，在“科学化”略呈停歇的间隔中，人文

化呼声明显转强。特别是钱钟书关于“史蕴诗心”诸观念的阐发，更是具有经典性。可以说，钱钟书是中国诗化史学观念的代表。

在此形势下，西方史学状况在中国人眼里也就不失时机地发生了变化，正如何兆武教授所拈示的：“近年来西方历史哲学发展的一般趋势是把历史研究越来越看作是一种人文研究而非一种科学（包括社会科学），着重点越来越转到历史写作的结构和布局方面，似乎日愈在回到自古以来文史不分的传统老路上来。”尔后，便有学者论述当代西方“新叙事史的复兴”以及“当代西方人本主义历史哲学”。计量史学之类“新史学”已开始不吃香，新叙事史在兴起。东方西方，均蕴示着一股新的“诗的转向”。

在这股思潮中，历史学作为实证科学的一系列理论观念、理论原则、操作规则，全都受到冲击。这样，就为我们回过头来观察自古至今中国史学的发展及其特征，提供了现实背景。

二、客观主义的失落

在“诗的转向”中，人们对历史学“造反”的基本内容，集中在“客观主义”的问题上。他们认为，客观主义在认识论上经不住推敲，它的许多理论原则全都不能成立。

中国传统史学，向来有“尚文”、“尚质”两种趋向。唯其尚质，故认史学为科学；唯其尚文，故认史学为艺术。尚质者重简洁，寻质朴，讲究直书其事；尚文者有文采，富华丽，难免绮文夺实。尚质派多为理论家，如刘知几、章学诚，其自身撰史时或未免与艺术有染；尚文派多为实践家，如司马迁、班孟坚，其修词主张或亦同尚质派说。尚质派所守者，史家之文也；尚文派所作者，文士之史也。文士重“文”，史家尚“笔”。尚质派为修词学之实用派，尚文派为修词学之文艺派。我认为，中国传统史学中的尚质派，正是以客观主义为特征的。

尚质派以“直书其事”为基本原则，认为“事”是历史写作的最初出发点和最终落脚点。所谓“直书”，表示写史者必须尽力消除一切主观因素，以公正客观、不着情感的“空白心灵”去全盘接受史料提供的全部历史信息，以期达到对历史完全真实的还原，即“求真”。“书”与“事”相统一，不应存在张力和偏差。由“事”转换为“书”，其过程应该是“直”的，中间不应有丝毫走漏，亦即所谓“还历史以本来面目”。史家对史料的理解，就是接受其中的客观性，然

后通过写作活动把这种客观性表达出来。

一般说,在客观主义思想体系中,历史研究在结论上不会有“创见”,只有“找见”或“寻见”。客观主义与实证主义是一而二、二而一的有机统一。它们以基础主义、实质主义、19世纪科学理性和各种体系化的理论构造为理论基础,从而在中西方形成悠久传统和强盛势力。

但是,客观主义的理论缺陷和理论漏洞非常明显。它不仅在逻辑上有循环论证的毛病,而且忽视了历史认识过程中语言的作用、修辞的作用以及认识主体的作用,忽视了史学本文固有结构与秩序对历史认识的反弹,忽视了写史(历史叙述)和历史(叙述对象)之间的张力。

从逻辑上看,“事实”无法既作写作依据又作写作标准。作为写作依据,它本来不是给定的,而是有待证明的;作为写作标准,它又有待揭示,需要去挖掘。所以,这里实际存在悖论。“直书其事”,用什么去检验?用“事”,而“事”恰恰有待于“书”。这种情况,正如休谟所说,表明“是这样(is)”和“应该怎样(ought)”,两者老合不拢。

从语言作用和主体特性的角度看,写作必然伴随着“走漏”。写出来的历史永远不可能是客观历史的原样还原。牛津名家柏林曾以“常语分析之法”谓善恶是非涵泳于语言文字之中,作史者即不欲彰善瘴恶,亦不能也。近来,中国学者有喜谈萨伊德东方主义者,而萨伊德认定的基本命题,就是:叙述必然走样。刘静修《读史评》:“记录纷纭已失真,语言轻重在词臣;若将字字论心术,恐有无边受屈人。”王安石《读史》:“糟粕所传非粹美,丹青难写是精神。”钱钟书谓:“夫虚说游词,如《史通·曲笔、书事》两篇所纠者,固无论矣。即志存良直,言有征信,而措词下笔,或轻或重之间,每事迹未讹,而隐机微动,已渗漏走作,弥近似而大乱真”。所以,语言由媒介物而成为障碍物,史家由中间人而成为离间人,都干扰着“直书其事”的实现。

从理解的特性的角度看,我们知道,史家总是通过阅读(考古挖掘也是一种阅读活动)来达到对历史的理解,然后把他的理解再交由读者去理解。所以,历史研究可以看作是一种理解活动。但是,要理解历史,就先须对理解本身有所理解。“理解”所固有的规律和特征,在于理解总伴随着某种创造性的阐释在内。而阅读则具有再生、创造、

产生等不同层次的作用。阅读就是理解,理解就是解释,解释就是创造。史家理解历史不应是对过去理解的重复,而必须负有当今的使命。史家用新的解释方法重塑过去的史书与史料,使之面目一新,使过去保存下来的经验重新得以理解,对历代提出的问题重新发问。因此,理解中的主观因素不应克服,而应积极加以利用,在主观性中显示真实性,达到与本文的“视界融化”。

上述对“理解”的理解、对“解释”的解释,虽主要来自西方释义学,然中国古人也有类似阐述。例如,禅宗认识论有“死参”、“活参”之别。创造性的阐释是“活参”,执著于字句是“死参”。有活参,才有活句;若死参,则死在句下。而禅句则无所谓“死活”,全在学人之善参与否。读者明眼,庶几不负作者苦心。所谓“以意逆志”,意蕴相类。常州派说词曰:“作者未必然,读者何必不然。”这不仅与当世西方显学所谓接受美学、读者与作者眼界溶化、拆散结构主义有其相通之处,而且也正是史家向往的一种高超的治学境界。

从本文固有的特征看,历史著作与艺术作品一样,常常存在许多空白点,只有读者的积极填补,才能使之完整。就是说,史学本文不能传达出它的全部内容,只有在理解和解释中,才能变得丰富。从一定意义说,理解和释义制约着本文。本文在理解中诉说关于自己的事。没有理解者,它就表达不清楚自己。理解与本文、解释者与作者在各自敞开的视界中,实行一个溶合运动,共同来讲述历史。这种讲述,由于有本文制约,因而不是主观的;由于有主体介入,因而不是纯粹客观的。所以,对《史记》的理解,一个人一个样,向未来无限延伸。它们无所谓正确错误,只有不同和差异。《史记》不是一个被动的研究对象,而是一个无穷无尽的意义的源泉。《史记》和《史记》的研究者共同讲述《史记》的意义。所以,康德说他读柏拉图胜过柏拉图自己,那是不对的,因为他只能说与柏拉图不同。总之,正像艺术作品,历史著作也需要创造性阐释的“帮助”,没有这样“帮助”,它就不能完全表现自己。在此,对《史记》最成功的理解和解释,不是与司马迁一样,而是不一样。

举例说,史书中常常不仅有本义(Begriff),而且有涵义(Nebensinn, Stimmungsgehalt)。乾嘉学者从客观主义出发,教人识字,实则只能阐发本义,不能阐发涵义,

因为涵义有待创造性阐释来显现。再如,有的时候,史家在本文中注入他本人并未理解的不自觉的直观内容,只有创造性的解释,才能将其揭示出来,变为自觉,成为比原型更多的新本文。又如,史书中有一种“缄默不语”的情况,只有会心文外,才能明白;如无认识主体的积极介入,即不能理解。

如此说来,所谓“直”线式的求真、还原,实际上不能实现。德罗伊生曾说,客观性不是史家的最大光荣,他的合理性在于他试图去理解。到当代,人文学者的本文观早已与客观主义水火不相容。德里达的消解论完全否定意义绝对根源的存在,认为本文只是一个“无中心的系统”。穆卡诺夫斯基认为,一部文本印制成功,只是一个实在而无变化的物质成品,只有经过读者的想象加以扩充和具体化,才成其为审美客体。伊泽尔认为,本文必然具有未定性,是一种开放的呼唤结构。英伽顿认为本文有许多未定点,只有读者的想象补充,才能使之具体化,才能呈现一个完整丰富的世界。这些结论,不仅适合艺术作品,在一定程度上揭示出历史著作的特征,而且可在中国的禅宗里找到同调,对历史认识论颇多启发。

说到底,阅读、理解、解释、写作都是在“语言”中进行的。而语言,具有多义性、隐喻性、歧义性和可增生性等特点。这就注定了解释的必须。按照释义学(Hermeneutics)一词的意义,它表示使隐藏的东西显现出来,使不清楚的东西变得清楚。历史学家对史料的解释不能外此。但照海德格尔看,语言的本质是诗。或者如哈曼所说,诗是人类的母语,言语植根于生活的诗性。克罗齐认为,只要有认识活动,就必然有艺术活动。就是说,只要进行历史写作,就必然离不开诗、离不开艺术。中国史书修词中尚文派的存在,实有其必然性。至于它是否合理,是另一回事。当海德格尔、德里达、利科等人谈论思想的诗性和语言的隐喻性时,已包括历史认识,那实际上为尚文派的必然出现作了注脚。

况且,在海德格尔看来,历史本身就是艺术大师创造的艺术品!历史本身具有客观的美学属性,是尚文派存在的客观基础。这一点,甚至连兰克也无意中走漏了消息。他说:“真实的历史比虚构的小说要有趣味得多、要美得多。”这话实际上正是培根《新工具》中两段话的缩写:“自然的精微远较论辩的精微高出多少倍”。“自然的精微较之

感官和理解力的精微远远高出若干倍”。按他们的逻辑,只有采用相应的“有趣味”的、“美”的、“精微”的文字才能最大限度地表达这种“历史”或“自然”,才能尽可能使写作与对象相互统一。可是,他们却得出相反的结论。兰克接着说:“于是,我摒弃了小说,决心在我的著作里避免一切虚构和幻想而坚持写事实。”培根则说:“因此,人们所醉心的一切,像煞有介事的沉思、揣想和诠释等等,实如盲人摸象,离题甚远。”但同样从兰克和培根的前提出发,我们甚至可以说,史学史中的尚文派,不仅有其出现的必然性,而且还有其合理性了。

综上所述,中国史学中的尚质派理论对史学本文的关注,是以客观主义为基础,也以客观主义为特征。他们假定本文具有终极的意义和内在的中心,认为历史认识的本质就在于揭示这个意义或中心。为此,就必须有与之相适应的朴素的史学文体,就必须以客观主义的思想原则去写作,使得读者的理解反映为对史家写作原意的复归,所谓“还历史本来面目”。凡是符合客观主义的,就肯定;反之,则否定。他们已经认识到,“史文”与历史认识具有内在联系。史文运用得当,有助于历史认识;不当,则破坏历史认识。衡量“当”与“不当”的标准,就在于看其是否贯穿着客观主义原则。尚质派探讨史文问题的核心,就在于使史文运用“得当”而去其“不当”。为此,他们又从消极、积极两方面提出诸多见解,给予规定。消极方面,在理论上强烈批判各种华而不实的史学文风,对犯规的历史著作进行批判,抵制“文士著史”,等等;积极方面,倡导朴实无华的文风,主张直书其事,区别“史家之文”与“文士之文”,追求隶属于“笔”的那种不尚韵藻、朴素简洁的文体,以“正确”发挥史文的功能,从而保证对历史的客观、正确的认识。这种思想,在中国古代至当代的史学著作中均有反映。但是,在“诗的转向”的观照下,它的理论缺陷便充分暴露出来了。它不仅忽视了语言的隐喻性和多义性,而且也没有注意到史学本文的一些固有特性,更没有想到史家主体在理解、认识、解释、写作过程中的作用,甚至没有想到客观历史本身还具有审美的功能。总之,它所具有的缺陷,也正是客观主义所具有的,是客观主义所带来的必然结果。

三、史学的客观性

但是,我无意为尚文派的写作实践进行

辩护。不管它在理论上具有多少合理性和必然性，假如它违背“历史真实”原则，那就犯了根本性错误。也不管尚质派在理论上带有多少缺陷和不足，它对“历史真实”追求也值得肯定，不论历史学家能否达到历史的最终真实，“真实性”的原则和企图都不能放弃。就是说，科学的实事求是的企图不能放弃。历史学不论怎样富于诗性或离不开艺术性，但所表现出的客观性、公正性和科学性，都不容质疑。历史学毕竟不能完全归结为主体的外化，毕竟要受史料限制，而史料毕竟有其客观内容。历史学的客观性可以减之又减，但最终不能化为零，这是中西史学史昭示的不争事实。而且，从认识论、方法论角度看，也不能完全否定历史学包含的客观内容。关于此点，不要说世界上众多史学家坚信不疑，就是许多人文化倾向极明显的思想家，也不予怀疑。

胡塞尔《欧洲科学危机和超验现象学》一书曾经提出，科学的客观主义，近代的甚至数千年以来的所有客观主义，向超验的主观主义的转变，是现代西方最伟大的变革。他提出的“走向事物本身”、“加括号”、“悬搁”等现象学方法均为海德格尔等人吸收。但胡塞尔最终没有抛弃理性和科学。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对“计量史学”等科学方法更是充满乐观情绪。他一上来就宣判了“历史主义”的死刑，说它随着“新唯心主义历史学最后一位大师”迈纳克的去世而于1954年终结了。他采用历史主义这个招惹是非的字眼，不是波普尔《历史主义贫困》那个意义上的，而是指新康德学派影响于史学所形成的那种思潮，尽管巴教授过于乐观了些，但毕竟用事实表明了历史学所具备的客观内容。

历史学与自然科学有其相统一的方面。历史研究可以有条件地运用某些自然科学的规则与方法。对此，某些人文学者同样不予否认。卡西尔就说过，史学家在探讨真理时像科学家一样受制于同样的形式规则。知识的各种形式总是显示出内在的统一性和逻辑的同质性。历史思想与科学思想并不是靠它们的逻辑形式而是靠它们的对象与题材而被区分的。他的话印证了巴勒克拉夫的断语：“历史研究之所以会出现革命性的进

步，根本原因是科学的宇宙观对新一代历史学家产生的影响。”但巴氏显然忽略了史学科学性之外的文学方面。

从根本上讲，我们有理由像斯图尔特·休斯那样为史学的“中庸特征”，即半是科学半是艺术的性质而感到自豪，但没有理由用史学的这只手去打那只手。历史学确实从未与文学的思考方式完全分开。主张历史学作为一门艺术的罗素，也承认“历史必须由忠于事实的企图来支配，不管它在多大程度上可以作为艺术来从事研究。”科林伍德也限定史学“是受条件（真实）制约的艺术”，要“服从于历史的目的”。卡西尔更曾论述，历史思想的拟人性并没有对它的客观真理构成任何限制或妨碍；同时，伟大的史学家并不缺乏诗人的精神。

显然，即使从最消极的意义讲，历史学也首先是一门科学，但不是伯里所谓“不多也不少”的科学，而是雅各布·布克哈特所谓“一切科学中最不科学的学问”。因此，历史研究既需要采用理性、科学、实证主义的方法，实验观察、推理分析和逻辑归纳的方法，使用事实、规律、原因等概念，也需要运用人道、人性、人格、价值、公正、命运、自由意志等概念；既像自然科学、社会科学那样突出理性，构建抽象体系和一般规律，从多样性和特殊性走向统一性、一致性、简单性和必然性，也应像文学那样突出想象和情感，突出独特性、意外性、复杂性和创造性，突出主体意识以及价值判断与取向的特征，体现审美精神。二者应该实行有机的整合。

史无定法、定式。尚质派也好，尚文派也罢，均各有利弊，一种是理论上的，一种是实践中的。真正的历史学应该是它们两家的和谐联姻。那样，“情欲信、辞欲巧”的理想才能实现。

（1995年4月，德国海德堡大学汉学系主办“中国史学史国际研讨会：从比较观点出发”，该文是笔者向会议所提交论文结尾部分的提要，前面部分发表在北京大学《学人》丛刊第八辑）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
责任编辑：郭林

明代亚洲外国官生在华

留学及科举考试状况探议

□黄明光

明太祖朱元璋建国以后,为集中精力处理国内矛盾,发展生产,在对外关系上基本采取了“和平相处”方针。永乐年间,明成祖又派遣郑和下西洋,出使亚、非部分国家,促进了中国同这些国家的经济、文化的交流。明朝初期社会的安定、经济的发展,加之朝廷友好的外交政策,使得亚洲部分国家派遣使者至京师朝贡,谱写了中外关系史上的又一新篇章。当今学者对明代中国与外国关系的研究,在政治、经济贸易方面撰文颇多,然于文化方面,特别是在教育方面尤少。笔者不自量力,撰写此文,希补其遗缺,亦望起“抛砖引玉”之效。

一、外国官生就读国学简况

亚洲部分国家学生入华留学,早在唐宋时期已有,至元代,由于战乱及蒙古贵族的统治,留学一事稀见青史。明代外国官生复至,是唐宋之后的又一高潮,究其原因有:

第一,中国的儒家文化、教育制度自唐宋之后,对亚洲各国产生了极大影响,亚洲各国无不“感慕华风”,部分国家便派遣学生来华留学。

中国的儒家文化,在元代时渗透到亚洲一些国家的平民百姓中。真腊(今柬埔寨)人称当地儒家知识分子为“班诘”。①交趾(今越南)元代时民间已有从事儒学教学的老师,诵读儒家经书已普遍可见,中国宋代

理学大师朱熹的“性理”之学也散布于民间。与儒学传播的同时,中国的教育制度及办学形式也被亚洲一些国家模仿。在外国国王看来,中国“论文有孔、孟道德之文章,论武有孙、吴韬略之兵法。”故“感慕华风”,向往中国的文化。派遣官生至明朝京师留学,正是亚洲各国国王“感慕华风”,向往中国文化的一种实际行动。

第二,明代亚洲部分国家派遣官生来华留学,是唐宋时期这些国家文化政策的进一步发展和继续。

远在唐代,长安的国子学和太学就有高丽、百济、新罗(均属今朝鲜)和日本等国的留学生在校学习。唐代是亚洲部分国家的留学生人数众多、规模较大的一个时期。以新罗为例,公元840年(唐文宗开成五年),学成归国的留学生一次就达一百零五人。亚洲部分国家的留学生回国后,在政治、文化各方面起了重要作用。亚洲各国的国王都感到:派遣官生到华留学,是培养高级人才的一条重要途径。沿袭派遣留学生的政策,也就成为一些国家国王的为政之道。

第三,国家间的经济、文化交流,迫切需要外交人才,这也是明代亚洲一些国家派遣官生来华学习的一个原因。

明政权建立以后,社会安定,经济发达,又注重同亚洲各国的友好关系。因此,使得日本、朝鲜、占城(今属越南)、暹罗(今泰国)等国经常派遣使者来华联系。国际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增多,就需要兼通两

国文化、艺术的人才。

总之,外国官生来华留学,既反映了当时中国同这些国家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密切联系,也是进一步发展国家间友好关系的需要。

(1) 外国留学生的国别、人数、身份和性别。

国别:据《明会典》、《明史》以及其它史书记载,明代亚洲派遣留学生来华学习的国家有日本、琉球(今属日本)、暹罗(今泰国)、高丽(今朝鲜)、占城等。

人数:明代外国留学生的人数与规模,不及唐代。在亚洲各国中,琉球派遣留学人数最多,以《明史》中《外国传》的记载而言,琉球国中山、山南和山北王先后共派遣留学生11次,史书明文载有人数约计35人。而高丽、暹罗、日本各为一次,就每次规模而论,一般为三五人居多,最多时达到十余人。

身份:明代来华学习的外国官生中,有四类人。一类是外国国王的长子或从子。二类是大臣如国相和一般大臣的子弟。一般大臣子弟,在《明史·外国志》中记作“寨官子”或“陪臣子”。第三类是使臣。来华留学者一般事先有所准备,但也有临时确定的,这类人即是出使的使者。第四类人是外国官生。这类人是该国学习优秀的在校生,但人数不多。

以上四类留学人员中,以国王大臣子弟居多,其他各类人员均较少。

性别:明代外国官生较之其他朝代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有女性外国学生。《明史·琉球传》记,洪武年间,琉球中山王“遣寨官子二人及女官生姑、鲁妹二人,先后来肄业,其感慕华风至此。”此事在明人沈德符《万历野获编》中亦有叙述。这说明明代外国留学生的教育比前代有所发展。

(2) 外国留学生的留学地点、待遇、学制及管理措施。

外国留学生到华后,其学习情况及管理制度在《明会典》、《明史》及其他史书中均无专门或明确记载,现仅据分散的史料叙述如下:

留学地点:亚洲一些国家的留学生来华后,被分配在北京国子监和南京国子监学习。明太祖于至正二十五年(1365)改应天府学为国子学。建都南京后,在鸡鸣山下建立国子监。据此,洪武年间来华留学的外国学生当在南京学习。明成祖迁都北京后,于永乐十九年(1412),以北京国子监为京师国子监,于是明代有南北国子监之分。永乐以后来华的外国学生,一般在北京留学,但也有在南京国子监学习的。笔者所见有三例:成化十八年(1482),琉球国中山王尚真派遣蔡宾等五人来华,入南京国子监读书。②正德五年(1510),琉球国官生蔡进等五人,万历八年(1580),琉球中山王派遣陪臣子三人,均入南京国子监学习。③

待遇:明代皇帝十分重视接待外国留学生,把它看作是外交政策的一个组成部分。明成祖认为外国留学生系“慕义而来”,不可轻待,务使其“衣食常充,然后向学”。④待遇分三个方面:一是免费提供留学生食宿。二是由官府赏给日常穿戴的衣物。有皮衣、纹帐、被褥、鞋袜等,并成为定制。三是给留学生随从人员衣物。《明会典》也将给从人衣服作为定制记载。所有这些都表明,与唐代相比,明代对外国留学生的待遇要高。永乐三年(1405),明廷礼部尚书吕震称:“昔日唐太宗兴庠序,新罗、百济并遣子来学。尔时仅给糜飧,未若今日赐予之周也”。⑤

学制:明代国子监学生,须在“正义”、“崇志”、“广业”三堂学习一年半之后,又入“修道”、“诚心”二堂学习一年半以上,再入“率性”堂学习一年,合计四年以上。外国留学生的学习年限,史无明文记载,据笔者所见史料分析,似乎亦在四年以上。洪武二十九年,琉球国使者来华,“先是其国山南王,遣其姓三五郎等,及寨官之子麻奢里等,入太学,既三年归省。至是复与贡使善佳古耶等来,乞使入学,许之”。⑥成化十八年(1482),琉球国官生蔡宾等五人来华留学,至二十二年三月回国省亲,留学已达三年。据此两条史料,知其留学三年后归回本国探亲,然后再来华学习,故其学制应

依明制为四年以上。相比之下,唐代外国学生在华时间比明代长。如日本留学生橘免势、空海,在华学习长达二十余年。唐代外国留学生毕业后,又在中国各地游历或继续研究汉学,这一情况在明代未见。以此分析,知明代对外国留学生在华学习的时间和活动管理较唐代更为严格。

管理措施:明政府在留学生的管理上,首先本着“自愿入学”的原则,挑选那些“为父兄者果愿遣子弟入学,为子弟者果听父兄之命”的子弟,在“无所勉强”的情况下,才可“遣使护送至京”。⑦对“自愿入学”的外国留学生,基本上依据明朝的国子监管理制度进行管理。明代国子监订有“监规”,对毁辱师长,非议政事或诰书者,要处杖刑充军,重则施以死刑。对外国留学生的管理也是如此。同时,明朝廷还对外国留学生实行严格的探亲假制度,其目的在于使外国留学生知明朝廷“怀柔之义”。

明政府对教授外国留学生的教师,也有一套严格的管理制度。禁止教师私下接受外国留学生的礼物,便是其中一条措施。明人焦竑《玉堂丛语》卷二载,教师刘宣在国子监教授琉球国学生,认真负责,留学生们“厚贽金以献者再”,以表谢意,而刘宣不受。后外国学生将此事奏报皇上,刘宣在皇帝的命令下才敢收下。

明朝在接受外国留学生的同时,为促进同亚洲各国的文化交流,还采取下列一些措施来推动中国教育思想及制度的传播。一是让外国使者参观京城国子学、太学。二是赏赐外国使者大量中国书籍、教材,以帮助其它国家儒学教育的发展。洪武二年,明太祖赐高丽使者《六经》、《四书》、《通鑑》。永乐二年,赐暹罗使者“列女传百册”。五年,赐日本使者仁孝皇后编《劝善》、《内训》两书各百本。宣德八年,赐高丽王使《五经》、《四书》、《性理》、《通鑑纲目》等书。⑧

二、外国学生参加中国科举考试简况

在封建社会,入校学习与参加科举考试之间有着必然的联系,即所谓“科举必由学

校”。明代外国学生也有来华参加科举考试之人。

外国学生来华参加科举考试,始于洪武年间。洪武三年(1370),明太祖遣使臣前往占城、安南(均属今越南)、高丽等国,“颁科举诏”。

与留学相比,参加中国科举考试的外国国家数量较少,仅有占城、安南、高丽三国学生参加。洪武初年,朱元璋对外国下的科举诏令,亦仅传至这三个国家。这就使得外国人参加科举考试的范围具有局限性。

明代外国人来华参加科举考试,具有三个特点:一是只参加京城会试,不参加中国的乡试。洪武三年皇帝的诏书云:“高丽国、安南国、占城等国如有经明行修之士,各就本国乡试,贡赴京师会试”。其诏书规定各国乡试及格者,方可入京师会试。二是外国人参加科举考试,不受名额的限制。明制,各省赴京会试人数有定额。为了体现朝廷对外国考生的优待,洪武三年诏令规定对高丽、占城、安南等国的入考者“不拘额数选取。”洪熙元年曾一度定贵州与交趾贡额共为十名,⑨后又取消。三是外国人在华参加会试中进士后,明朝廷即授与官职。洪武四年辛亥科三甲第五名金涛,高丽国延安县人,被授官山东东昌府安丘县丞。景泰五年甲戌科进士阮勤,交趾多翼县人,在明朝做官至工部左侍郎。嘉靖二年癸未科进士陈儒,亦交趾人,在华做官至右都御史。⑩

三、外国官生来华留学和参加科举考试的作用及其影响

外国官生来华留学及参加科举考试,不仅加强了中国同亚洲一些国家的友好往来,密切了国际间的交流,也促进了亚洲部分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和教育的发展。现仅就以下几方面简述。

1. 有利于这些国家形成崇尚读书,人人学习,讲究礼义的社会风气。

以朝鲜为例,当时的高丽国由于经常派遣使者或留学生来华,沟通了两国文化。较

为先进的中国文化传入该国后,深受平民喜爱。高丽国民都希望有一本中国书籍。明姜绍书《韵石斋笔谈》卷上云:“朝鲜人最好书,凡使臣入贡,五六十人,或旧典,或新书,或稗官小说,在彼所缺者,日出市中,各写书目,逢人遍问,不惜重值购回。”万历四十三年(1615),高丽使者到京,就在市上购了《吾学编》、《弁山堂别集》等书。高丽人喜爱中国书籍,并在高丽模仿中国印版进行翻印。书籍的普及,有利于教育的普及和良好社会风气的形成。明代的琉球国派遣女官生来华留学,说明当地文化、教育较为普及,民间读书人数增多。连明代万历年间人沈德符也不无感叹地说:“本国外朝如朝鲜,号知诗书者,间游国学,或至登第,然未闻妇人亦来中国诵读,向慕华风至此,真史策少见”。^①

2. 推动了亚洲部分国家文化教育的发展。

琉球国在明代频频遣使入学中国,使琉球这个“俗无文字”的国家,“始陈奏表章,著作篇什,有华风焉”。^②

朝鲜由于受中华文化的影响,在国内形成了退溪李滉、栗谷李珥、花溪徐敬德、晦斋李彦迪、南溟曹植等若干家16世纪的朝鲜朱子学派大师。在教育方面,朝鲜在16世纪时,国内的教育组织形式由原来的乡校、留乡所、司马所,逐步过渡到中国式的“书院”。16世纪末,全朝鲜的书院已达100余

所。^③此外,高丽国在元朝、明朝已学习中国,在国学内实行“积分法”,学生以“六分积十四分以上,许直赴终场,不拘其额”。

^④

在暹罗国,永乐二年使者曾至明朝京师,带回了中国的量衡式和古今烈女传等书籍。其后使者未断。由于中国文化的影响,当地人知道中国为“礼义之国”,故“礼华人甚挚信于他夷,真慕义之国也”。^⑤

^①元周达观《真腊风土记》,四库全书本第594册,第57页。

^{②⑦}明俞汝《礼部志稿》卷九十二,四库全书本第598册,第675、676页。

^{③④⑤}《明史》卷三二三,《琉球传》,第8367、8368、8363页。

^{⑥⑩}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三〇。

^⑧《明史·外国传》

^⑨明谈迁《枣林闲俎·圣集》科牍类。

^⑩明王世贞《弁山堂别集》卷十八。

^⑫明张瀚《松窗梦语》卷三。

^⑬参见《朝鲜通史》,朝鲜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196页。

^⑭明徐树丕《识小录》卷一。

^⑮明张燮《东西洋考》卷二,四库全书本第594册,第160页。

作者单位:广西师大教育系
责任编辑:郭林

1903:梁启超的 国家学说和经济构想

□李喜所

1903年前后,梁启超30岁左右,思想相对成熟,创作欲也极其旺盛,发表了一系列颇有见地的论著,形成了自己的学术风格和政治个性,成为清末中国政界和文坛的一颗璀璨的新星。全面论述这一时期梁启超自立的过程及其文化结构是很困难的,这里仅就梁兴趣较浓的国家学说和经济体制进行简要的历史评说。

一、国家学说

梁启超一向视国家学说为政治学的核心和政治文化的支柱。他的政治文化建树虽说是以欧美的资产阶级进化论和天赋人权论为思想指导,但研究最具体而深入的是国家学说。在他看来,资产阶级的国家学说是历史的一大进步,反映了社会前进的步伐。他在《立宪法议》一文中指出:“抑今日之世界,实专制、立宪两政体新陈嬗代之时也。按之公理,凡两种反比例之事物相嬗代必有争,争则旧者必败,而新者必胜。故地球各国,必一切同归于立宪而后已,此理势所必至也。”^①从这种历史演进的必胜的认识出发,梁启超刻苦研究并大力宣传西方的政治学理论和国家制度,1903年前后发表的有关的论文不下20篇。在梁启超的笔下,立宪政治反映了人类争自由、求发展的本质,是天赋人权论的具体体现。为构筑自由为体、智慧为用的政治文化,他从三个大的方面进行了较全面的论述。

首先,国家是公有的。

戊戌时期,梁启超已提出了国家公有论,但没有进行系统的论述。1903年前后,他结合西方资产阶级的国家学说,在不少文章中反复强调国家的公有性,人民的决定

性,并鞭笞“父传子家天下”的反动性。他明确指出:“一国之土地,一国人所公有也。无论何人,不得以私诸一己。”^②他曾系统研究了国家思想变迁的历史,发表了《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将古代、近代,中国、欧洲在国家问题上观念的演变作了透彻的说明,结论是:古代是家族主义、酋长主义、帝国主义时代,近代是民族主义、国家公有主义时代,国家由私有向公有的转化是任何人都无法阻挡的。从这种思想指导出发,梁启超有力地批判了“私天下”的思想理论体系,抨击清政府的封建独裁。他写的《拟讨专制政体檄》,列举了专制政体的十大罪状,号召人们奋力讨伐。他发表的《中国积弱溯源论》,拨之历史,着眼现实,旁征博引,历数了“私天下”给中国带来的祸患,指明了“公天下”的历史必然。梁启超把帝王视为“民贼”,认为一部24史,就是“民贼”之间的争夺史,又是他们保存自己“私天下”的卑劣史。梁启超指出,这些“民贼”为了保守自己的“产业”,“盖其治理之成绩有三,愚其民,柔其民,涣其民是也。”^③如此尖刻的抨击,表明梁启超迫切希望中国变“私有”为公有、变专制为民主。为了保证国家的公有性,梁启超还特意写了《论政府与人民之权限》,把政府和人民视作国家的两个基本的组成部分,政府可以更迭,人民可以变迁,而国家的超然的“公有”不能改变。他认为,“天下未有无人民而可称之为国家者,亦未有无政府而可称之为国家者,政府与人民,皆构造国家之要具也。故谓政府为人民所有也不可,谓人民为政府所有也尤不可,盖政府、人民之上,别有所谓人格之国家者,以团之统之。国家握独一无二最高之主权,而政府、人民生息于其下者也。”^④

这里把国家在公有前提之下“人格化”、神圣化,自然是为了说明国家的卓然独立性和公有性。此论一出,“家天下”的国家理论不攻自破,专制独裁亦变为反动,中国封建的国家观念从根本上动摇了。

其次,国家是公理的。

从“公天下”的理论出发,梁启超认为国家应是“公理”的象征,而不是个人意志的体现。具体讲则是国家应是法制的,讲道理的,而不是随意的。体现国家意志的是法,而不是个别“英雄”人物。法是国家的意志,是人与人平等的根本保证。有了这个法,国家就有元气,人民就能争取平等。这个体现国家公理和意志的大法是什么呢?梁启超的回答是,“宪法”。“宪法者何物也?立万世不易之宪典,而一国之人,无论为君主、为官吏、为人民,皆共守之者也,为国家一切法度之根源。此后无论出何令,更何法,百变而不许离其宗者也。宪法者,一国之元气也。”^⑤梁启超眼中的宪法不仅是左右一国面貌的指挥棒,而且是民权的集中体现。由宪法来代表民意,由民权来制约宪法。如果有了民权左右下的宪法,一可杜绝为争皇权而造成的社会大动乱,改变中国数千年历史所反复出现的“一治一乱”,而达到长治久安;二可消除个人独裁,使民主参政成为现实,“人人皆可为尧舜”;三可充分发挥各级官吏的才华,集思广益,为国献策,充满活力;四可使国家有统一意志,统一行动,统一秩序;五可开发全民智力,人才辈出,国民素质与日俱增。在梁启超看来,宪法是一国昌盛的灵丹妙药,有了它一切皆生机勃勃;没有它,国家就一天不如一天。用这种思想认识绳之以清廷,梁启超感到其衰败的根源就是没有像欧美发达国家那样有一部良好的宪法,以致皇帝专权,人民反对,各级官吏亦如木偶,无血无气,难以为国家效力。

这种批评,可谓入木三分。专制政体下的官吏,由于无宪法可依,唯皇帝之命是从,当然如“死物”,毫无生气。但是,有了宪法,是否能从根本上解决类似的许许多多的问题,确也未必。梁启超关于以宪法为纲达到公理的、法制的国家的设想是美好的、积极的、进步的,但也带有几分书生气。梁启超留给后人的仅是实现公理的国家愿望。

第三,国家是共和的。

何为国家?梁启超曰:“有土地、人民立于大地者谓之国。”^⑥何为政府?“代民以任君治者也。”何为政府之组织原理?“在民约。人非群则不能使内界发达,人非群则不能与外界竞争,故一面为独立自营之个人,一面为通力合作之群体。”^⑦这种以“民约”为基础所组织的政府就是梁启超所追求的共和制。梁启超认为共和制是当时世界上最美好的政府组织,至少有5大优点:一、养成国民之自觉心,使人自知其权利义务,且重名誉也;二、使人民知人道之可贵,互相尊重其人格也;三、以选举良法,使秀俊之士,能各因其才以得高等之位,而因以奖励公民之竞争心也;四、凡有才能者,不论贫富贵贱,皆得自致通显,参掌政权,以致致力于国家也;五、利导人生之善性,使国民知识,可以自由发达,而幸福日增也。梁启超还把共和政体分为两类,一为民主立宪,一为君主立宪。他认为:“民主立宪政体,其施政之方略,变易太数,选举总统时,竞争太烈,于国家幸福,未尝不间有阻力。”而君主立宪政体,既保证了立法、行政、司法三权的顺利实施,又不致造成重大的社会动荡,“故君主立宪者,政体之最良者也。”^⑧至此,梁启超的政治文化追求落到了实处,即在中国实现君主立宪。

但是,梁启超的君主立宪式的共和制有两个前提条件:一是反对通过大革命的方式推翻旧的封建王朝,梦想用不流血的改良方法取得成功;二是通过教育广泛地提高国民素质,待民众达到作共和国民的资格之后,再建立共和制。如此设想未免不符合中国国情。长期的封建专制,使中国缺少民主和法制,政权的更迭基本上都是通过武装斗争来实现的,试图不用武装斗争来解决共和制代替封建制的重大历史转变,是绝对行不通的。中国民众在专制体制的压抑下,素质不高,离标准的共和国民有较大距离,但只能一边争民主,一边去提高,梁启超那种等民众提高了素质之后再争共和的设想是不现实的,不免带有儿童式的天真。在这两个大问题上,梁启超陷入了误区。梁启超以共和为核心的国家学说在理论上、学术上是上乘的、积极的,在实际推行中却是低水平的、消极的。

二、经济构想

1903年前后,梁启超陆续发表了《中国改革财政私案》、《生计学学说沿革小史》、《二十世纪之巨灵托辣斯》、《外资输入问题》、《中国货币问题》等,初步形成了以西方资产阶级的经济学理论去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新型文化思想,为一批注重经济学研究的青年学者所倾倒。

西方古典的经济学理论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已有零星的介绍,但真正研究者极少。中日甲午战争之后,随着严复翻译的《原富》等一批英国经济学论著的印行,一些学者才对政治经济学发生了兴趣。20世纪初年,不少青年潜心钻研,试图用新的经济学说去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鉴于勃兴期的不成熟状况,梁启超充分发挥其见识广、善提炼的优势,努力介绍西方的经济学理论(梁启超称之为生计学理论)。他根据英人英格廉(Ingran)、意大利人科莎(Cesa)和日本学者井上辰九郎所写的西方经济学史,编辑了《生计学学说沿革小史》,简明而较全面地介绍了欧美经济学说的发展历史和基本观点:

1. 经济学理论在西方的产生。梁启超认为经济学说产生于古希腊,主要散见于当时的政治、历史、哲学、法律等著作中,贡献最大的是希罗多德(Herodotus)、条斯大德(Thucydides)、柏拉图(Plato)、芝诺芬尼(Xenophon)、亚里士多德(Aristotle)等人。不过,那时的所谓经济学仅是一般地涉及商业、农业、货币、市场等,还未形成独立的经济学理论。从英国的亚当·斯密开始,经济学才形成一门完整的科学,其主要标志是《原富》一书的出版。

2. 经济学理论演变的历史。梁启超将亚当·斯密之前划为一大时期,这主要是第一阶段的上古生计学(希腊、罗马)、中古生计学,第二阶段的16世纪生计学、重商主义、17世纪生计学、18世纪上半期生计学、重农主义;亚当·斯密之后为第二大时期,有影响的学派有亚当·斯密派、非亚当·斯密派、新学派(历史派、国粹主义派)等。经济学理论发展过程中的特点、影响、各派的基本主张和优缺点,梁启超也有简略的概括和说明。

3. 重要的经济思潮。梁启超把评述西方

的各种经济思潮作为他传播资产阶级理论的重点。如17世纪出现的重商主义,梁启超着重分析了其出现的历史背景,主要观点和流派,实际作用和存在的问题,并结合中国的现状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再如18世纪兴起的重农主义,梁启超用较大篇幅论述其在法国产生的过程,分析代表人物的代表论著,考察重农主义的内涵和外延,评述其客观社会效果,历史地指出其积极的一面和消极的后果等。至于以亚当·斯密为旗手的资产阶级的自由经济学思潮,梁启超则反复加以评述,有关代表作品的主要章节都有详细介绍。

4. 最新经济学说。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经济的高度发展,出现了垄断资本主义集团,其主要标志就是托拉斯(trust)的大量产生。当时中国人并不知托拉斯为何物,对垄断经济理论也很陌生。梁启超则对此有一定的研究,发表了《二十世纪之巨灵托辣斯》,推进了人们对欧美最新经济学说的了解。梁启超深入浅出,议论风生,首先分析了托拉斯出现的社会经济背景,指出这是自由竞争高度发展后的一种“反动之过渡”,是资本家相互兼并的必然结果。接着,他又介绍了美国等国托拉斯集团的基本情况。然后,他论述了托拉斯的优点和缺点。总之,梁启超较客观、公正地分析了垄断资本主义的内涵和主要特征,使闭塞的中国思想界得到许多新的信息,新的学说。

值得一提的是,梁启超对西方经济学的介绍并不是简单的拿来主义,而是带有较多的创造性,而且善于用中国人所喜欢的语言深入浅出地表达出来,通俗易懂,一目了然。这自然经过了梁启超的深思熟虑。同时,梁启超关于欧美经济学说的文章,多加评述,叙中有论,论中有叙,掺杂了许多自己的看法。虽然还不能说梁启超当时对西方经济学已融会贯通,但基本掌握了其主要倾向。因此,梁启超介绍西方经济学说的过程也是自己独立创造新的经济文化的过程,尤其是在运用亚当·斯密的经济学说探讨中国的经济问题时提出了一系列的经济改革设想,大致完成了其经济文化构想。其要点是:

以竞争求发展。梁启超总的目标是在中

国建立新型的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体系,有广阔的市场,充足的劳动力,富有活力的民族工业、商业和近代化的农业,和世界沟通的外贸和各种技术合作。所有这一切,都要在平等、自由的竞争中取得。梁启超经济学主张的理论基础是英国近代自由竞争学说。对此,他曾有过详细的评说:

“百年以来,自由竞争(Free competition)一语,几为生计学家之金科玉律,故于国际之通商,自由也;于国内之交易,自由也;于生产、制造、贩卖种种营业,自由也;劳力以自由而勤动,资本家以自由而放资,上自政府,下及民间,凡一切生计政策,罔不出于自由。斯密氏所谓供求相济,任物自己,而二者常趋于平。此实自由竞争根本之理论也”。^①

梁启超虽然也多次指出自由竞争的种种弊端,但就总的倾向来看,尤其是就中国当时的现状去考虑问题,他是要将竞争的理论 and 运行机制引进中国,实现竞争制约下的资本主义经济体制。

合理利用外资。梁启超曾发表过一篇《外资输入问题》,针对当时大多数中国人对外资的困惑和忧虑,提出了较正确的看法。他认为,外资输入中国,有利亦有弊。利在补充中国资金短缺,促进财政周转,激发工商业的发展;弊在外人利用外资干涉中国内政,排挤中国民族工业,影响国民经济的独立发展。梁启超还研究了外资在中国演进的历史,论述了欧美、日本利用外资的方法,分析了外资和中国劳动力市场、土地、商品流通和工厂企业发展的关系。他的结论是,外资在中国出现的问题主要是政府引导不得力,不能制订出有力的政策,为我所用。如果能像欧美那样,“以本国公债券”,自由引进外资,将有无穷之好处。因此,梁启超的设想是首先创设一有能力有眼光的新政府,若国内资金足,则暂不引进外资,若资金困难,则大力引进。但资金“无国界”,想闭关绝市是不可能的,只能因势利导,合理使用。

建立银行制度。为了在中国建立合理的银行制度,梁启超介绍了欧美、日本的银行布局 and 内部运行机制,还提出中国政府除建立中央银行等国家银行外,应大力发展私人银行。为刺激私人办银行的积极性,要允许

其在“一定条件之下有发行钞币权。”与此相联系,梁启超提出要改革中国的货币制度。这主要是,货币发行以金本位制,根除货币混乱状况,掌握货币控制主动权。

进行财政改革。结合西方财政的变化情况,针对清廷所面临的严重问题,梁启超提出了一系列的财政改革方案。诸如改革田赋、变革盐税制度、慎重对待关税、发行公债、统一货币、划定中央和地方的财政权限等。他的基本思路是,国家愈进步,所需经费增加,而国家财源之大宗要在税收上作文章。他建议清政府增加一些税,裁掉一些税,同时争取对官地征税、国有森林征税、邮电和官办铁路征税。照此改革下去,梁初步测算,清廷的财政收入可由原来的1万3千万两增加到7万万两。梁启超的用意是好的,措施也是积极的。但清廷无法大力促进工商业发展,仅在税收上作文章,老百姓的负担不知要增加几倍。封建专制制度不从根本上改造,一切改革只能是越改越乱,捉襟见肘。在这方面,梁启超也曾想到了,但估计不足。民国初年他一度任财政总长时的窘况,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

从总体上看,梁启超的经济文化不及其政治文化那样成熟而有一定的深度,带有起步阶段那种随意、不协调和顾此失彼等缺陷。但是,他的经济构想新颖、深入浅出,又带有民族特色,生命力较强。1909年前后和民国初年他又进一步广泛而深入的进行研究,从而使他的经济思想逐步丰满和形成风格,在近百年经济文化发展史上占有较重要的历史地位。

①③《清议报》第81,第80期。

②《拟讨专制政体檄》,《梁启超选集》第381页。

④《新民丛报》第3期。

⑤⑥⑧《立宪法议》,《清议报》第81期。

⑦《论政府与人民之权限》,《新民丛报》第3期。

⑧《饮冰室合集·文集》第14,第35页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历史系
责任编辑:郭林

论岭南文化的近代精神

□陈胜彝

从鸦片战争开始的近代历史进程,使古老的中国传统文化遭遇到各种各样的挑战,由此开始了从传统向近代形态的曲折艰难的转型。与中国传统社会的嬗变在地域上首先从沿海口岸开始的特点相适应,对传统文化的挑战亦首先来自最先受到西潮浸润的沿海地区,新文化的因素在无情的挑战和悲壮的回应中悄然滋长、茁壮。实际上,若干富有特色的地方文化,启动了近代文化演变的开端进程。岭南地区以其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孕育了推动中国文化向近代形态转变的岭南近代文化精神。

本文着重从精英文化的层面,探讨近代岭南文化中引导了历史潮流的近代精神,也就是岭南近代文化精英所开创的中国近代爱国主义精神。

一、从“得风气之先”到“开风气之先”

岭南文化对近代中国历史进程的贡献,当首推其“开风气”之功。这种凝聚着一代又一代岭南文化精英巨大努力的文化成就,首先应归因于岭南地区“得风气之先”的历史机缘。

自汉代开始,岭南已是中国与外部世界相沟通的少数几个地区之一。唐宋时期,在广州进行的中外贸易获得长足发展,广州成为闻名于世的“海上丝绸之路”的始点。明朝后期,欧洲人开辟了在南地区新的贸易活动。到鸦片战争前,来自欧美的商人已取代了中国传统的贸易伙伴,主宰了中外贸

易,葡萄牙人甚至还通过种种手段盘踞澳门。在西方商人取得贸易进展的同时,自明末开始,一批又一批的天主教传教士来到中国,首先在广东沿海活动,想尽各种办法来推进“上帝的事业”。著名的耶稣会士罗明坚、利玛窦等,均在岭南多年从事传教及其他活动。清政府在鸦片战争前虽屡次明令限制并禁止传教士的活动,但广东一直是传教士隐匿出入之地。

西方各国在岭南地区进行的商业贸易和宗教活动,以及由此必然引起的中西交涉、法律冲突以及文化交往,无疑在岭南地区形成独特的社会文化因素,造成其他地区所不具备的文化心理氛围,从而对岭南地区在文化上构成一定的刺激。这是岭南地区“得风气之先”的一个不可忽略的重要层面。

西方传教士及其他人士的文化活动是更为直接的文化刺激。据有关统计,1811—1842年间,传教士在广州和澳门出版的中文报刊就达13种之多。此外,传教士在马六甲、巴达维亚、新加坡等地亦出版了大量中文书刊。这些地区虽不属岭南地区,但这些以中国读者为对象的出版物首先大量流入岭南地区。上述书刊多为宗教宣传品,但也有一些是介绍域外地理、各国历史等内容的书刊。西方人士还在广州、澳门等地出版大量外文书刊,如《广州纪事报》(1827)、《广州杂志》(1831)、《中国丛报》(1832)、《广州周报》(1835)等。这些中外文书刊,日后均成为岭南文化精英们开眼看世界的珍贵资料,并对他们起了可谓振聋发聩的功效。

鸦片战争前岭南地区已有不少人远涉重洋到异域谋生,远至南洋、非洲和欧美各地。1820年,由身历诸洋番国的谢清高口述、杨炳南笔录的《海录》在粤刊刻。这不仅是岭南文化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是岭南地区“得风气之先”的一个标志,也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件值得纪念的事。

上述种种事实表明,鸦片战争前岭南地区在接触域外文明、西方文化方面,确已“得风气之先”。

这种“得风气之先”的优势条件,使岭南文化具备了其他地区不能比拟的一笔丰厚的文化资源。不过,这种文化资源只有在近代历史发生剧变的背景下,在岭南文化首倡开眼看世界、向西方学习的历史潮流中,才能真正实现其价值。岭南文化适应时代的需要,将“得风气之先”的优势转化为“开风气之先”的精神,从而在近代文化演进的过程中实现了一次飞跃。

这个飞跃由林则徐首开其端。林则徐虽然只在岭南生活了两年,但这是他一生最辉煌的时期。他以杰出的贡献开创了岭南文化的新时代。他以爱国爱民的胸襟,坚持经世致用的立场,从抗英斗争的实际需要出发,摒弃盲目自大、“天朝上国”的虚骄心理,广开言路,组织人员翻译编纂中外文书刊,以了解西洋情事。在1839—1840年间,林则徐的努力使广州出现了一个“海外图说毕集”,所译书报“灿若星罗”的繁盛局面。广州成为当时中国人开眼看世界的活动中心。鸦片战争后,广东著名学者梁廷枏广泛收集资料,撰成优秀学术著作《海国四说》,向国人介绍英美等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情形。近代开眼看世界的代表性著作魏源的《海国图志》,也是继承林则徐的宏愿,以林氏编译的《四洲志》为基础,扩充而成的。由广东肇始的开眼看世界思潮,很快风靡中国思想界。

林则徐等人的开眼看世界活动,同在岭南地区“得风气之先”的基础上,积极寻求新知,从而在开创开眼看世界潮流的同时,使岭南地区继续保持“得风气之先”的优势地位。这一地位的巩固,又为岭南文化在新

的历史进程中继续“开风气之先”,提供坚实的基础。同样,岭南地区的文化精英在倡导新的时代思潮时,亦能利用岭南文化的既有成果,广求新知,从而为岭南文化迈向新的历史阶段创造条件。于是出现了由“得风气之先”到“开风气之先”的不断循环。这是文化史演进中难能可贵的良性循环。

近代明确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著名口号的是魏源,以实际行动迈开了学习西方的第一步的是林则徐,他在向西方学习历程中的第一个飞跃——由学习西方军事、器物跃进到学习西方政制的历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新一代岭南文化杰出人物在接触、吸收西学方面继续走在时代的前列,并提出种种改革中国的措施、方案。原籍广东香山的容闳,为最早赴美留学的学生之一,回国后怀着真诚的爱国热情,提出种种改革中国的方案,在近代知识界、思想界长期享有崇高声誉。接受西式教育,长期在香港活动的广东知识分子何启、胡礼垣,在其著作《新政论议》中明确提出开设议院的主张。著名改良主义思想家、香山人郑观应,在其名著《盛世危言》中系统阐述“立议院、达民情”以“张国威、御外侮”的思想。凡此均是挟“得风气之先”之优势而“开风气之先”的典型例证。

随着历史前进的脚步,对中国进行彻底改革的政治诉求被付诸实际行动。清末维新运动的领袖康有为、梁启超和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都是广东人。康、梁站在新的历史高度,审视西方文化,透过表象直指西学的内核。他们对西学的追寻和推介,将岭南文化“得风气之先”的内涵提升到新的层次。由他们领导的近代第一次文化启蒙运动——维新运动,对封建制度、文化发出公开挑战,以巨大的冲击波震撼了犹在沉睡的国人,唤醒了一代爱国青年去投身救国救民的悲壮事业,从而又将岭南文化“开风气之先”的内涵提升到新的高度。

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在童稚之年远赴檀香山求学,归国后又在广州、香港受西方文化的薰习,成长为一位怀着崇高的爱国理想,坚韧不拔,不屈不挠的革命者。在

他充满曲折的一生中,始终坚持以西方文化的精粹——自由、平等、博爱、民主共和的理想引导中国文化的新方向。岭南文化的进取精神再次得到升华。

在政治变革尚在重重阻力之中蹒跚徘徊之际,思想家们又以深邃的目光检视阻力的文化根源,开始思考“人的近代化”这一新课题。在初期,关于人的近代化的理念是以西方文化人格为蓝本的。辛亥革命前,梁启超是鼓吹重塑国民、改造民性的主要思想家之一。在他的宣传鼓动下,20世纪初年的中国思想界,出现一个蔚为壮观的批判封建文化人格、“铸造新国民”的时代思潮。这是近代岭南文化开创新风的又一个崭新层次。

这些事实表明,由“得风气之先”而“开风气之先”,作为岭南文化的一种独特的文化精神,贯穿在近代岭南文化发展的过程之中。岭南文化能在近代为中国的进步作出不容忽视也不容低估的贡献,应首先归因于这种文化精神的不断发扬。特别是由“得风气之先”到“开风气之先”的不断向上的良性循环。

二、调适情感与理性的冲突

从现代的观点看,近代中国人面对西方双重挑战,学习“先进的西方”以反抗“侵略的西方”,是理所当然的选择,但这种选择是极为艰难的。西方世界对近代中国来说具有双重性,一方面它是进步、先进的象征,几乎在所有方面值得中国师法;另一方面它又是不可饶恕的侵略者,其肆无忌惮的侵略行径使中华民族面临空前的民族危机。“先进的西方”带着“侵略的西方”的魅影,呈现在国人面前。人们有理由怀着爱国的情感憎恨那个“侵略的西方”,但这种憎恨容易导向对西方文化的排拒。人们也有理由怀着理性的价值判断学习“先进的西方”,但如果丢掉学习西方的本来目的,以“西化”为最终目的,便滑向盲目的西化。在近代史的前期,对西方文化的笼统抗拒经常与憎恨西方的情感因素混杂在一起,而清末民初逐渐

高涨的全盘西化声浪,则经常以理性思考的面目出现。这样,就需要有一种健全的文化精神来调适必然产生的情感与理性的冲突,清楚地辨别“先进的西方”与“侵略的西方”两种因素,以爱国爱民的情感为基础,形成自觉选择历史的理性。

我们选取林则徐、康有为、孙中山这三位开拓近代岭南文化的杰出代表,从他们的文化人格中可以发现上述这种调适情感与理性冲突的健全的文化精神。

当林则徐初到广东之时,他对远涉重洋而来的“夷人”尚无足够的认识。但他很快以一个爱国者的敏感,认识到鸦片问题关乎国家命运、民族尊严。他坚持禁绝鸦片的立场,领导禁烟斗争;另一方面,林则徐又清醒认识到,中国在军事上已明显落后于西方,若仍不急起直追,其患不可胜言。他毅然抛开“天朝无所不有”的神话,以极大的勇气,带头睁开眼睛,冲破禁区,仿制洋船夷炮,广求“夷务”新知。在他的身上,体现了情感和理性和谐统一的精神境界,要比其他爱国者高出一筹。

在林则徐的时代,围绕向西方学习问题而产生的情感与理性的冲突虽然已经存在,但并未达到激烈尖锐的程度。鸦片战争后的历史发展使这种冲突日益明显,形成了观点迥异的不同阵营。到康有为的时代,调适情感与理性的冲突,超越文化心理上的障碍,已是一个走在时代前列的爱国者需首先解决的问题。在国权日益沦丧、民族危难日益深重的情形下,康有为一次又一次地向朝野上下大声疾呼,要求采法俄日,急谋变政,通过全面学习西方来避免亡国灭种之祸,并亲自导演了戊戌维新的悲壮历史剧。康有为始终怀着炽热的爱国情感向西方寻求真理,他将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转化为学习西方的内在动力。没有人能够怀疑他对“侵略的西方”怀有强烈的警惕愤恨之心,但他将这种理所当然的爱国情感化为师法“先进的西方”的历史自觉。情感和理性在这里不是矛盾对立的双方,而是互相支持,互为因果,统一于爱国救亡的时代主题。康有为以自己的思想与行动证明,在近代中国,只有科学

地调适情感与理性的冲突,才能拥有健全的情感与健全的理性,才能正确选择救国强国的道路。

孙中山的西方教育背景似乎可以使他在选择西方式的道路时较少受到情感因素的考验。他对革命事业的辩护也表明他遵循着西方的价值观。但实际上,近代的民族危机仍然是他革命思想和数十年不屈不挠的革命活动的主要背景。他已能够在观念上明确区分侵略的西方与先进的西方,决心师法后者以击败前者。“不忍亡国灭种”,是他矢志革命的主要出发点之一。在孙中山的晚年,他对帝国主义的本质有越来越深刻的认识,他这一时期的著作,满纸皆是对列强的抨击愤恨之辞,但他也始终坚持着从西方寻找真理,始终在努力完善他以西方思想为基础的学说体系——三民主义。他认为只有建立一个强大的民主共和国,才能战胜纠缠中国半个多世纪的梦魇——“侵略的西方”。在孙中山的精神世界中,爱国的情感与寻求真理的理性,已达到水乳交融之境。

上述三位影响近代中国历史进程的杰出代表,面临西方对近代中国的双重挑战,面对不可避免的情感与理性的冲突,他们所作的双重回应和双向调适,表明他们的爱国感情充满理性,他们的理性思考则以爱国的情感为基础。这就是岭南近代文化精英所开创的中国近代爱国主义精神的集中体现。岭南文化的这种近代精神,融化在中国近代文化发展的历程中,帮助和指导人们进行正确的文化抉择。

三、对传统的继承与重塑

近代岭南文化的另一引人瞩目之处在于,它在中外古今交汇之际,力图消解传统文化与近代精神的紧张,并获得一定意义上的成功。得到充分发展的成熟的中国古代传统文化必须吸纳新的文化因素才重获生机,但在其发生转型、迈向新途径之时,不可避免地要对新的文化因素加以排拒;同时,新文化的滋生发展,一方面需从传统文化的丰饶土壤中汲取养分,获得基础,一方面为了

生存空间而与传统文化发生对垒。于是,在精英文化的层面就出现了文化保守主义和全盘西化的倾向。这种情形,当然不利于中国文化的重建。梁启超指出,须将博大精深、灿烂蓬勃的中外优秀文化“一一撷其实,咀其华,融合而贯通焉。”(《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

这正表达了岭南文化的又一种优秀精神。岭南文化在近代的使命是要帮助造就一种“不中不西、即中即西”(梁启超语)的新文化,即是吸收以西学为主要内容的新的文化因素,对传统文化加以更新与重塑。由于这是历史健康发展必然产生的客观要求,把握着时代脉搏的岭南文化在历史迈入近代的门坎之际,便试图对传统与新文化的关系这一充满困惑的问题作出正确解答。当林则徐在广东从现实需要的角度谨慎地欢迎西方的物质文明时,他的全部文化禀赋却来自他对中国传统文化优秀部分的深刻理解和发挥。同样,太平天国的领袖们采用基督教的信仰外壳并提出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发展纲领时,他们声称反对的儒学及其他传统文化因素,仍在历史的表象背后操纵着这些来自两广的农村青年的心魂。

就近代文化发展的历程来看,上述两个事例的象征意义大于其实际意义。这说明了,要真正做到会通中西,熔铸古今,不是他们各自所代表的阶级所能承担的。只有到了近代资产阶级文化启蒙时期,对传统文化与新学新知的理性思考才显示近代文化确已发展到新阶段。经过早期改良主义者的酝酿,康有为终于自觉地以传统为基础,试图创造一个不中不西、超越古今中外的文化体系。他的思想体系以儒家今文经学为基础,兼采理学、佛学等内容,与西学相结合,吸取时代思潮的精华,形成庞大的文化构思。从他前期的著作《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等到《大同书》及其晚年的著作,无不深深烙刻着他以传统文化为基础发展新文化的努力印迹。康有为的文化努力中显示的一种矛盾可以典型地说明他与传统文化的关系。终其一生,儒学的奠基者孔子始终是康氏崇拜的偶像。而另一方面,孔子作为一

个文化符号,在他的著作中却按不同时期的需要被随心所欲地加以解释运用,使之适合于他不同层次、不同时期的理论构思。这一矛盾说明他既要依托于传统文化,又要超越传统,让传统为我所用,以建构新时期的文化形态。

如果说,康有为重塑孔子形象以适应其需要,说明了新文化潮流的不可抗拒性,那么,孙中山的思想历程,则表明了传统文化的张力。孙中山早年的经历使他的思想带有浓重的向往西方文明的色彩,尽管他从来都不是一个全盘西化论者。但辛亥革命后,孙中山长期在国内从事的革命斗争和国际形势的演变,使他领悟到传统文化的价值。在他晚年的思想中,在坚持吸收欧美近代优秀文明、扬弃中学过时糟粕的同时,又很明显地表现了钦慕传统文化的倾向,常以中国传统文化来抨击欧美文明。他批评西方以物质和武力为基础的文化是“霸道”的文化,中国以仁义道德为基础的文化才是“王道”的文化。这表明他在以西方的价值观发动、领导了一场民族、民主革命后,对中国传统文化转而采取亲和认同态度。传统文化成为他重新建构其三民主义学说体系的一个支柱。

同受近代岭南文化哺育的维新派与革命派,尽管在政治上始终南辕北辙,但在文化观念的层面则显示出趋同的特征。他们都有将西方民主主义与中国传统的民本主义相衔接的思想经历。他们也都在如何重建中国文化的问题上进行自觉的反省和构思,而且得出的结论惊人地一致。

融贯中西文化而重新建构的中国文化,将不是中西优秀文化的简单相加,而是在将其冶于一炉之后,创建出超越二者的最先进的新文明。岭南文化大师们的文化理想主义使他们注定要继承中外文化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力图超越所有的文化传统。当他们无法在现实中战胜传统的惰性时,他们仍不放弃圣

洁的理想。康有为和孙中山的大同学说正是他们超越传统的文化理想主义的典型。康有为在《大同书》中宣称,他的思想来自中西文化的一切优秀方面。《大同书》对所有社会制度的抨击表明他幻想在继承中西一切优秀文化传统的基础上超越一切既有的文明。无独有偶,孙中山论述其所持之主义,亦称“有因袭吾国固有之思想者,有规抚欧洲之学说事迹者,有吾所独见而创获者。”(《全集》(七),第60页)他提出超越三权分立原则的“五权宪法”,要在中国创建“驾欧迭美而为世界之冠”的头等共和国,更进而阐述走向大同社会的主张。他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演说辞,首次提出要使世界“渐趋于大同”,以后又多次论述天下一家、众生福乐的大同理想,相信“孔子之理想的大同世界,真能实现。”(《全集》(六),第36页)

取古今优秀传统而继承之,汇中西文化精理而融贯之,建构超越一切文化传统之上的、完美的新文化,是近代岭南文化的一种理想主义的内在精神。其实,这也是近代中国文化发展的基本精神的内在动力。

中国的近代是一个挣脱旧时代的桎梏而走向新生的时代,这个时代的发展需要并造就了富有近代气息的文化特性。上述岭南文化的精神正带有鲜明的近代性,这些文化精神可以当之无愧地被称为近代精神,可以当之无愧地称为——近代岭南文化精英开创的中国近代爱国主义精神。正是这种富有近代爱国主义精神的近代岭南文化,在中国近代史上,以非常积极的姿态参与了、并在很大程度上引导了中国文化的转型与演进。

(本文写作得到吴义雄同志的协助,谨此致谢)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历史系
责任编辑:郭林**

传统与现代交汇中的思考——第三次岭南文化研讨会综述

□丁希凌

由广东炎黄文化研究会和江门(五邑)炎黄文化研究会联合举办的第三次岭南文化研讨会于1995年10月20日至24日在江门市召开,与会专家、学者就岭南文化的一系列论题展开了热烈研讨。

一、爱国主义是维护我们国家和民族生存不息、奋发向上、强国兴邦的精神力量。所以,岭南文化中蕴含的爱国主义传统是这次研讨会上倍受关注的重点,不少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和侧面各抒己见,

第一,有的学者针对当今学术界对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的不同理解,强调了方法论在探讨岭南文化的爱国主义传统中的意义,认为首先对岭南文化的爱国主义传统要有一个科学的界定,否则,就无法把握广东近代以来的一系列反抗外来侵略斗争的性质以及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进步意义。

第二,从理论的高度,考察近代岭南文化爱国主义的发展过程,指出近代广东仁人志士在面临既有先进性、又具有侵略性的西方双重挑战面前,为了救亡图存,捍卫民族独立尊严,既坚持抵抗侵略的西方,又学习先进的西方,从“得风气之先”而“开风气之先”,从而谱写了岭南文化爱国主义传统新的一页。

第三,根据近代以来岭南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实际,概括了岭南文化近代爱国主义的时代特征和内涵。其特征是:从传统的“忧患意识”进入近代的“救亡图存”;从传统的“华夷之辨”进入近代的“民族主义”;从传统的“忠君报国”进入近代的“民主变革”;从传统的“经世致用”进入近代的“理想主义”。其内涵是:痛斥鸦片危害,主张严禁鸦片;抵抗外敌入侵,捍卫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面向世界,探索救国真理;以改革求富国强兵、救亡图存;进行民主革命,反对封建统治;创造物质和精神文化。

第四,探讨入粤人士对岭南文化爱国主义传统的积极影响和高扬,指出入粤人士大都是具有爱国思想的硕学鸿儒,开明志士,他们对岭南文化的爱

国主义传统的影响虽是多方面的,但从本质说,都是顺应历史潮流,有利于推动社会发展。所以,他们对岭南文化的爱国主义传统的积极影响表现于:推进国家统一,宏扬教化文明,坚持民族气节,促进社会繁荣。

第五,通过具体研讨岭南人民一系列反帝反封建斗争以及一大批爱国志士,热情讴歌岭南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充分肯定岭南人民维护祖国统一、抵抗外来侵略、反抗封建统治、热爱家乡的优良传统。

二、岭南特有的地理环境和自然环境,使它有史以来便与海外交往频繁,商业贸易发达。其商品经济意识与传统的“重农抑商”政策形成强烈的反差。所以,如何探讨和总结岭南文化中的商品经济观念,也是这次研讨会的热点之一。有的学者认为,岭南文化之所以在大一统的中原文化的控制下顽强地表现出自己的特色,根源在于它既有先天的商品经济基础,又有后天发展的诸多因素,在于商业社会的主角——商人顽强地以自己的意识形态冲击和改造根深蒂固的传统意识形态。不少学者则具体探讨了广东长盛不衰的海上交通与海上贸易和岭南文化商品意识的关系,注意商品意识的正负面影响,既肯定岭南文化商品意识积极作用的同时,也探求抑制其负面影响的方法和途径。

三、关于岭南文化与近现代科技问题。与会专家学者,以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审视岭南科技发展成就。认为明清以来,岭南人民确实最早学习、模仿和研究近代西方科技,并为我所用,创办了一批具有近代意义和采用近代先进技术的企业,并涌现了一大批成就卓著的近代科学家。此外,学者们突破以往只侧重于明清时期、尤其是近代科技的研究,把视野扩展到广东各个历史时期的科技文化,详细介绍了秦汉以来广东重大的科技成就,建议深入研究岭南科技史。

此外,这次研讨会还对陈白沙思想以及岭南宗教文化、南雄珠玑巷迁民、岭南的藏书刻书业等作了具体的探讨。

文学史涉及到文学与历史两大领域,学界对该学科的定位有分歧。焦点在于,“‘文学’‘史’究竟是文学作品一种集结展现的方式,亦或是史学论述的一项分支?”^①表面看来,这只是言说者之间立场的差异,而实质上,这是文学史学科本身蕴含的矛盾二重性的一种反映。

作为文学,文学史所列对象都涉及到审美问题,它是一种共时序列;作为历史,文学史又是一种有着编年性质的历时序列。其文学的一面,强调文学审美活动在各时代、各社会间的相互碰撞,其作用的机制是断裂的,即并不存在一个统一的文学目标,文学史不是人们审美活动的线性进化的历程。其历史的一面,又不能不强调文学发展的承继性和在承继基础上进行的新创造。由于文学史研究涉及到这样矛盾的两个方面,所以,文学史的学科构架就蕴含了延续与断裂的双重构造。

一、断裂中的延续

文学史叙述的是文学的形成、发展、演化过程的历史。法国文论家色诺波(Xénopl)曾指出,自然科学研讨“重复的事实”,即在对个别事物的研究中探讨出可以概括到同类许多事物的普遍属性,某甲上适用的规律,到了某乙、某丙后也仍能适用。所以,一个科学公式具有普遍的有效性。反之,人文科学研讨“延续的事实”,前一事件、前一事物中体现出的性质和意义,到了后一事物就不一定也有同样的性质和意义。文学史所说的东西就是这样——一个延续的事实。这种延续有两层含义,其一是指事件发生发展的前后相继的过程,其二则是与“重复的事实”相对的意思,即它的讲述对象,后来者并不是前驱者的简单重复。每一事实中都可能蕴含了新因素,都可能体现出新意义。

文学史所述的事件本身是前后相继的,

而且这种相继很大程度上还体现了前代对于后代的影响,有着很强的因果关系。但是,后代在接受了前代的文学的影响的同时,也会有着对于前代文学的反拨和创新。在一些极端的状况下,文学发展体现为一种革命性的变化,如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对中世纪文学的挑战,19世纪浪漫主义对古典主义的批评,以及中国“五四”后的新文学对古典文学传统的抨击,等等。这样,就有一个文学史叙述框架的立足点问题。在长时段的发展背景上,文学史当然应该跟踪、追寻发展的轨迹,但同时它又会以一个基本的立足点来讲述这些变化。这样,就会存在一个悖论:文学史讲述的是文学活动的延续过程,它包含古代作品在后来的新作用和意义,包括后来的文学活动比早先的文学活动有了什么新变化等,同时,由于不同时代的文学观念会有变化,如同在同一视点观看发展过程,就会显示出不同时代的文学、美学观念的断裂。

对于这个矛盾,韦勒克采取一种非历史的立场,他认为:“文学研究不同于历史研究,它必须研究的不是文献,而是具有永久价值的文学作品。一个历史学家必须在目击或叙述的基础上再现过去很久的事件,而文学研究者却与之不同,他直接接触他的对象:艺术作品。”^②在这一理论观点看来,文学史中不同时代的作品虽然创作于不同年代,但它们作为文学作品却是同一的,文学史研究应该把握

它们的文学性的一面。在这里,历史本身退隐到了一个背景的地位。文学史在这时只是将历史作为各个时期的文学归档的尺度。

与此相反,美国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家弗·杰姆逊在其重要著作《政治无意识——叙事作为社会象征行为》中提出了一个策略:“不断历史化!”他要求我们在面对文

文学史:

延续与断裂的双重构造

□张荣翼

学时,要将作品本身与读者的理解都看作历史的过程,它既要受过去文化传统的影响,也要把当下的行为看作发展链条中的一环,看到它的可能影响和趋势。杰姆逊所理解的文学史是将文学历史化了的,历史成为内在于所列文学的一种基质。他认为,文学史的研究“不是直接面对本文作为事物本身,而是将之看待为不断被阅读的过程,我们通过前人积累下来的阐释去理解它。”^③在杰姆逊的主张中,文学只有在历史中才能得到理解。

还有一种体现折衷调和的观点,它认为撰史者是站在今天看待过去的文学,这种时间上的间隔可以使后人看到当初人们没有看到的东。如屈原诗作的“香草美人”的修辞方法,与屈原同时代的人就可能不知道它对中国文学史中曲笔、影射传统的重要性。同时,后代人看前代文学,也同样会由于历史间距而未能认识到当时文学的实际状况,而了解这些状况对于理解该作品中可以提供非常重要的依据。因此,我们今天阅读古代文学,也需要重现那些文学在当时所处的文化氛围。

关于重现文化氛围的重要性,我们从一则古典文学中的描写可以见出。如《孔雀东南飞》诗在开头两句:“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的起兴之后,就是一段诗中女主人公刘兰芝的身世描写,写出了刘兰芝的勤劳能干,这在今人看来,也许没有什么可多说的。但在古代男尊女卑,三从四德的妇道文化下,要为一个女性的生活悲剧写出艺术悲剧来,这就必须在认可妇道文化的前提下才行,而该诗的这一描写就是凸现出刘兰芝谨守妇道却得不到守此妇道的公平待遇,因此,上述描写的重要性就在于,它实际上是为刘兰芝悲剧作了一个同情笔调的铺垫,不至于对当时的妇女文化提出颠覆性的挑战,因而能够被当时的主流话语所承纳。如果今天的读者未能明了文本在当时的文化处境,也就会使文本的这些魅力受到掩盖。

总之,文学史是展示文学活动在人类历史长河中的一段延续,问题在于这种延续并不象植物生长那样代代相续,每一代都承传了前代的基因,它是一种合成音响效果,其中存在着音程的断裂。

二、延续中的断裂

如果说文学史是力图在文学各种潮流的变迁中呈现出延续画面的话,那么在文学史的材料中,则明显地体现出延续中的种种

断裂。

1. 观念的断裂

文学创作并不只是作家在书斋里的手工操作,它还包含着一种文学的、美学的观念表达,还包含着由此涉及到的政治、伦理、哲学、宗教等多种观念的表达。同一时代的文学作品还存在着不同作家间的观念差异,放到不同代的作家间进行对比,这种差异就更明显了。

观念的断裂使得不同时代都作为文学艺术的事件,对它们的理解和解释可能有很大差异。蔡元培在论述以美育代宗教的道理时认为,美育问题涉及到人对自然的纯粹观赏的态度,它是超乎功利的,所以大多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能够起到沟通人灵魂的作用。但他同时指出了—个事实:“周以前之鼎彝,皆用于祭祀。汉唐之吉金,宋元以来之名瓷,则专供把玩。野蛮时代的跳舞,专以娱神,而今则以之自娱。”^④这就是说,不同时代的人在对文学进行阐释时,可能出发点根本不同的。我们今天将古代的创世神话视为文学,但古人可能将它当成历史;古人写的应制诗、宫廷诗等是作为文学的,但今天的文学史已不太记叙它们了。

文学定义的空洞化在文学史理论上表露得最突出,因为如果从严格的内涵出发,各时代的文学有时无法统辖在同一个文学系列中,这样就不能作文学史上的研讨了。

2. 形式—技巧的断裂

对文学可以有各种不同的描述,有人认为它是对世界的描摹,有人认为它是对人灵魂的表现,还有的认为它是一种特殊的语言表述,等等。在各种见解差异的背后,却有一种共同的见解认为,文学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涉及到形式—技巧的,同一表述对象在不同的形式—技巧的处理下,可以呈现出完全不同的意义,具有完全不同的美学价值。如果说,文学观念的差异是在文学的抽象层次的话,那么形式—技巧的差异则完全体现在具象的层面上。

《毛诗序》说:“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六义”中,赋、比、兴三者都涉及到如何传达的技巧上的问题,尤其是比、兴二者,是中国古诗最基本的修辞方式。比是比喻的意思,它在今人的诗作中也大量运用,而“兴”,按朱熹的权威性的解释,是“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⑤这在《诗经》中是大量存在的。如《关雎》:“关关雎鸠,在

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蒹葭》：“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这种“兴”的手法在今天也已较少运用，在今人看来跳跃性太强。反之，今人用的一些修辞又是过去所不曾意识到的，如在“比”中，分出了隐喻和转喻，二者各有其功能。又如在叙事作品中，叙事人可以在人物、叙事者和作者之间摇曳、转换等。

3. 文类和传媒的断裂

远古时期人们的文学，以押韵的诗和民间故事或神话为主要文类，它的传播全部是靠口口相授；而近代以来的文学，诗的形式已经可以不那么讲求押韵了，它的传播也更多地是由文字记载的方式来进行的。这样的差异只是一个外部差异，但内在性质因此也就迥然不同。在只能口口相授的传媒条件下，文学作品的流传必然要求通俗易懂，这才有人愿听、愿讲。讲和听的人数多寡对于作品的流传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有文字记载后，口授流传的地位就大为降低了。印刷术发明后，使得文学记载能够更加普及化，诗可以不严格押韵也照样流传。同时，长篇小说的文体也应运而生，这在口诵文学的时代是不可能出现的。在没有印刷术的时代，由人手抄也会使得它的出现难以形成气候。在这一不同历史时期所形成的断裂面前，文学史所描述的延续的文学，其实是在断裂的状况下实现的。

4. 文学接受的断裂

文学活动的整个行程包括两大阶段，即作家的创作阶段和读者的阅读阶段。创作使得文学作品得以问世，阅读则使作品现实化，使之真正成为作品。从接受的环节来看，不同时期的读者之间也会有接受的断裂状况。古代社会的读者，由于文体盛行的是诗、剧等体裁，他们会对其作出更高的审美注意与评价。而对小说则视为价值较低一级的消遣读物。再从具体的文本阅读来讲，同一古代作品，古代读者同当代读者之间，也会由于文化氛围、阅读环境和自身修养等方面的不同，呈现出接受上的断裂的状况。“不同的历史时期根据不同的目的塑造‘不同的’荷马与莎士比亚，在他们的作品中找出便于褒贬的成分，尽管不一定是同一些成分。”^⑥所以，不同时期对同一作品的评价也就可能有很大反差。

以上这些断裂方式，在文学史的撰述中一般是难以直接见出的。较为常见的状况是，撰史者在指出了文学史上的延续性一面

外，又批判前代创作中的一些在他看来是不好的倾向，并在前代作品的已有评述外，再加上自己新的评述。其实，从我们上文指出的“延续中的断裂”来看，这恰好表明了文学史不得不体现出的文学发展过程中的断裂状况。它的延续的一面在很大程度上要靠撰史者自己去构拟、发掘，从前代找出自己的需要的成分作为延续的线索和框架。

三、延续与断裂的“合奏”

文学史所撰述的内容是断裂的，但反过来看它也是延续的。文学史在述史中除了有着编年史的构架保证内容的延续外，同时也确实发掘出了后代文学在前代文学影响下进行运作的特性，这就保证了文学史的记述并不是各个时期文学的罗列，而是有着一种线性发展脉络的。这里，延续和断裂的交织产生了一种合奏的复调效果。

文学史中断裂与延续的“合奏”有两种意思，下面可作一梳理。

一重意思是说，在各个不同时代及其文学氛围下，文学有着不同的追求和实绩，后一时代力图反叛前代的影响。但是在这种反叛中，后代也不会只是以一己执着的信念作为思想武器，它在反叛传统的斗争中，为了取得反叛行为的成功，往往会祭起另一种传统来作为自己的依恃。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在反叛中世纪教会的思想束缚时，标榜“回到希腊去！”，以更为古老的古希腊传统来对抗中世纪教会的传统。当然，文艺复兴运动其实也不是真正地要向古希腊作出回归。唐代改革文坛创作风气的韩愈，他所倡导的诗文革新叫作：“古文运动”。五四新文学在反对旧的文学传统时，一方面是拿出从西方新移入的文艺传统的思想武器，只是异域文明给人的新颖感使人没有感到它的传统性罢了；另一方面，新文学运动所反对的主要是书斋传统，至于切实地反映出实际生活中的民俗、民风这一点倒并没有提出异议。它只是反对传统中的某些方面，对于传统中的另一些方面则是认可其保留价值的。

“合奏”效应的另一重意思是指，后来的文学潮流在反拨前代文学传统后，它可以逐渐取代前代文学的主潮地位，但是被取代了的文学潮流并不会被完全取消，它只是处于蛰伏状态，成为一种背景材料，在日后新的时机，又有可能以新的方式、面貌重新出现。旧体诗词从五四到30年代，它的地位与对整个中国古代历史的评价都较低。但到了30年代，全民族的抗日战争爆发后，各

党派各阶层不能从现时的意识形态中寻求到那种抵御外侮的共同精神支柱,便转而以大家都可以接受的民族文化作为共同的价值基础。在这种状况下,象岳飞《满江红》一类作品就被万口传诵,甚至成为一些部队里的军歌、学校里的校歌等。但这种延续不同于岳飞作为臣子对国君的忠忱,引导人们抗战情愫的主要是一种民族感情。其中可以见出在延续中又隐含了实质上的断裂。

四、双重构造体现的理论问题

文学史中存在着延续与断裂的双重性,这一矛盾构成了文学线索的基本链环,认识这一矛盾的存在对于文学研究有三方面意义。

首先,延续与断裂的双重性,体现出人们治史过程中史识汇流的眼光,既涉及记录的“史”,也关乎发掘、评价它的“识”。文学史作为历史的一个分支,它应该符合普通历史学的规定,要写出历史对象本身的继承关系。如果没有这一点,历史学研究就不能梳理出每一时代的来龙去脉。但历史的延续并不是单由前代作出规定的。实际上,前代只能拿出自己的东西供后代选择,后代是根据自己的需要,在前代所提供的材料基础上进行新的创造。由于历史在实际的演进中有着多种行为主体“共谋”才能达成的状况,所以,每一认识角度都可以提出自己所见的有启发价值的东西,但都不能提供文学史的全面景观。在这里,有着各人见识的深广等方面的差异。

其二,文学史中延续与断裂的双重构造,给文学研究提供了广阔的思维空间。如以小说史来说,中国小说的源流可以上溯到《山海经》、《庄子》那些怪诞的神话,下推则可以见到魏晋轶事、唐代传奇、宋元话本、明清章回体白话小说,一直延续到五四后鲁迅《狂人日记》那种现代意义的小说。在这里,它们作为叙事文学来讲体现了一种延续性,但从各自内在的基质上讲,则彼此间有着很大的断裂。其中《山海经》的故事是写神,魏晋轶事写半神,唐代传奇是写人,等等。另外,小说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小说的描写技巧等也都有着很大差异。那么,从延续的一面我们可以看到一些东西,从断裂一面又可看到另外的东西。它们都可分别为某种理论的系统提供思考的材料。所以,在“五四”以后,郁达夫认为,“中国现代的小说,实际上是属于欧洲的文学系统的。”

⑦而周作人却持相反意见,他指出,“我已屡次地说过,今次的文学运动,其根本方向和明末的文学运动完全相同。”⑧这里关键的并不是他们意见的相左,而是在于他们的这一认识都可以为中国现代文学的阐释提供一个思维的空间。了解文学史本身的双重构造,则可以为这类理论思考提供一个自觉开拓的领域。

其三,对延续和断裂的复杂性的揭橥,有助于突出文学的特性。在文学中,有些文类,有些文学流派中延续的一面,可能恰恰是另一些文类、另一些流派中显出有较大断裂性的。反过来,在前者有较大断裂性的,在后者又可能有较多延续性。文学活动基本上是一种无序的现象。最为循规蹈矩的欧洲新古典主义,中国明清复古主义的文学有作品被文学界奉为佳作,而最具有反叛性的如西方现代派诗作,中国明清的倡言性灵的文学也有作品成为典范。文学不是一个一统的国度。在人们对文学进行理论思考时,文学体裁的多样性始终具有不可忽视的地位。

总之,文学史中延续与断裂的二重构造,既体现了文学史的治史难度,同时也提供了新的治史框架的契机,可以说,这是为杰出的文学史论著提出的挑战。如何回应这一挑战将是衡量文学史家水平的一个尺度。

①王德威《现代文学史理论的文、史之争——以近代中国政治小说的研究为例》载评论集《从刘鹗到王桢和——中国现代写实小说散论》,台北时代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86年版。

②见《“新批评”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509页。

③F. Jameson: *The Political Unconscious——Narrative as a Socially Symbolic Act*, Routledge, 1980, P12.

④《中国美学史资料选编》下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459页。

⑤《朱子语类》。

⑥特里·伊格尔顿《文学原理引论》,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年版,第11—12页。

⑦郁达夫《小说论》第一章,上海光华书局1926年版。

⑧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北平人文书店1934年版,第104页。

作者单位:西南师大中文系
责任编辑:陶原珂

《帝京景物略》与竟陵文风

□吴承华

以钟惺、谭元春为代表的竟陵派是晚明时代与公安派同领风骚的文学流派,但人们对竟陵派的认识大多只是在其诗歌方面,其实,其散文也有相当鲜明的艺术特色。竟陵派散文在晚明文坛曾经影响甚大,海内“靡然从之”,晚明著名作家如王思任、祁彪佳、张岱等都受到竟陵派的影响,而刘侗与于奕正的《帝京景物略》则可说是得到竟陵派的“真传”,是竟陵派散文的代表作之一。

刘侗字同人,号格庵,湖广麻城人。他曾因“文奇”而被礼部奏参,崇祯七年进士,曾选任吴县知县,赴任时逝于扬州。刘侗与谭元春有同乡之谊,关系密切。谭元春既是前辈,又是竟陵派首领,刘侗与之趣味相契,声气相通,便自然成为竟陵派中人了。于奕正虽非竟陵人,但与楚谭元春、刘侗同人友善,性喜山水,“每于霜清木老时,骑驴而往,穷岩绝岫,数百里间,无不周览。遇断碑,必披荆剔藓以识之。或攀枯萝,蹶危石,逾其绝顶,慨然赋诗,有超世之概。”于奕正长于京师,对帝京名胜和乡土人情了解尤深。刘侗和于奕正原来计划撰写《南京景物略》作为《帝京景物略》的姐妹篇,可惜还没有完成,两人便先后辞世了。(参见周亮工《书影》第五卷)

明代的文人墨客,多是江南人,故江南的山水秀色是明代山水游记的主要内容。刘侗虽是南方人,然“北学而燕游者五年”,他写作《帝京景物略》,是因为他认为此地山水景物兼有自然美与特殊的人文意义:“考中原之山势,江北主,江财宾。古圣先王,笃生必于江北。……天下之水,东趋沧海,沧海所涯,号称天津。故山水之攸结,莫并

我帝京者。于焉神人萃,物爽冯,成周鼓文,汉代瑞像,胫翼谓何,气先符应。”(《帝京景物略·叙》)其特殊的文化地理优势,远非它地可比。在写作过程中,于奕正负责摭求事实,因此,于奕正对于《帝京景物略》的构思和取材起了重要作用;刘侗负责排纂成文,因此此书的文学成就主要应归功于刘侗。他们的合作是相当认真的:“事有不典不经,侗不敢笔;辞有不达,奕正未尝许也。所未经过者,分往而必实之。出门各向,归相报也。”(《帝京景物略·叙》)此书以实录兼审美的眼光审视地方风物,记述了北京地区的风景名胜和习俗风情,它既是一部内容翔实可信的地方景物志,也是一部很有审美价值的艺术作品。

《帝京景物略》成书于崇祯八年,在他们之前记山水的有郦道元的《水经注》,记梵刹的有杨銜之的《洛阳伽蓝记》,记熙游的有周密的《武林旧事》。但《帝京景物略》内容更复杂,范围更广泛。尽管早有古人成功的著作可供借鉴,作者却提出此书“其布体陈辞,不更蹶向人一步,”其语言和体例都自成一格,可见作者的目标很高。此书详细记叙了北京地区的景物,以地区分卷为城北内外、城东内外、城南内外、西城内外、西城外、西山(上)、西山(下)、畿辅名迹八卷,共记景点129个,每景一篇,每篇之末各系以与景点相关之诗。每记一景点,又追源溯流,以景为经,以史为纬,故此书不仅是一部写景小品,也是一部有关北京历史地理文化的重要书籍。

《帝京景物略》的主要内容是山川、寺院、园林、民俗风情几方面,刘侗在《帝京

景物略·略例》中谈到此书写作的体例：“山川记止夷陵，刹宇记止衰盛，令节记止嬉游，园林记止木石，比事属辞，不置一褒，不置一讥。”作者持一种客观的态度，对于记述对象，不漫加褒贬，这是一种历史的眼光。因此，此书与一般山水游记有很大差异，作者的感情通常是深藏不露的。另外，作者又是用一种审美的眼光去观察、取材和写作的，作者用充满诗意的文学语言，为我们艺术地再现了17世纪北京的风土与景物，细心的读者可以从字里行间体会出作者的思想感情来。如《钓鱼台》，作者用相当客观的态度，冷静而清晰地叙述了钓鱼台亭园的历史变迁，并且生动地描写了钓鱼台的佳景。但从叙述中，我们也不难体会到作者对世事沧桑之感：园亭随着主人的不断变更而不断更名，“今不台，亦不亭矣”，只有那自然景物，山水泉流，树木花鸟，千古不易，给人永恒的美感。（卷之五“西城外”）

明代园林十分兴盛，此书不少篇章记载了明代北京的园林艺术。如《定国公园》一则写定园总体的特色是“朴”。园中土垣不加涂饰，土池也没有驳岸，建筑物十分随意，树林的种植也任其自然，不按行列栽培。而且在古屋之中，“额无匾，柱无联，壁无诗片。”但刘侗认为这种造园“实则有思致文理者为之”，因为它反映了一种追求平淡、崇尚自然的与“文理”相通的园林美学思想。“藕花一塘，隔岸数石，乱而卧，土墙生苔，如山脚到涧边，不记在人家圃。”这是一种高妙的造景艺术，以文人写意画的技法运用到造园之中，追求简朴，以有限的空间和景物来再现大自然的无限，让人产生一种置身于自然景观的感觉。定园的总体风格追求“朴”，如“一堂临湖，芦苇侵庭除，为之短墙以拒之。左右各一室，室各二楹，荒荒如山斋。西过一台，湖于前，不可以不台也。老柳瞰湖而不让台，台遂不必尽望。”这反映了明代园林艺术追求古朴的风尚。此外如《英国公新园》写英国公新园的特点，不在于其园内的亭轩台阁之美，而在于它巧妙地借用了园外大自然之景，突破了园林的空间限制。此园三面环水；四周风景宜人。园中只构一亭、一轩、一台，然四面湖光山色竞相奔来眼底。东边是万顷春绿秋黄的稻田，

西边是晓青暮紫的西山，南眺万岁山云气蒸蔚，北望远树含烟，园中园外，浑然一体，形成气象万千的园林景观。连桥上的行人，也成为园中之景，画中之境：“过桥人种种，入我望中，与我分望。”（卷之一“城北内外”）这是多么富有情趣与人文气息的风景。计成的《园冶》一书曾提出“借景”的理论，这里反映的正是“借景”的园林美学思想。

《帝京景物略》对当时北京民俗风情的描写，也很有认识价值。作者在这方面是有意识加以记录的，作者对民俗风情倾注了相当的热情，如《灯市》记北京正月的灯市之盛，《春场》详记北京一年四季民间的重要节日及其风俗。《高粱桥》写清明时节高粱桥民间娱乐活动，其中爬竿、翻斤斗、筒子、马弹解数、烟火水嬉等活动。文中写爬竿与斤斗最为精彩。如云爬竿：

扒竿者，立竿三丈，裸而缠其顶，舒臂按竿，通体空立移时也，受竿以腹，而项手足张，轮转移时也。衔竿，身平横空，如地之伏，手不握，足无垂也。背竿，髀夹之，则合其掌，拜起于空者数也。盖倒身忽下，如飞鸟堕。（卷之五“西域外”）

这些绘声绘色的描写，真实而生动地再现了当时民间的杂技艺术。就是在今天看来，这些杂技还是达到相当专业化的水平。在《帝京景物略》中，有关民俗风情的描写倒是比较平实流畅的，与书中那些写山水园林的文笔有所不同，顺便一提，《帝京景物略》也多少提供了当时中外文化交流的一些材料。如《城隍庙市》提到当时市场上外国的商品“有乌斯藏佛，有西洋耶稣像，有番噻，有倭扇，有葛巴刺碗。”（卷之四“西城内”）从这些描写中可以看出当时中外文化交流的一隅。《利玛窦坟》中记载了利玛窦初到中国所携带之物品（如耶稣像、万国图、自鸣钟、铁丝琴）和到中国后主要的事务。作者从中国传统儒学的眼光来介绍“西儒”之学的特点，颇有历史价值。在字里行间，刘侗还流露出对于“西儒”之学的敬仰之情《天主堂》一文提到天主教堂是利玛窦所造，教堂“供耶稣像其上，画像也，望之如塑，貌三十许人。左手把浑天图，右叉指若方论说次，指所说者，须眉竖者如怒，扬者如喜，耳隆其轮，鼻隆其准，目容有矚，口容有声，

中国画绘事所不及。”这当然是就绘画中人物形象的透视与质感而言，反映部分文人对西洋艺术的欣赏态度。

把竟陵派散文置于中国古代散文艺术发展史中，更能看出其艺术特点与创造性。唐宋以后，散文发展走向文从字顺，文气流畅，在审美方面更趋向于生活化。从明初开始，散文发展的主体是走唐宋的路子，唐宋派与公安派更是如此。竟陵派虽承公安派而来，却有截然不同的审美趣味。公安派散文平易畅达，长于机趣；竟陵派矜练深刻，神气内敛。公安派散文世俗味极浓，文笔也不避俚俗；而竟陵派则幽情单绪，孤行静寄。公安派的语言放纵恣肆，浅切流利，而竟陵派则字斟句酌，刻意安排。公安派的散文绝不装腔作势，以畅快求新而易失之浅俗；竟陵派绝不落俗套，以奇崛求新，而往往失之枯涩险僻。《帝京景物略》是竟陵派作品的典型，它把钟惺、谭元春的审美倾向加以集中和放大，其语言风格与钟、谭散文相比，显得更为诡奇生涩而别具一格。

刘侗写景繁冗删尽，善摄事物之神。它描写山水园林，往往重在最有特征之处，如《曲水园》写其富于水竹，更以形态如松“肤而鳞，质而干，根拳曲而株婆娑”的“松化石”著称。（卷之二“城东内外”）《洪光寺》写一个遮天蔽日的柏树世界，“人行径上，上丁丁雨者，柏子也；下踉踉啐者，柏枯也。耳鼻所引受，目指所及，柏声光香触也。”（卷之六“西山上”）《白石庄》全篇则以柳为主脑，“庄所取韵皆柳”一句定下基调。园中之虬松、小亭、台阁、荷池、海棠、芍药、牡丹全是围绕着柳色来写的，构思颇为别致。（卷之五“西城外”）

古来山水园林作品很多，难以出新，而刘侗最出色的本领就在于能寻常景色中写出别趣来。寻常的景物，到了刘侗的笔下，就决无浮泛轻浅之病。他的成功之处有两方面，一是在寻常的景物中写出特殊的感受。如《香山寺》写甘露寺的金鱼，“泉上石桥，桥下方池，朱鱼千头，投饵是肥，头头迎客，履音以期。”（卷之六“西山上”）写池中的金鱼，争食迎客，“履音以期”，这种感觉便写出奇趣来了。另一方面是能以不寻常的表达方式来表达寻常的事物，以特殊的比喻，

或特殊的想象，或特殊的遣辞造句，使人得到一种新鲜感、奇特感。刘侗状物写景，如木雕，如篆刻，如锥画沙，如铁画银钩，力透纸背而丝丝入扣。其文笔险绝，奇峰迭起，而文境瘦削，自成一格。如《西堤》写夏天荷花盛开，荷叶茂盛，到处散发着荷的香味：“花香其红，叶香其绿。”说荷花的香味由红色溢出，荷叶的香气从绿色飘来。这种红香、绿香的说法非常奇特，让人过眼不忘。又如《云水洞》：“登大小摘星岭，西望胡良拒马大小河，如练，如带，如游丝，在拄杖下，颠则落河中耳。”（卷之八“畿辅名迹”）写远方的河所用的比喻是前人用过的，但说它“颠则落河中”的写法却又是别出心裁的。

刘侗有意识打破语言常规，以追求陌生化的艺术效果。前人文章的佶屈聱牙，往往是因为使用古僻生疏的字词而形成的，但刘侗却善于把最常用的字、词编排得生涩诡奇，他主要是用变异的语言来表现特殊的艺术感受。比如他喜欢变化词性，以名词作为动词，如《水关》：“水一道入关，而方广即三四里，其深矣，鱼之；其浅矣，莲之，蓼茨之，即不莲且蓼也，水则自蒲苇之，水之才也。”句中的“鱼”“莲”“蓼茨”“蒲苇”在文中都成为动词。又如《海淀》中：“水之，使不得径也；棧而阁道之，使不得舟也。”这里的“水”是蓄水，“棧而阁道”是建造棧道使之成为阁道之意，这也是把名词动词化了。这种表达不仅显得奇峭，而且的确比通常的表现方式更为简括。刘侗喜欢用极短的句式，如《三圣庵》中的句子：“有台而亭之，以极望，以迟所闻者。三圣庵，背水田庵焉。门前古木四，为近水也，柯如青铜，亭亭。台，庵之西。台下亩，方广如庵。豆有棚，瓜有架，绿且黄也，外与稻杨同候。”读起来节奏迫促，与传统的山水游记行云流水般自然的语言根本不同。这是因为他有意识地尽可能删去唐宋以来古典散文中常用的用以起承转合与使文气舒缓自如的虚字。如“门前古木四，为近水也，柯如青铜，亭亭”句，若在“亭亭”之后补足“如盖”之类的补语，文气便顺畅平易。作者在“亭亭”二字突然结束，文气蓦地变得奇峭起来。刘侗为了洗去文气的平弱，喜欢特殊句式，或有意地变化句法，使之失去对称平衡，造

成音韵上的不流利，以求得文势奇僻峭拔。如《白石庄》写柳“春，黄浅而芽，绿浅而眉，深而眼。春老，絮而白；夏，丝迢迢以风，阴隆隆以日；秋，叶黄而落，而坠条当当，而霜柯鸣于树。”（卷之五“西城外”）对于几个季节的描写，偏用完全不同的句式。甚至，描写春季的句式，也决不统一，以追求一种变化，一种与公安派的流利不同的美感。又如《雀儿庵》：

雀儿庵，在潭柘后山五里。在千峰万峰中，在四时树色，四时虫鸟声中。庵，方丈耳。一灯满光，一香满烟。然佛容龛，容供几；僧容席，容榻，容厨；客来客坐，庵矣。山田给粥饭，叶给汤饮，蔬果给糗饵，庵矣。（卷之七“西山”下）

传统古文中的排比句，都是累累如贯珠的流畅，而刘侗这里虽然也运用排比句，却是故意追求一种艰涩生拗之趣。文中的表达方式很特别，如说“一灯满光，一香满烟。”点一盏灯就使满庵生辉，点一支香就使满庵弥漫烟，作者之意是特别强调雀儿庵之小。这种表达方式的确见出作者在文字上的苦心经营。

刘侗喜欢突破传统表达方式，在《温泉》一文中，刘侗先是细致地描写了温泉之美，文章的结尾用这样两句话作结：“泉而东六十里，大汤山，又一温泉；再东三里，小汤山，又一温泉。”（卷之五“西城”外）他竟然用相同的句式重复地表现同一意思，文笔似乎显得稚拙而累赘！当然，他完全可用传统古文中“环滁皆山也”式的简括经济的表达方式，但那样便显不出刘侗语言的个性了。他之所以反复强调“又一温泉”，一则是表现他对温泉的喜爱之情；一则是表达对此地温泉之丰富的意外惊喜。鲁迅先生的著名散文“秋夜”的开头：“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恰恰也是用一种看起来重复繁冗的话，传神准确地表达他当时寂寞单调的心境。虽意趣与《温泉》不同，却有异代同工之妙。

总之，《帝京景物略》的艺术特点在于奇，在于打破传统语言规范、寻求陌生化效果的创造性。在中国古代众多的地域风物志中，《帝京景物略》是相当出色的；而在记

述北京风土景物的书中，《帝京景物略》是出版较早而又最有艺术特色的一部。正是由于其风格的独特性，它才能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并对当时人和后人产生影响。如张岱的《西湖梦寻》一书就受到其影响，它以北路、西路、南路、中路、外景五门，分记其胜。每景首为小序，而杂采古今诗文胪列其下，其体例全仿刘侗《帝京景物略》。但平心而论，《帝京景物略》追求奇峭而过于刻意，时时弄到造作的地步；而过于追求突破语言规范，寻常的意思，有时却令人难于考索。其佳妙之处如曲径通幽，别有洞天；而其劣处则“如衣败絮行荆棘中，步步牵挂。”

竟陵派在清代颇受压抑，如清初的钱谦益就攻击竟陵派的诗文：“如木客之清吟，如幽独君之冥语，如梦而入鼠穴，如幻而之鬼国。”“鬼气幽，兵气杀，著于文章，而国运从之。”（《历朝诗人小传》）几乎要把明朝灭亡的原因归之竟陵派的诗文，其罪名大得可怕。在代表着中国正统文学观念的《四库全书总目》中，竟陵派也是受强烈批评的。刘侗的文章被评为“么弦侧调，惟以纤诡相矜”。（《四库全书总目》卷七七）不过，《四库全书总目》的负责人纪晓岚倒是说了一些比较公道的话。他在《帝京景物略序》中指出“明之末年，士风佻，伪体作。竟陵、公安以诡俊纤巧之词，递相唱导。”但接着笔锋一转，说到《帝京景物略》一书“胚胎于《世说新语》《水经注》，其门径则出入竟陵公安，其序致冷隽，亦时复可观。盖竟陵公安之文虽无当于古之作者，而小品点缀，则其所宜，寸有所长，不容殒也。”在这里，纪晓岚对于竟陵文章用了两种标准，当他用传统古文标准来衡量时，就认为它们“诡俊纤巧”“无当于古之作者”；但当用小品的标准来审视时，则认为它们“序致冷隽”，是最能表现竟陵派特点的文体。这种批评反映出这位既代表正统文学观念而又相当有艺术眼光的批评家严格而通脱的态度；而从另一个角度则可以说，《帝京景物略》的艺术成就为竟陵派的散文争了一口气。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中文系
责任编辑：陶原珂

《红楼梦》 宗教精神新探

梅新林

一

作为一种符号,《红楼梦》中一僧一道的组合暗示了佛道二教的融合,同时也以他们的行为方式与价值取向截然划开了佛道信徒的两大类型:一是经一僧一道点化或间接点化的悟道出世者,除贾宝玉外,尚有甄士隐、柳湘莲、惜春、紫娟、蕊官、芳官等,这些都得到了作者的充分肯定。一是居于或出自佛门道观的世俗僧侣,诸如只爱烧丹炼汞、最后吞金胀死的贾敬,官方道教代表人物张道士,卖药行骗的王道士,作法害人的马道婆,出佛门进衙门而最后充军的小沙弥,包揽词讼、破坏他人婚姻幸福的静虚,……一概被作者彻底否定。此外,小说还描写了一系列的宗教俗事活动,比如秦可卿死,停灵期间请一百单八众禅僧在大厅上拜大悲忏,为秦可卿超度亡灵。另设坛请九十九位全真道士,打四十九日解冤洗业醮。然后再请五十众高僧、五十众高道,对坛按七作好事。真可谓此佛彼道,旗鼓相当。对此,小说只作客观而又带几分滑稽的展览,谈不上丝毫的肯定。

那么,作者对于以上诸位宗教僧侣道士以及同是出家的贾宝玉、甄士隐、柳湘莲、惜春、紫娟、蕊官、芳官等有如此截然相反的评判态度,其取舍标准是什么?我认为大约有三:一是入俗与出俗的不同。前者虽寄身于佛寺道观,但却周旋于恶浊的豪门权贵,没有真正的宗教信仰,后者却已通过红尘历劫由俗入神。二是形体与精神的不同。前者停留于形修,只得宗教之皮毛;后者则进入神悟,已达于一种精神境界,已得宗教之精髓。三是法术与哲理的不同。前者以法术为器以谋生,后者则以哲理为指归,以宗教之至善关注人生,反思人生。大凡属于后者的,都是肯定的;属于前者的,都是否定的。介于二者之间的妙玉,则肯定与否定兼而有之。由此可见,《红楼梦》的佛道宗教主要是指一种宗教哲理、宗教情怀、宗教境界,是形而下向形而上的升华与超越。

二

在宗教信仰上,佛道二教都以现实世界为虚幻,都以离弃现实世界的超现实解脱为归宿。但一重来世转生,一重当下悟道。由此形成了二者在宗教、哲理与修炼方法上的诸多不同之处。

若按一切宗教都必须建立在来世信仰的基础上的标准衡量之,佛教是一种成熟的典型的宗教,而道教则只是一种中国式的世俗宗教。由于佛教是建立在来世信仰的基础上的,其终极是通向死后的西方极乐世界,以否定现世的红尘世界为前提,由此产生“色空”说。如前所述,“色空”说的核心是色空实一不二,只要人们认识到了这一点,就不会产生贪欲和追求,因而也就没有人生的痛苦。所以,佛教采取“窒欲法”,通过人为苦修,把欲念压抑于萌芽状态之中。灵魂是可以再生的,生命是可以轮回的,或入天堂,或入地狱;或为贵人,或为牲畜,一切都取决于生前的修炼程度。这就是佛教的因果轮回说。而道教却把宗教信仰建立在今生的基础上,其核心是通过人为修炼由俗界上升至仙界,或者由神仙直接点化超度为神仙。它也同样否定红尘世界即俗界,但不是如佛教认为通过生前修炼而在死后进入西方极乐世界,而是主张在生前即可由俗而仙,关键就在于自己的先天仙性、后天修炼

以及出于某种神秘机缘的仙界使者的接应。一僧一道的警世主题歌《好了歌》谓“世人都晓神仙好，唯有功名忘不了。”……又解说道：“可知世上万般，好便是了，了便是好。若不了，便不好；若要好，须是了。”即是以神仙境界为指归，以此为准则对包括“富贵场”、“温柔乡”在内的整个红尘人生予以否定。所以此歌是由一僧一道中的“道”——跛足道人唱的，同时也是由具有先天仙性的甄士隐为此作解注的。达于“好了”，即超脱了俗界，进入了神仙境界，正如佛教信徒进入了西方极乐世界一样。但无须等待来世转生，而在今生由俗而仙。葛兆光先生曾对儒佛道三者作了一个总括性的有趣比较：“如果说儒家说更偏重于人在社会生活中的自我价值实现、佛教更偏重于人在内在精神生活中的心理满足的话，那么，道教则更偏重于人在生命上的永恒与愉快。如果说儒家学说对于潜藏在人的意识深层的欲望力量更多地采用在社会理想上的升华、转化的方法，佛教更多地采用在内心中的压抑、消灭的话，那么，道教则更多地采用一种迎合的方法，使它在虚幻中满足、在宣泄中平息；如果说儒家学说主要使中国古典文学强调社会功能而充满了理性的色彩，佛教主要使中国古典文学具有了缜密的肌理与空灵的气象的话，那么道教则主要使中国古典文学保存了丰富的想象力和神奇瑰丽的内容。”①道教本质上不是禁欲，而是满足，至少是迎合性的“遂欲”。不过佛教输入中国之后，在与本土宗教的冲突中，也被逐步本土化了（同样，道教也有佛教化的现象）。从总的发展轮廓来看，从小乘佛教到大乘佛教即是第一次本土化的改造，而从大乘佛教到禅宗又是一次本土化的改造。这种本土化的改造过程，同时也就是从禁欲到适意再到遂欲乃至纵欲的过程，在整个发展曲线上与道教有相合之处。

三

佛教为表，道教为实；“色空”为表，“梦幻”为实。明乎此，我们即可进一步认识“因空见色”十六字“心传之学”最终解开《红楼梦》中佛道宗教两相融合之谜。

“因空见色，由色生情，传情入色，自色悟空”，从佛教“色空”观来看，此不仅

歪曲了“色”之含义以及“色”与“空”实一不二的关系，而且更介入了“情”之妄念，因而最终是无法自色悟空，也无法达于“空”之境界的。但从道教“梦幻”观来看，此始于“空”而又终于“空”，从“因空见色”到“自色悟空”刚好是一个循环圆圈，与石头的“石—玉—石”的生命循环历程吻合的，同时也是与悟道以梦幻为媒的“出发—变形—回归”的生命循环历程相吻合的。个中关系如下：

历程 对比	出发	变形	回归	宗教哲学
空空道人	空	色、情	空	色空观
石头	石	玉	石	梦幻观

在“空—色、情—空”的循环圆圈中，空空道人起始于空，故名空空道人，此“空”为原始虚无之“空”，犹如童朴之心。此中的色与情，从广义上说，前者指红尘世界的物质现象，后者指红尘世界的精神追求。在这一“空—色、情—空”的循环圆圈中可以分为四个阶段：一是自童朴之心开始萌长欲望，贪恋美色。此即为“因空见色”阶段。二是由美色而产生追恋之情，此即为“自色生情”阶段。三是以己之情投射于一些特定的美色身上，此即为“传情入色”阶段。四是在经历了一番红尘历劫之后，由情场失意、生命不再的种种人生幻灭悟出究竟到头一梦，万境归空，因而离弃红尘复归于童朴之心，这便是最终的“自色悟空”。此终“空”在文字上与始“空”同，但内涵不一，终“空”既是对始“空”的回归，也是对始“空”的超越，是“空”与“不空”的复合。

正因为终“空”是通过“色、情”之梦幻领悟出来的，不同于原始之“空”，而是对原始之“空”的回归与超越，是一种充满人生悲剧体验的实有之“空”，所以“空空道人”最终虽然“自色悟空”，但经过色、情的陶冶却成了一名“情僧”，“情僧”即是空与不空的复合。由此可见，空空道人的“空—色、情—空”的循环圆圈实际上正是红尘人生生命循环历程的一个模拟与缩影，同时也是《红楼梦》小说主角石头生命循环历程的一个模拟与缩影。据一僧一道感叹石头下凡历劫“亦无中生有，静极思动之数”，以

及太虚幻境对联“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的意旨，石头原处于神界大荒山，即是“静”“无”“真”，因而也即是“空。”所谓“大荒山无稽崖青埂峰”者，大荒、无稽，实都喻示着“空”，而青埂峰之青埂，脂评以为“情根”，则原来的“空”中已蕴含“情根”。而“情根”又必然进一步萌长出“情”来。果然，石头本身不就是由“石”变“玉”吗？由“石”变“玉”也就由“石”生“欲”，也就是静极思动，无中生有，真变为假。正如二知道人《红楼梦说梦》中所说的，大观园就如同“黄粱梦”中可以幻形遂欲的“枕窍”。贾宝玉于其中穷欢极娱，逍遥自由。然后又通过警幻仙子的性启蒙教育与宗教式净化，由开始企恋物质形态之美色，逐步升华为纯精神形态的“意淫”的追求。据警幻仙子所云，此“意淫”即是“天分中生成一段痴情”，也就是青埂峰所蕴含的“情根”的显现和升华，也就是人们所说的“情不情”，然后又由此投射到大观园的众女儿身上，成为“诸艳之冠”、“绛花洞主”，这不就是“因空见色，自色生情，传情入色”吗？最后沉梦顿醒，推枕而起，既从来处来，又从去处去，复归为神界大荒山之石头，这不就是“自色悟空”吗？在此，石头的“石—玉—石”的生命循环历程中，始“石”与终“石”正与空空道人的始“空”与终“空”一样，名称虽同，实质不一，因为回归后的石头成为“情不情”的“文妙真人”，回归后的空空道人也已是合情与空为一体的“情僧”，都是“空”与不空的复合。而且，空空道人的“因空见色，由色生情，传情入色，自色悟空”是在阅读《石头记》后，并通过与石头的对话，由石头对色、情的形而下的扬弃和作形而上的解说后才发生的，彼此不仅在“空—色、情—空”的循环圆圈上是共构的，而且在色、情的由形而下向形而上超越上也是息息相通的。就此而论，情僧——空空道人与石头——文妙真人即可视二为一，虽二实一。空空道人即是“文妙真人”的变形、延伸甚至再世。空空道人“因空见色”成为“情僧”之后，直接改《石头记》为《情僧录》，则《石头记》与《情僧录》是一是二，至为明了；而石头与情僧，文妙真人与空空道人，是一是二，也

至为明了。

四

追本溯源，道教主“梦幻”说，以“遂欲”去欲不同于佛教主“色空”说，以“窒欲”去欲，归根到底还是在于佛道二教根本信仰的不同。由表象观之，无论是空空道人还是石头，他们的生命循环圆圈都与佛教的因果轮回有明显的相通之处。而且诸多术语即是直接从佛教因果轮回说中借用过来的。即以总括《红楼梦》的终曲“飞鸟各投林”为例：

为官的，家业凋零；富贵的，金银散尽；有恩的，死里逃生；无情的，分明报应。欠命的，命已还；欠泪的，泪已尽。冤冤相报实非轻，分离聚合皆前定。欲知命短问前生，老来富贵也真侥幸。看破的，遁入空门；痴迷的，枉送了性命。好一似食尽鸟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无论术语、内涵都具有浓厚的宿命色彩，都与因果轮回说十分相似，甚至可以说整部《红楼梦》即是以此为故事构架的。但这种宿命论并不能直接与佛教的因果轮回划等号，因为一来佛教的因果轮回首先是建立在来世信仰基础上的，是生前的修行之因决定了死后的再生之果。二是因果轮回都是恩怨相报，即所谓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加减乘除，分毫不差。以此衡之于《红楼梦》两者都不是。无论是石头，还是空空道人，都是今生今世中悟道与解脱，并没有以来世极乐世界为终极追求。再者，《红楼梦》所展示的是“盛筵必散”、生命不再的一切都将归于毁灭的必然趋势，而不是根据某人的修行程度予以相应的报偿。实际上，《红楼梦》仅借用了佛教的色空、因果轮回等术语、表象，其内核仍重在道教之“梦幻”观。可以这样说，《红楼梦》的悟道模式及其宗教哲学，佛道二者虽常常此起彼伏，双峰对峙，但以道教哲学为主导，以道教“梦幻”观为核心。

①《道教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02页。

作者单位：浙江师大中文系
责任编辑：陶原珂

互构语言学中的三元结构模式

□ 辜正坤

世界上的一切人类语言都是互构语言，即主体与客体或通过客体而互动互构产生的语言。①不论这些语言表面上如何千差万别，它们中总存在着一些共通的规律性的东西。这些规律性可以概括为：1) 三大主客关系律；2) 三大句法结构律；3) 三大词类律。这三大律都有三元结构特点，因此总称为三元结构模式。

1. 三大主客关系定律

下述三大定律可视为互构语言学的理论基础，它们都是不证自明的。

第一，作为主体的人一旦来到客观世界，就势必要和客观世界发生某种联系，这表现为人与存在的关系。人类世界中不存在一种居然不反映这种关系的语言。这是具有普遍意义的规律性的东西，称为主客关系律，略为 A 型关系：人——存在。

第二，作为主体的人除了和非人的客观世界打交道外，还势必要和他人发生某种联系。这表现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同理，人类世界不存在一种居然不反映这种关系的语言。这也是具有普遍意义的规律性的东西，称为人际关系律，略为 B 型关系：人——人。

第三，独立于主体之外的客观世界中，万事万物之间也发生着某种关系，这表现为存在与存在之间的关系。人类世界不存在一种语言居然不反映这种关系，所以这也是具有普遍意义的规律性的东西，称为客际关系律，略为 C 型关系：存在——存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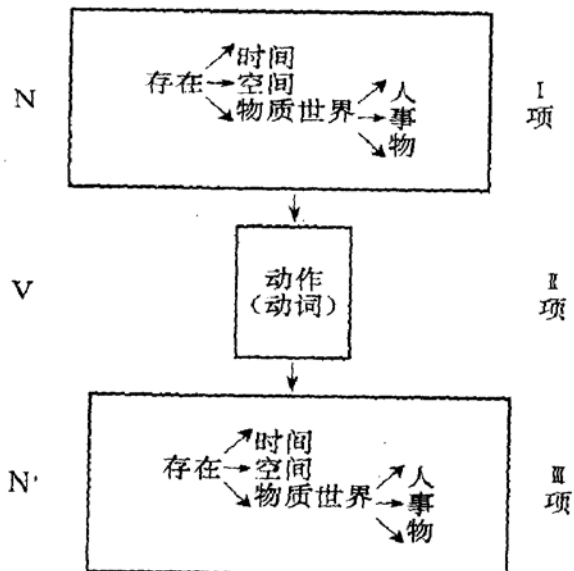
在主客共存的世界中，发生的关系尽管有无穷的类别，但归纳起来，就只可能有这

么三大 ABC 型关系。由于主客同构性，所以世界上的一切语言结构中必然存在的根本关系也只能是这三大关系。

2. 主客三大关系与人类语言的句法结构律

语言结构中最关键的结构是其表序列关系的句法结构。②句法结构的基础就是上述三大关系。但这三大关系中的各个关系点之间要发生关系，必须借助于某种动作、或某种表示相关状态的判断词。反映在语言结构上，就是需要一个或一个以上的动词（包括判断词“是”to be 之类）。三大关系一有了动词，就立刻流转生动起来。主客世界的互构枢纽就在于运动。同理，语言结构的枢纽也就相应地在于动词。

以动词为枢纽一切语言的句法结构的核心形式必基于下述关系：



(图 1)

可以看到，第一个框里的东西与第三个

框里的东西是重复的。这表明,从总体来看,是存在与存在发生了关系。但这种重复是表面现象,当用此模式图解具体句法形式时,会发现语言只是使存在的一部分(N)与存在的另一部分(N')发生关系,或同一部分(N)与同一部分(N')发生关系(亦可谓之自反关系),但两部分的功能是不相同的(前者为N,后者为N')。这些关系必须借动作(动词)才能完成。以动词为枢纽,一切句法结构的核心模式可以归纳为三大类: 1) 前及物句法结构; 2) 后及物句法结构; 3) 通及物句法结构。

2. 1. 前及物句法结构。其动作通常由主语发出,该动词不后接宾语(相当于一个传统的不及物动词)。所谓前及物,指前及主语。例如:

汉语: 所有的人都在说话。

英语: She is very angry。

前及物句法结构的动作发起者发出的动作不外延,动作完全由动作发起者承受,句子中的箭头符号指向及物对象。

2. 2. 后及物句法结构。其动作发出者(N)不明或被省掉,动作后接宾语(N')。例如:

汉语: 1) 开门吧。

2) 下雨了。

英语: 1) Open the door.

2) There comes the bus.

后及物句法结构很象无主句,尤其常见于汉语诗词曲。当然,“下雨”、“There comes the bus”之类,亦可解为“雨下”“The bus comes”等的倒装形式,可视为特殊句法结构。但无论如何,其形式终归是V—N'(V—O)型。互构语言学在处理句法结构时,侧重表层结构,尽量避免深层结构。在我看来,深层结构的提法为随心所欲地分析句法结构提供了托辞。句法结构必须以表层结构为主要依据。深层结构属于语义层,不能与语法(尤其是句法)结构混为一谈,更不宜作为句法分析要素与表层结构概念等量齐观。

2. 3. 通及物句法结构。其动作(动

词)有前及物成分(主语或主位)和后及物成分(宾语或宾位)。通及物句法结构的表层形式是N—V—N',它是前及物句法结构和后及物句法结构的综合,即由N—V+V—N'形式而成。通及物句法结构的形式如果细分下去,还可再分为三类: A) 返身全同位通及物句法结构,动作的发起者和接收者相同,都处于动作同位关系。如:

汉语: 1) 你是你。

2) 他批评自己。

英语: 1) You need not blame yourself.

2) I am mine.

B) 返身部分同位通及物句法结构,动作发起者的动作作用于发起者自身的部分位置上(包括抽象物和抽象位置,如思想、心灵等)。如:

汉语: 1) 他梳头。

2) 他清理自己的思想。

英语: 1) He is rubbing his hand.

2) Everyone has everyone's matter.

C) 动作异位通及物句法结构。其特征是动作起点与终点处于不相同位置。如:

汉语: 1) 我吃糖。

英语: 1) We are reading books.

2) Mr Smith was criticised by Dr • John.

例句中动作的发起者和接收对象是完全不相同的。英语2)例中的被动态,前及物成分变成了后及物成分,主位与宾位序位刚好相反。

3. 句法三元结构模式

3. 1. 句法三元结构模式的简单式基于三大关系的句法结构核心形式(图1)简化而成下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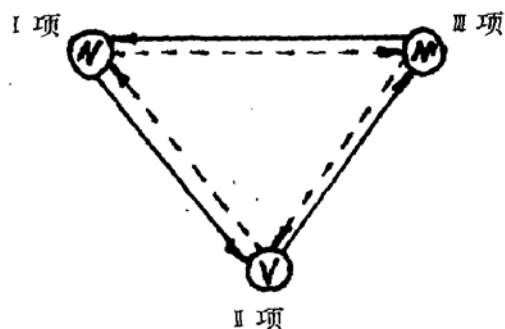


(图2)

式中的N和N'代表一切名词或名词类(包括代词)所指称的事物,可代表整个存在(实体存在+抽象存在),亦可代表存在

中的一部分，如人或某一具体事物；也包括一切指称时空的词类。N的这种指代功能是各种语言中的客观现象，即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一种语言中N的指代功能不是这样。N'代表的东西和N所代表的东西相同，只是语法功能不同。N一般表示主语或主位，N'一般表示宾语或宾位。

3. 2. 句法三元结构循环式。图2所显示的N—V—N'句法形式是极浓缩的形式，相当于传统语法中的主谓宾形式。虽然它是众多句法结构的代表，但终究不能代替一切可能的其他结构。例如在汉语中，我们说：我吃饭（N—V—N'），但在日语中却说：わたしは御飯をたべる。（我饭吃。）其句型变成了N—N'—V。而图2所示的三元结构简单式中却不存在此式。其原因是此式的单向性限制了它自身的生成能力。实际上，基于三大关系的句法结构模式是具有正反向互构效应的三元循环结构模式：



(图3)

模式中的箭头表明任意两项间都可以双向运动，实线箭头为正向；虚线箭头为反向。在实际情形下，正可以为反，反可以为正，关键看观察者站在什么角度或方位上看问题。根据图3所示，从I项到II项正向运动为N—V，反向为V—N；从I项到III项，正向为N—V—N'，反向为N—N'—V。根据排列组合原理，这三项的正反项运动结果将一共可生成10种句法结构（不计重复结构）（见图4）：

1) I → II	N—V	S—V
2) II → III	V—N'	V—O
3) I → II → III	V—V—N'	S—V—O
4) I → III → II	N—N'—V	S—O—V
5) II → I → III	V—N—N'	V—S—O
6) III → I → II	N'—N—V	O—S—V
7) II → III → I	V—N'—N	V—O—S
8) III → II → I	N'—V—N	O—V—S
9) I → III	N—N'	S—O
10) II → I	V—N	V—S

(图4)

人类语言无论多么复杂，其核心句法结构的总数只可能具有上述10种。而就某一具体语言来讲，则往往至多只具有10种中的3—4种句法结构。例如现代汉语的核心句法结构其实就只有N—V—N'形式及其派生式N—V，V—N'两式。现代英语的核心句法结构也与汉语的句法结构相似，只有在个别倒装语序中有V—N型，例如：Happy is the man who helps others. 大多数倒装语序中，其基本结构依然是N—V—N'（S—

V—O）型。例如：Never before have I seen the picture.（我从没有看见过这幅画。）句子中的倒装成分have只是助动词，中心动词seen仍然在原位。不过在古英语中，语序的多样化是一个突出的特点。具体例句见拙文A Comparative Study of Certain Syntactic Features of Old English and Classical Chinese《古英语和古汉语句法结构比较》（原文为英文，见《四川师范大学学报·外国语文》，1987年第2辑，第51页—60页。）

总之,三元句法结构循环模式以简洁的形式囊括了世界上一切语言所可能有的—切核心句法结构。

4. 三大词类划分律

人—人,人—存在,存在—存在,这三大关系作为一个整体而言,又具有另外三大特点:1)静态特点;2)动态特点;3)限定特点。与此三种特点相对应,一切语言的词汇都势所必然地可以划分为三大词类:1)名词类(静态特点);2)动词类(动态特点);3)修饰类(限定特点)。

4.1. 名词类。凡存在的东西(抽象的和具体的)都可以命名,都可以用符号表示,所以都可以归入名词类。名词体现了人对事物的相对静态特点的把握和描述,尽管名词本身并不等同于被命名的事物本身,但它却有使人经由它而相对认知该事物的特殊功能,这就是名词的能指和所指功能。

要特别指出的是,我这里所谓的名词,与一般语法学家心目中的名词概念有极大差别。我认为语言中的一切词类均可以在一定条件下成为名词,就是说,凡是存在的、可以被当做静态特征命名的事物,都可以成为名词,从哲理意义上说,整个人类的语言可以说就是一个名词,一个存在物。但是,应该强调,我所谓的名词类,主要包括传统语法中的全部名词和全部代词。至于其他词类,当转化条件不具备时,当然仍然主要具有其本身的特征与功能,也即传统语法所认可的那些功能。尤其是动词,它与名词是非常不同的词类。

4.2. 动词类。动词体现了人类对事物关系相对动态特征的把握和描述。一切运动形式和状态(抽象的和具体的)都可以找到一种符号来指称,这种指称物就是动词。我所谓的动词类与传统语法的动词概念基本相同,但亦有区别,我把判断词“是”to be+形容词看作普通意义上的动词。例如:He is happy about the news. 划线部分即为一个及物动词。

正如名词可以在特定的条件下可以包容一切词类一样,动词类也可以在特定的条件下包容一切别的词。我们在英语和汉语中

都可以看到名词作动词的情形。例如:

1) They helicoptered to that place. (他们乘直升机到那个地方。)

2) 身肩重任。

至于别的词类,如介、副、数、量词也可以在特定条件下转变为动词。事实上,汉语和英语中的大量介词最初就是动词,后来才慢慢演变为介词或副词的。词类的可转变性并不意味着词类的划分本身是多余的。恰恰相反,看清楚这一点,使我们有可能更准确地把握住词类相对稳定的界限。

在语言结构的三大关系中,动词是最具革命性的,动词形式的变化非常生动地折射了存在的运动方式的变化。如果说语言结构的关键因素是句法结构的话,那么,句法结构的关键因素则往往是动词。所以,分析任何一种单个的语言结构,抓住了动词这个环节(其词法、时态、在句中的位置),就抓住了该语言结构的要害。

4.3. 修饰词类体现了人对事物的相对限定特点的描述和把握。一切事物都必然处于与周围事物的相对关系中,因而其自身的特点也就当然具有相对性。由于这种相对性,人要对任何事物的任何特点加以描述,都无法不给出一个相对的限定性描述。这些限定性的描述都有修饰作用,所以都可以归入修饰词类。

修饰词类包括一切具有限定性功能的描述语。相当于传统语法的形容词、副词、数词、量词、介词、叹词、冠词、代词的所属格等词类,即名词与动词之外的所有词类都可以划进修饰词类。

修饰词类的主要功能是起限定修饰作用。它们主要修饰动词类和名词类。从功能意义上来看,它们虽和动词、名词鼎足而立,但其实是隶属于动词和名词的。

修饰语中的一部分修饰动词,一部分修饰名词。修饰动词的那一部分词汇往往稍加改变,就可以转而修饰名词。反之也一样。例如:

He is a happy fellow.

He happily smiles.

Happy 变为副词 happily 修饰动词。

与前面的动词类和名词类一样,修饰词类一方面有自己相对稳定的词类界限,另一方面也可以在特定的条件下包容一切词类。在英语中,动词转变为修饰词类的途径是采用现在分词或过去分词。名词转变为修饰语也是司空见惯的现象。在现代英语中,用名词作修饰语的趋势甚至越来越强化。例如:riot police (防暴警察)、impulse buying (凭一时冲动买东西)。

汉语中的情形也类似英语,名词大量转用作修饰语(形容词性),动词也偶尔用作修饰语。例如:木头房子、冲锋队员(动词作定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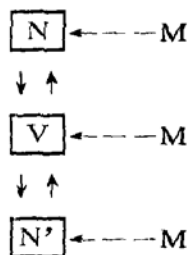
综上所述,和传统语法通常把一切语言大体划分为十几种词类的作法不同,我把所有的词类归纳为三大词类:名词类、动词类、修饰词类。这三大词类一方面各有自己相对稳定的词汇范围,另一方面亦不妨在特定条件下相互转换。相对稳定的范围指的是:

名词=传统语法的全部代词+全部名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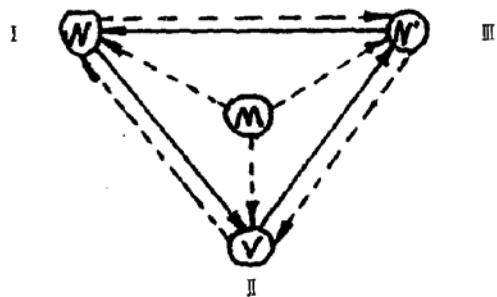
动词=传统语法的全部动词;

修饰词=一切词类-传统语法的全部动词+部分名词。

这样,将图2和图3稍加补充,即成下图:



(图5)



(图6)

图中的M代表修饰词类(modifiers)。所谓三大词类即N—V—M三大词类。N—V构成句法结构的主干部分,而M只是处于从属性的修饰地位。一切语言一旦回归到这个三元句法结构模式中来,就都显得简单明了。从互构语言学理论来讲,固然可以说,语言的千变万化对应于存在的千变万化。但是,就语言内部而言,语言的变化多端的形式(词法形式和句法形式)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由修饰语(包括修饰结构)的大量嵌入造成的。由上可知,句法结构的演变模式不出模式中的十余种,而修饰语却包容了几乎一切词类,而且有无穷的组合形式,所以更容易使语言的句子呈现出千姿万态。人类真正难以把握的并不是句型结构或动词、名词,而是大量的修饰语及其无穷的组合形式。修饰语并不是语言的本质,但正是它使语言的枝干长出枝叶,犹如使人的骨骼附上肌肉,从而使语言变得丰富多彩,扑朔迷离。

①关于互构语言学及其哲学基础,请参阅笔者载于《北京大学学报·英语语言文学专刊》1993年第一期的《互构语言学纲要》一文。

②参阅乔姆斯基《句法结构》。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英语系
责任编辑:陶原珂

从中介论到以人为本的形式美学

——访劳承万教授

□本刊记者 陶原珂

劳承万是湛江教育学院中文系教授，主要著作有《审美中介论》、《审美的文化选择》和《现代美学原理纲要》等。

问：劳承万先生，您的审美中介论问世以后，在学术界引起了广泛的关注。比如它的缘起，是否与80年代初我国哲学界关于矛盾对立双方之间存在中间状态（“一分为三”）的探讨有关呢？

答：关于写《审美中介论》的缘起，其实与我的哲学兴趣有关。大学毕业后，我一直沉浸于哲学，尤其是西方哲学。我很想认识“人”和我自己。五、六十年代一连串的政治风暴都有深刻的哲学根源，这种哲学根源又孕育着一种极为僵化而庸俗的思维方式。例如拿着“存在决定意识”的大棒，可以打杀一切。这种思维方式令我深恶痛绝。我不太相信“非此即彼”，我追求“亦此亦彼”。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国内美学大讨论中，我发现朱光潜先生的“物甲—物乙”说，很有意味，他企图摆脱和抛开“存在（决定）意识”的“两大块”思维方式，寻求两大块间的第三块，从而过渡到另一种思维方式。应该说，《审美中介论》写作，要归根到朱光潜的启示。至于表层原因则较多，例如关于“一分为三”的讨论等。此外，80年代中国美学界的理论趋向，多是大量引入知识性的东西，较少着眼于“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的原则（当然，“事”与“器”是很难绝然分开的），而我想得较多的是：摧残“两大块”的机械思维方式。如果读者读了《审美中介论》后，觉得在审美活动中还是“亦此亦彼”才真实，那就达到了我写作的目的了。

问：您是如何把“中介”的一般哲学概念运用于审美过程的？中介环节在审美活动过程中是如何确定的？

答：中介概念（中间环节/间接联系）的原型，应当是事物发展中的必然现象。例如

从动物到人的过程，必有“中间阶段”（或中间环节），即“既是动物又是人”的“类人猿”存在。因此，中介概念从本质上看，又是一种辩证概念。作为哲学的中介概念，是黑格尔首先明确提出来的，马克思也给予了充分注意，后来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正式提出，列宁加以扩充、使用，从而得以流行。一个哲学概念、范畴，转化为美学概念、范畴，是一种应用。应用是否得当，决定于两个方面：一是对哲学层次的深刻理解，二是对审美活动过程的真实体验。在我看来，审美活动是一个“全息”性过程，牵涉到人的全部神经系统及其深层积淀。审美的全息性过程及其联系方式，都很难用线性反映（存在（决定）意识）来概括，只能用“网状结构”式的“转化”来阐明。这是审美中介理论展开的广阔天地。

问：审美中介论如何使认识论与本体论建立起审美的联系？

答：对审美中介问题，我是首先从认识论视角切入的（亦不离开心理学背景），因此我综合考察了三个心理学公式： $S-R/S-O-R/S-AT-R$ 。最后落脚点在皮亚杰的公式上，特别是他的AT环节（A是个体同化；T是同化图式），这是一个深层环节，潜藏着人类的文明成果。认识论由此导向本体论（人类学本体论）。我很喜欢康德哲学，长期思考过他的审美四契机。弄通审美四契机理论，是弄通康德美学的头一个关键，审美四契机理论的本质特征是“悖论”，悖论机制是审美的大秘密。如第一契机：无利害而生愉快。这是审美思维对日常思维（功利性思维——有利害而生愉快）的违反与超越。在“无利害”与“生愉快”之间横亘着一个“审美心理结构”（人类的文明），一切外在在刺激经过

审美机制的深度过滤,都变成“审美的了”。因此,认识论与本体论的相互过渡、结合,最后应该落脚在审美心理结构上。

问:美学具有心理学和哲学的双重形态,您是如何吸纳现代心理学的成果,使之与一定的哲学规范统一起来的?

答:西方哲学在古代是一个巨大的母体,包括逻辑学、心理学、美学,后来逐渐分化了,先是逻辑学,后来是心理学。美学至今尚未最后分化出来。美学之所以具有哲学、心理学的双重形态,除了上述的“母子”关系外,还有“兄弟”关系。心理学分化出来后,又以自身巨大的成果反作用于母体与“兄弟”。因此,漠视现代心理学成果与现代哲学成果,对美学是很不利的。在拙著中,我比较注意吸收这两方面的成果,并尽可能寻求到结合的焦点和理论框架。如上述的三个心理学公式,最后要落脚到AT上,这是全部问题的焦点。理论框架是建构体系的支撑物,我采用了大量的三一式结构来阐述理论,即是这种体现。

问:在中介审美论著中,您对近几十年我国有关的重要美学理论逐一进行了清理,使审美中介理论的建立成为我国以往美学研究的一个必然发展。在审美中介理论建立起来后,您觉得我国美学研究还应向哪些方面发展,做好哪些方面的探索工作呢?

答:在发扬传统的基础上,做到中西结合、古今结合。这是一般套路。我国美学研究的方向与规范一时也很难说清,也说不清。我以为康德、黑格尔和马克思的美学,至今都是尚未逾越的高峰,既然高峰都尚未逾越,那么,首先的工作便是准备逾越的“硬功夫”。现在很多人热衷于“破旧立新”,一天一说,五光十色。那是一种浅层情绪的产物,充其量是一点思想火花。我们需要做的工作很多,当务之急,我以为一是端正学术态度,二是寻求理论方法,三是敢于建构体系(有体系意识)。

问:您最近主编的《现代美学原理纲要》,反映出您试图向整体构筑美学理论方面努力,中介理论在其中起到怎样的建设性的作用呢?

答:近年我在湛江师院中文系主持系务工作,为了把学术成果转化到教材和课堂上去,我们对大学中文系的教材进行体系性的改革,所以最先撰写了美学教材《现代美学原理纲要》(接着按同一思路撰写了文艺学

教材《现代文艺学原理纲要》和写作学教材《现代写作学原理纲要》)。任何学科理论要引入教材,必须经过一番“正本清源”式的“冷处理”,才具有可接受的客观性。中介理论不是静态的阈限理论,而是动态的循环理论。中介是过程的显现,它维系在对立的两个端点上,即维系在主体与客体上(主体 \leftrightarrow 中介 \leftrightarrow 客体),这便是我所说的三大块。撇开主体的中介理论,当然是残缺的理论;遮蔽客体的中介理论,也是残缺的理论。中介理论的主体环节具有深层的范导作用,其客体环节则对应地有“反射”和“证伪”的作用。因此,在美学教材中,我十分重视关于主体“人”的理论,尤其是马克思的人学理论,此一环节如果论述不深透,中介理论便变成无本之木;同样,对于客体的“形式结构”(主体的审美“异在”),如果把握不好,中介理论则失去它的对象性和物化的客观性。通过中介理论,从主体环节中提炼出“形式感”,从客体环节中提炼出“形式结构”,并使二者互逆沟通起来,这便是中介理论的全过程和循环图式。人是对象性的存在物(马克思),因而,西方的主客体理论,从本质上说并不是某个理论家的独创,而是人类活动的存在方式,是理解和把握人类活动的合适框架。

问:您认为您主编的《现代美学原理纲要》在哪些方面体现出现代美学的特点呢?

答:1987年之后,中国美学界曾经掀起对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热烈探讨,大家初步的共识是,美潜藏在“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劳动过程(创造)中。但这个命题过于笼统,没有指向“美”的本身,我把这个命题转化为“人的本质力量的形式化”,或“人的形式感(亦是一种本质力量)的对象化”。从“对象化”走到“形式化”(对象化的一个层面或一个维度),是一个“从抽象到具体”的过程,是把审美活动从一般实践活动中抽象出来的过程。这是马克思哲学对审美理论的深刻启示。撇开人类实践活动的基本过程和图式,去探求“美的存在”,我以为是不足取的。在美学教材中,我是牢牢把握这个大方向的。此外,我把美学原理的基础放在“人学”背景上,把美学原理的重心放在美感论上(纵横交错的立体美感上),其他审美范畴则是对应的推演、转换,以便见出其来龙去脉。凡此种种,都极有助于初入门者从根本上把握审美理论。

跨世纪一代人对中国经济的理论思考

——《追赶型经济增长理论与实践》一书读后

□ 李金亮

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的重要文件指出：我国要实现“九五”和2010年的奋斗目标，关键是实现两个根本转变，即经济体制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这是跨世纪的两篇大文章，得靠跨世纪一代人在实践中加倍努力，靠跨世纪领导决策的正确。而无论是实践还是决策，都要有适用理论作为指导以及有科学理论提供依据。应该说，我国几十年来的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特别是改革开放十几年来的实践，已为理论上认识、把握这种转型的路径和重点，创造了判明和缕析的良好基础。现在已经到了应该对中国经济跨世纪发展基本路向进行思辨，可以思辨和必须思辨的时候了。

1995年7月出版的钟阳胜同志的专著《追赶型经济增长理论与实践——一种组织经济增长的新理论和新思路》，是跨世纪一代人对中国经济问题的思考，《追赶》一书的作者，已经参加了较长一段时间的实践，还将参加本世纪末和下世纪初更长一段时间的实践，因此，这本书既可看作是这代人对自身实践经验的一种理论升华，更应看作是这代肩负重任的人对下个世纪实践的理论准备。

从这本书中，人们可以看到作者对我国经济运行与经济发展进行长期跟踪观察和体验的用心；也可以看到作者对诸多经济问题以及如何实现两个转型问题进行思考和分析的精心。

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学研究与经济实践之间存在相互脱节的弊端。在从事实际经济工作的同志中，虽然不乏对理论感兴趣之士，但由于时间不济或功力不逮，更由于经验主义作祟而用心不够，鲜有对经济活动进行长期跟踪思考，并将实践中产生的体会加以系统化的人；而在理论界，虽然也有一些著述致力于理论联系实际，但真正做到这种联系，以理论之箭去射实践之的，形成一种既能解释现实，又能预测未来发展方向，还能为重大决策提供依据的系统理论的，毕竟不多。改革开放以后，这种“两张皮”的情况大有改变。在我看来，这种改变在脱颖而出的新一代人身上表现得特别突出，他们年纪比较轻，受过良好的高等教育，在年轻化、知识化和革命化的浪潮中被推上各级领导岗位，亲身参加和领导包括经济工作在内的社会实践，能以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高度去分析问题，能从一个比较长的历史跨度去探究事物发展的规律性，厚积薄发，逐步形成具有系统性的理论。我称这些同志为实践型的理论家。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太需要一大批既是实干家，又是思想家和理论家的领导者了。这些同志之所以对经济学感兴趣，并在实践中持之以恒地对经济学的问题进行思考，完全是出于一种自觉，即出于一种责任感和使命感。他们认识到，置身于改革开放的大潮中，投身于前所未有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中，缺乏现代经济学的知识，没有用于指导实践的理论准备，难于做好领导工作，不能适应未来发展需要和完成自己肩负的跨世纪历史使命。所以，他们

如饥似渴地吸取现代经济学的知识,在实践中从不间断地对经济问题进行思索,并且笔耕不辍地将系统化的体会形诸文字。据我了解,在我国已经涌现了一批这样的实践型理论家。《追赶》一书的作者,可说是他们当中颇具代表性的一个。我想人们在阅读《追赶》一书时,一定会体会到他们这一代人出自这种历史责任感所作的努力和苦心的思考。

《追赶》一书的作者具有长期丰富的实践经验。他在担任县、市主要领导期间,对经济工作的领导占了他大部分的时间与精力,个中的复杂情形和酸甜苦辣真不是外人所道。惟其如此,他对我国经济在旧体制下和新旧体制转换时期所产生及所残存的诸多弊端,才有异于常人的深刻认识。举凡经济活动有效性和生产率的低下、科技进步速度的缓慢、经济和产业结构的不合理、企业素质的低下和体制的僵化等等问题,都进入了本书分析过滤的视野,并在字里行间表现出作者的切肤之感,读之令人动容。作者不仅在书中对我国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中的诸多问题进行了较系统的概括和分析,更难能可贵的是,对这些问题所以产生的渊源从哲学的高度进行了深入的经济学分析和思考。书中提出了主体需要是经济增长的最高原则的观点,这使我想起武汉大学曾启贤教授在80年代初所发表的一篇文章,曾教授在文章中提出了满足人的需要是经济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点的观点。如果说曾教授的观点是从思辩的角度对计划经济的见物不见人进行批判的话,那么《追赶》一书则是从多年实践的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出发,经过思考而从哲学和经济学结合的高度提炼出他的观点。殊途而同归,他们的观点不仅令人瞩目而且极具时代意义。

准确而系统地揭示我国经济发展所存在的问题,特别是在经济运行和经济增长方式方面所存在的问题,并从深层次指出这些弊端之所以产生的原因,无疑是极为重要的。但是,倘仅止于此,则未免遗憾。这是因为,如果不去探究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和路

径,人们甚至还可以说这不是一种具有完全意义的理论升华,起码可以说这不是功能完整的理论。《追赶》一书不仅就其所触及问题的全部都给出了求解答案,而且在阐述如何实现两个转型问题时,还有着十分明确的指针。它从资源的合理配置和有效使用的基本点出发,提出并论述了一个经济(包括国民经济和区域经济)战略目标制定的原则、产业和经济结构变化所应遵循的方向、技术进步和企业素质提高的具体路径、宏观经济政策应如何制定、国内经济活动应如何与国际经济活动接轨,乃至在转型时期人们的价值观应朝着什么方向变化等等方面的对策。在我看来,相当大一部分的内容,几乎用不着怎么修改便可成为政策性的建议。由此可见,《追赶》一书是花了心血用心思考的结果。

经济学论著,不仅要适时而作,更应超前而作。《追赶》一书不仅对实践中所存在的问题进行观察和思考,而且着力对解决问题的方法进行思考,从而使之能适度超前地就两个转型的必要性与可能性作出了源于实践、高于实践的系统回答,这是《追赶》一书作为一本层次较高的经济学著作的价值所在。

作为一个长期在高校从事教学的读者,也许是我个人过于偏执于分析问题的逻辑之故,因此感到《追赶》的作者尽管极力在建立自己的表述和阐释问题的逻辑,但由于要表述的问题过多、涵盖面过大,似乎有些章节之间的内存逻辑联系还不够紧密。此外,正如追赶型经济处于不断变化之中一样,对于作者在《追赶》一书中所使用的某些概念,也只能从动态的角度去把握,既为动态,也就难免不够精确。我想,细心的读者在阅读这部书的时候是会发现这一点,而且也是不会太过苛求的。但无论如何,这是一部瑕不掩瑜,在内容和结构上都有创新的经济著作。正因为如此,我要向学术界和实际工作部门的读者推荐这部著作。

作者单位:暨南大学经济学院
责任编辑:石成

广东省获全国优秀社科期刊奖表彰大



◁ 12月27日，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广东省新闻出版局在广州举行隆重的表彰大会，对我省3家获奖期刊予以重奖。图为与会部分领导与我刊同志合影。

左起：陶原珂、郑英隆、冯达才、省新闻出版局报刊处处长杨以凯、省委宣传部新闻出版处副处长朱仲南
黄荣显、谭湛明、张硕城、刘斯翰、广东省新闻出版局副局长何文光、林有能

▷ 颁奖大会会场展出的部分获奖期刊



▽ 中宣部副部长徐光春同志（左一）听取我刊代表（中）汇报后，对我刊的工作给予充分肯定并祝贺



（吕丁摄影报道）

▽ 广东省赴京领奖代表合影。

左起：《学术研究》杂志代表、主编张硕城，《家庭》杂志代表、主编柳明、副主编徐春莲，广州军区《政治指导员》杂志代表、副主编李毅





优秀社会科学期刊奖
获奖证书

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署

ISSN 1000-7326



9 771000 732000

ISSN1000—7326
CN44—1070

每月 20 日出版 定价：3 元/册